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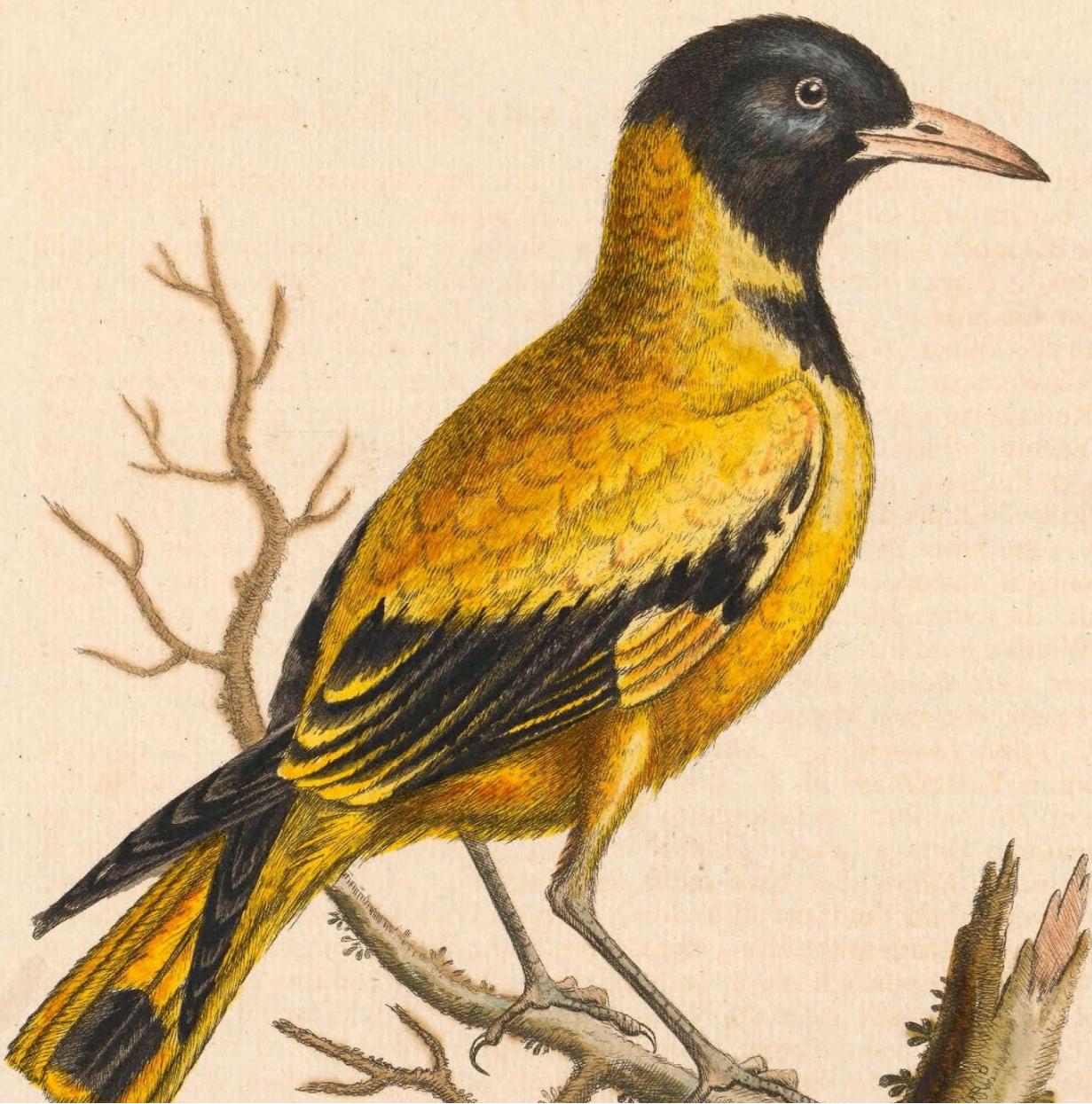


以文学之名
小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三十三 2023.09

邓小平的信徒 | 田野中国

和外国人聊天系列 | 小鸟问答
我了解了妈妈的过去，却依然无法与她和解 | 接力访问
美是一种伤 | 新书





小说

新书试读 | P05 “或许老年是我们一生中终于能做自己的唯一一段时光”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P11 克雷姆斯的弯曲时间 克劳迪奥·马格里斯
P15 美是一种伤 埃卡·古尼阿万

非虚构

田野中国 | P.21 改革开放的长子 | 邓小平的信徒① /
P.27 胡先生的历史观 | 邓小平的信徒② /
P.35 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 | 邓小平的信徒③ /
P.41 时代列车隆隆向前 | 邓小平的信徒④ | 伊险峰
P.47 小鸟文学地图 | 昆明手记 刘雨萌
新书试读 | P.53 想知道美食家眼中的世界，且看清代文学 史景迁
P.59 兰兰、康康：上野动物园熊猫时代的开端 伊恩·J. 米勒
P.65 上一次他天真了，这一次他倒霉了 奈吉尔·巴利
P.73 看得见的家务，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 杰玛·哈特莉

专栏

接力访问 | P.81 满宇：“我还是对人感兴趣”，但，人是什么？ /
P.87 张晓磊：一个为蚯蚓、江豚和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而工作的人 /
P.91 Zebra：通过做口述历史了解家人，却还是无法真正和解 /
P.95 叠贵：用苗语唱歌，只是我为这个民族讲故事的一种方式 /
P.101 汤包：在即兴戏剧表演里，他发现了都市人的微妙特质 /
P.107 大爱：“我觉得神明在考验我做这本杂志的诚意” 杨樱



题图为电影《乡愁》(1983)剧照

小鸟回答 Vol.33

小鸟 | 小鸟回答

九月了，一年只剩下后三分之一了

i

陆陆续续在处理一些非虚构选题，与各种作者聊天。

感觉最突出的：

第一个，时间确实是个事儿。其实不是时间，是必要性。当你想写一篇文章，这件事又不是你最首选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它多半是没办法完成的，因为真的总是随时会出现更有“优先级”的事情。所以这些看起来很重要的写作往往变成了“重要不紧急”，继而变成“非必要”。这当然不能说是作者的问题。因为“紧急必要”是要用代价去交换的。

第二，手里有锤子确实会给作者某种视角，但不提防一点自己，就会变成障碍物。我们说的是要提防“眼中只有钉子”。锤子的坏处，就是很容易把你写的人工具化——他们不再有生活，不再有其他情感，只变成你要表达的问题的工具。要小心啊。

第三，自我审查。我们理解这是写作者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但如果这事发生在写作之前，就有一点像是一种自我迫害。

有读者发现，近来作品和栏目都有点单一。

确实如此，一个原因如前面所说，二是它有点像眼下的经济，你原本以为社会恢复正常，一切就要欣欣向荣，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ii

与一位出版界人士聊天，说到我们希望从人类学者那里找到一些对写作有兴趣、并且掌握一定科学田野方法的作者。她有点疑惑，后来跟我们说，以她的出版经验，这么多年来从这个渠道里产生的作者并不多，一定是有些原因的。

后来另一个出版界人士补充了他的另一种观察：为什么中国的记者出书的不多呢？因为早年他们写大稿子，收入还不错，但是那会儿书价便宜，而且写书可不是攒稿子，多费心力，费了心力到手也不过俩月工资，图啥？就此搁下了。至于后来……书价倒是上去了，但媒体业也两说了不是吗。

有点道理。不过据我们观察，专业人士给大众写作，在简中市场从来不是一个常见的事情。第一位出版界人士好心扑灭我们的热情：你看第一批人类学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也 20 多年了，脍炙人口的作品有几个，不还是早年那几个吗？

iii

与一位在上海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美国人聊天。他说到了河北的水，黑龙江的火，还有一些已经翻过去打算被忘掉的一些。他说他有一点压抑，甚至愤怒。我们问，那你为什么不走。他说他走不了，在这里时间太久了，不知道回美国做什么。什么情况下才会走，我们说那可能就要看打起仗来，不管跟谁打，打谁，你们总归是要撤侨的，那你到时候总会走的。

然后就沉默了。沉默是因为，没想到我们有一天在饭桌上就说起了这样的话。打仗啊撤侨啊这些字眼就这样出现了，玩笑的成分不是没有，但何以至此呢？

iv

隔一天，与另一位 10 年没有来中国的美国人聊天。他觉得有点恍如隔世，说觉得哪里有些变化。比如说之前大家都很努力，虽然也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总的来说，也觉得困难是可以被克服的。努力是会带来回报的。

我们说，这是优绩主义者的视角。不过以前我们确实都是优绩主义者。之所以不是了，也不是因为啥强大的自省能力，很大一部分原因为现实所迫，被迫之后自省，才知道事情从来不是自己认为的那样。当然，还有在看齐格蒙特·鲍曼说“消费社会创造新的下层阶级”的时候。

最后我们感慨，没想到你还能拿到签证。

v

梁漱溟说：

心是超过身的。从身来说，你的身体跟我的身体不相通，我吃饭，你不饱。可是从心来说，心高于身，心超过了身。所以心跟心的关系，它可以说八个字，头一个就是“好恶相喻”（另四个字应是“痛痒相关”），我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好恶相喻”。这个“好恶”包含着是非心，我觉得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人是好人，你也承认是好人，好恶可以相喻，“相喻”就是彼此了解，“好恶相喻”。

梁漱溟讲这段话是在 1980 年，43 年前，87 岁的他“解放”不久。其时，百业凋敝是实，百废待兴是希望，真正凋敝或有待重振的是泯灭的良知和道德。这是真正的伤害，其祸至今日余威尚在，甚或可能就要卷土重来。

vi

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专栏“局外人”的作者 Chris 的书就要出版了。CIP 虽迟但到。你不用管 CIP 到底是啥。用出版界人士的话说，以前它是一串特别不重要的号码，但突然有一天就重要了起来。对于一些随着时事话题范围不断变化波及面的书，会变得格外重要。

Anyway，为 Chris 高兴。

vii

齐格蒙特·鲍曼还说：

列维纳斯说像“为什么我应该道德地行动？”“别人为我做了什么？”和“如果别人都不做，那为什么我应该做？”这样的问题标志着道德行动的终结，而非道德行动的开始。罗格斯托鲁普说，即便某条规则叫你去做某件事情——因为它是好的——遵守那条规则也不构成道德行为。道德行动的前提是自由决断。它关乎关爱、为他人着想——关乎不假思索地帮助他人的冲动。

他还说：“道德行动的前提，是个体自由做出决定。一个行动，只有在没有算计过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人类行为，它是自发的、不假思索做出的——才是道德的。”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要的自由。

viii

还遇到了一个奥地利作家。

作家来中国参加上海书展，5年前被买下的小说终于变成了新书——5册，5个人的故事，5种人格的演绎，方方正正装在一个盒子里，有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感觉。美中不足是审查，这审查可不一般，其中一本是以漫画形式创作的，和原版相比，它的简中版本少了将近80%的内容。

80%。

作家是知情的，他甚至还参与讨论了保全对策，来来回回邮件讨论各种删减和遮盖方式。然而事情还是以最粗暴的形式解决了。全部删掉。他在来上海之前俩礼拜才看到了这玩意的PDF版本。作家很难接受，然而他听说，如果这事不这么做，那出版社可能会因此黄掉，他的编辑可能丢了饭碗，还终生无法从事出版工作。这事可大。

作家人生第一次有这样的出版体验，不知道是不是书展上车轱辘话说多了，还是他已经消化了这件事。总之复述的时候，他很镇定，听上去就像在介绍一次对中国审查制度的全面田野。

作家又说了一些别的。他知道的事儿不少。然后他有点抱歉地说，不管怎样，我就要回到我快乐的奥地利生活里去了。而这里的事情还会继续。

作家上一次来中国是2018年。他做过沙发客，也去过一些地方。他发现这里的人说话是很内敛的。人们也许有话要说，但是往往不会说出来。或者说出来也很小心。更常见的是，人们好像有一些感觉，却不知道这和说话有什么关系，最后就不觉得自己要说什么了。他提起他2019年因为全球气候大会去智利，那地方的人爱说话，人人都有政治表达，大街小巷涂满了这些东西，饱满、亢奋、洋溢，让他觉得很有生命力。我想起了波拉尼奥，又想起在俄罗斯和瑞典领奖的同胞作家们，就有点遗憾。

ix

封面的鸟叫做黑冠金莺。

如果需要联系我们，微博留言@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写邮件到info@aves.art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为 [Joan Miró](#), (1924) *The Tilled Field*

小说

“或许老年是我们一生中 终于能做自己的 唯一一段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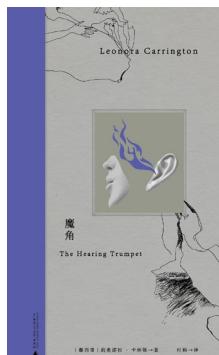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 新书试读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导读《魔角》

天才艺术家莉奥诺拉·卡林顿曾是戏梦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圈宠儿，路易斯布努埃尔、安德烈·布勒东、马克斯·恩斯特都为之着迷，2022年她被选为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主推人物，再次让世人领略其风采。

《魔角》是卡林顿唯一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九旬老人的叛逆冒险：92岁的老太太玛丽安带着助听号角，被家人送往养老院。氛围诡异的养老院中，老太太们每日劳作，接受医生的教导。挂在墙上的画里，神秘女子似乎在抛媚眼，指引玛丽安获知古老典籍中的奇闻逸事好友卡梅拉带着天马行空的念头前来探访养老院里的其他老太太也各怀鬼胎，最终，一桩离奇的凶杀案，打破了平静的日常……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为本书撰写的导读，分享给读者。



第一次读《魔角》时，对其作者，我一无所知，于是我就在这种“无知”状态下邂逅了这部篇幅短小的小说，获得了绝妙的体验。比如，我全然不知莉奥诺拉·卡林顿当过画家，不知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侨居墨西哥，不知她年轻时和最伟大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之一的马克斯·恩斯特有过一段情。但这本小书无法无天的语言风格和荒谬反常的内核给人以强烈冲击，让我久久无法忘怀。

在我看来，虚构作品有两大特质是尤其令人震惊和感动的：开放式结局与狂野的形而上学。

第一个特质是结构性的拥有开放式结局的书刻意让主题和思想不受限使之略显含混。它们赋予我们美妙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做出自己的猜测，寻找关联之处，努力思考、阐释。这一阐释的过程便能产生巨大的求知之乐，它也能如好友一般激励我们进一步探索。这类书没有命题，可它们能引出某些我们以前绝不会想到的问题。

依我想来，第二个特质——狂野的形而上学——关乎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们一开始为何读小说？不可避免，众多真实的反应包括：我们读小说，是为了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地球上的人类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个体经验太有限，我们存在于世太无助，无法理解宇宙的复杂与庞大；我们渴望近距离观察生活，一窥他人的存在——我们与他人有任何共同之处吗？他们和我们有哪里相似吗？我们正在追寻一套彼此认同的公共秩序，每个人都是这块织物上的一针。简言之，我们寄望小说提出一些假设，或许能告诉我们世界的本来面目。可能听上去仍是老一套，但这是个形而上的问题：世界依据什么原则运行？

我认为，实际上，这恰是所谓类型小说和非类型小说的区别所在——在我本人所处的文学年代，这个问题受到了热烈讨论。真正的类型小说为我们呈现清晰可辨的视角，采用的都是有着熟悉的哲学设定的现成世界观。非类型小说则旨在为其创造出的宇宙设立自己的法则，描绘自己的认识论地图。爱情故事、谋杀悬疑和驶向另一星系的远征传说，皆是如此。

《魔角》无法被归类。自小说的第一句话起，它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受自生法则支配的、有着内在一致性的宇宙。与此同时，它会对我们从未停下来质疑的事情发表令人不安的评论。

在父权体制中，迈入老年的女人变成了比她年轻时更烦人的存在。正如父权社会构想、编造了成千上万条规范、规则、守则，以及各种形式的压迫来规训年轻女性，它们以同等的怀疑和厌恶对待老年妇女（她们已然失去撩人的情色力量）。这样的社会中的成员，在保持表面上的同情之时，带着一种神秘的满足感，无限回味年长女性从前的美丽，同时思考时间流逝留下的痕迹。年长的女性被推入社会性消亡，从而被进一步边缘化；她们通常生活困窘，被剥夺了所有影响力。她们变成了对任何人而言都无关紧要的次等生物；社会除了容忍她们、（极不情愿地）给予她们某些关照之外，无所作为。这就是小说开头玛丽安·莱瑟比——《魔角》年迈的叙述者——的境况。她富有生命力，但听力不佳。并且她受到了双重排挤——首先是作为一名女性，其次是作为一名老年女性。其性格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她和整部小说共有的一个特质：古怪（当一名年迈女性不再扮演好心奶奶的角色，她便可以选择古怪模式）。确实，让一位失聪老妇扮演叙述者、女主人公、思想内核，并且让整本书都讲述一群古怪老太的故事，从一开始就表明，这部小说将是一个极度怪异、激进的事件。

从定义上看，古怪之事即偏离常走的路，“处于中心之外”——在习以为常的规范之外，偏离所有被认为不言自明的事。变得古怪，即以全然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该视角既偏狭又边缘——遭排挤，被边缘化——同时还富有启发性与革命性。

家人送玛丽安去的机构或养老院的管理者是甘比医生及其夫人。这个地方也很古怪，里面有一系列奇葩建筑——一朵毒蕈、一间瑞士小屋、一具埃及木乃伊、一只靴子、一座灯塔——不可思议，荒诞至极，就像从博斯画作里蹦出来的，或者说就是一场梦的游园会。但在这里，古怪可被认为象征着我们对待老年人的那种态度——压迫，居高临下，如对待小孩一般。“甘比”（gambit）一词源于意大利语词“gambetto”，字面意思为“瘦小的腿”，也出现在词组“dare il gambetto”中，意为“绊倒”或“密谋”。甘比夫妇是和他们一样虚伪的社会中伪善、自负的代表，他们的行事方法可归结为“为了他们好”。甘比夫妇始终知道，对受他们监护的人而言，什么是正确和健康的，让他们受制于一种定义不明的心理教育学说，鲁道夫·斯坦纳的追随者信奉的教义与该学说别无二致。该学说最富喜剧性的例子就是书中的老妇人每日都得做的“运动”，或许是在致敬葛吉夫的运动。

甘比夫妇的任务包括时刻观察、评判他们的社区成员，这是自我完善这一模糊的半宗教概念的另一特征，夫妇俩以近乎施虐的方式向成员灌输他们所犯之罪。正如甘比医生对玛丽安说的：

“关于你这个独特案例的报告显露了你的以下几种内在杂质：贪婪、虚伪、利己、懒惰、虚荣。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贪婪，那是一种掌控一切的激情。你无法在短时间内克服如此之多的心理畸形。并非只有你受制于自己堕落的恶习，每个人都有缺陷，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就是观察这些缺陷，并最终借助客观体察和觉知来消除缺陷。

“你被选中加入这个团体这一事实，就足以激励你去勇敢面对自己的罪恶，并努力减少它们对你的控制。”

甘比夫妇的“善行”背后有着相当明确的经济动机。没错，甘比夫妇从他们声称要使之日臻完美的老人那儿赚钱。事实上，他们丝毫没有带着使命感在经营，只是为了谋生。通过援引贪婪之罪，卡林顿提醒我们注意宗教机构和经济之间极其虚伪的关联。

小说中的另一个怪人是卡梅拉——女主人公的挚友，据说灵感源自卡林顿的老友、同为画家的雷梅迪奥斯·巴罗。卡梅拉之所以可以在这世界上保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她是个富有的老妇，而人们最尊敬的就是财富和拥有财富的人。因此，卡梅拉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可以做成某些事情。她在这家沉闷的收容所的出场充满戏剧性；她的想法不容置疑，操控其思想的不是理性而是想象力，以及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在她的人物性格中，古怪升华成女神特质 (Goddesshood)。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莉奥诺拉·卡林顿一直积极投身墨西哥女性解放运动。她因设计了一幅描绘亚当和夏娃互赠苹果的海报而臭名昭著。同样地，在《魔角》里，卡林顿在创造有史以来最具独创性的女性主义文本的过程中，改造并颠覆了传统的、基础的故事。这本书启用了一种非传统的、形而上的秩序，从而让其叙事变得具有颠覆性和超现实感，是女性主义的典范之作。《魔角》直截了当地将古怪引入女性主义讨论，将其作为父权视角合情合理的替代选择：凡古怪之事皆能体现女神特质。

在我们的时代，很久以前，女神便被其（卡林顿所谓）“不育的兄弟”逐出了中心；如今，她的王国处于感知领域。尽管如此，在“不育的兄弟热爱的二元对立——要么 / 要么、本地人 / 外地人、黑 / 白——暴露出其有限性的地方，女神总是在场。他们以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来组织一个复杂的世界，并获得掌控它的权力。按照他们的逻辑，要让一张过短的床能装下一个过高的病人，唯有砍掉他的脚，而非找一张长一些的床。

我认为女神特质即受文化与自然之多重财富深化和拓展的女性特质 (womanhood)。女神是一个强大的原型，其存在本身就是对父权结构的纯粹挑衅。难怪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女性都被要求遮住她们的脸和身体。女性的身体机能正如她们的肉体存在一样，似乎本该是这世界上最自然之事——却始终是个问题，是不可讨论的事。诸文明创造、施行众多机制来控制女神；文明或许就可由此机制来定义。

当女性要求得到她应得的——认可其力量和权力，认可其本身的女神特质——她就会被驱逐到地下室，监禁在地牢里。意识遭剥离，她便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只能“低语”——正如《魔角》中低语的圣杯。她变得词不达意、含混不清。她不能（或不愿）使用拗口、矫饰的父权用语、小品修辞、精雕细琢的句子，以及备受文化仲裁人（他们高高凌驾于关押懊丧女神的地牢之上）推崇的对艺术的疏离思考。其语言粗鄙、无礼，完全不符合人们的典型认知，而是狂野、可笑、古怪、不羁。人们通常认为她的语言令人费解，结果便是这种语言有时会被判定为媚俗。媚俗且缺乏品味——女性太常遭受这样的指控。似乎约瑟夫·康拉德说过，评判一本书质量的最佳标准，就是看女性是否喜欢它——因为女性只能喜欢糟糕的文学。好吧，我必须坦承，我非常喜欢康拉德的作品。真心实意。

好了就这样吧。媚俗是我们的海洋。这一切周期循环月经和反复发作的偏头痛、咒术密语、治病草药以及对自然之力的稚气信仰。对动物不健康的爱，多愁善感，喂养流浪猫。过度的保护欲，好管世间一切闲事。种在小罐子里的那些花，那些小花园、蜀葵、破布、蕾丝、缝纫、针织、浪漫小说、肥皂剧、“女性文学”、“情感丰沛”，以及被指控心志不坚——数世纪以来，我们都被迫背负着这一罪愆。厌女之作数量庞大，似无穷无尽。在现代社会，在一个完全父权化的世界，我们只能讽刺地谈起女神，像挂在甘比夫妇餐厅墙上的画作中的女院长一样挤眉弄眼，带着隐藏的奸笑，半严肃，半嘲弄。几千年来，她都承受着大肆驱逐与放肆奚落，所以她只能如此隐秘地表达自我。多少与女性经验有关的主题遭到边缘化，受到嘲弄与奚落，或干脆被弃置不理？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几百年来，女性都在厌女的、父权制的宗教中被抚养长大，这些宗教都在一定程度上公然歧视女性。她们投身的文化从来没有完全属于她们，甚或直接与她们对立。少女初长成，便不断有人教导她们，她们低人一等，虚弱不堪，力有不逮，或者在其他方面有缺陷。她们成长于无处不在的厌女迷雾中，常常被蒙上面纱，自我意识未完全觉醒，这是文化、语言、形象、人际关系、历

史和经济的内在特性。仅在最近几十年，原本被边缘化到近乎不存在的真正的女性故事，才开始缓慢、坚定地试图挣扎而出。当故事终于在那个被侵占的世界登场时，它会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莉奥诺拉·卡林顿看到了女性这一具有颠覆性的古怪姿态。不管是在她的绘画还是写作中，她都能以绝妙的方式呼应安德烈·布勒东的理念：需要使艺术与炼金术或神秘学结盟。她随意使用我们欧洲的奥秘奇幻秀，但规避了常常与之相伴的浮夸的庄重感。

《魔角》是一个神秘文本：它谈及遭错置、被遗忘的隐秘之事。为能完全理解这个故事，读者须对其使用的典故有一定的了解，即便它从魔术箱里掏出各种震撼人心、出人意料的故事是为了嘲讽此种能力。

女院长的媚眼应在此书以后的每版封面上永存；它应成为此书的标志，就像玛丽安的耳聋一样。两者一起组成了如何接近这部小说的说明书。在书的开篇，卡梅拉给了玛丽安一个助听号角，神奇的是，它能让她选择自己听到的东西。那个媚眼是在告诉我们将一切都放入引号中，去相信“仿佛”，神话与文学所依赖的正是这个“仿佛”。自此，我们就将这样跟随莉奥诺拉——调皮、媚俗地眨动一只眼，对于她为我们呈现的一切，只看表面意义。

而她奉上了一台大戏——此书是一场真正的嘉年华。揭晓抛媚眼的女院长就是唐娜罗莎琳达·阿尔瓦雷斯·德拉奎瓦的那一刻，女神便登上了《魔角》的舞台。从这一刻起，现实与虚幻、庄严与荒诞、崇高与荒谬便融入了小说超现实主义的肌理。模仿艺术让历史发出乳白色的光，此书沿着不断增多的典故小径发散开去，充斥着晦涩的流行文化，有关于圣杯、圣殿骑士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故事，还有大量架空的人类历史——长久以来，各种民间宗教团体一直在鼓吹他们自己版本的历史真相。

抛媚眼的女院长的故事就是盛装生命灵药的圣杯的故事，圣杯的合法主人便是女神（她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不育”的僧侣将其盗走，而后圣殿骑士将其藏在他们修道院的地下室中。只有女性才能让这份货真价实的宝藏重见天日，不过圣殿骑士似乎并不知道这一点。总的来说，抛媚眼的女院长唐娜罗莎琳达与玛丽安·莱瑟比的大敌都是基督教——对女院长而言，圣殿骑士团和冷酷主教就代表基督教；对玛丽安而言，基督教则是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新时代基督教思维模式，即无意义的自我否定和外部控制。

唐娜罗莎琳达拯救圣杯的故事是一系列奇异梦幻、出人意料的冒险。同时，这也是一個重夺控制权的故事，是一场反十字军东征，它使得被狡诈侵占的世界恢复秩序。在这个故事中的故事里，卡林顿创作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喜剧戏仿，模仿那些在沙漠中的罐子里找到的神秘文本，比如一九四五年发现的拿戈玛第经集。这一发现无疑重新激活了已经世俗化的二十世纪人类的宗教想象。她大量指涉诺斯替教派论集中的人物和名字，如皮斯蒂斯·索菲亚。

求知欲强且有耐心的读者会发现，书中的指涉涵盖面极广，不仅有诺斯替教派，还混杂了各种秘传宗教，有古有今。这样的读者会记下我们女院长的名字：唐娜罗莎琳达·德拉奎瓦（来自洞穴），塔耳塔洛斯圣巴巴拉修道院院长，与神秘、强大的巴巴拉斯 (Barbarus) 或芭碧萝有关（考虑到她后面的冒险，这一联系很贴切），这样的人物——自然！——住在普累若麻的深处”（采用《约翰隐示录》中的诺斯替教派用语）。芭碧萝是原初的创造之力，她的子宫便是世界的子宫，她是舍金纳和索菲亚合二为一的原型。她化身长胡子的女性、母亲——父亲以及原始人，即第一个雌雄同体。卡林顿让《魔角》充满性别流动的人物——胡子女、异装者、变性人，仿佛在以此作为应答。在书中几个奇异的地球人中间，读者还将看到直接取自威尔士神话的塔利埃辛这一人物。他是女神的信使，第一个被赋予预言神力的人；书里的他是永生的邮差。

此外，《魔角》也是一部完全超现实的作品，写得如梦似幻——换言之，几乎没有连贯性可言，或者说缺乏强有力的因素关系。这里肯定没有挂在墙上的枪，所以也就不用期待它会在最后一幕掉落。一切恍若发生在梦里，事件发生的顺序也很微妙，前后关联若有似无。第一次提到玛丽安的朋友马尔伯勒的妹妹时，书里说她腿有残疾，后来又暗指她有两颗头，可当她最终于小说结尾处出现时，既不瘸腿，也没有两颗头，她只不过长着一颗狼头！这种另类的因素关系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这本书的体验，相反，它展现了卡林顿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堆叠相继产生的想法，一个叠一个。随着叙事自我纠正，跟随故事展开的神秘之流就是一种纯粹的快乐。

人老去，就变得古怪。一旦适应社会不再是必须，这似乎就是发展的自然规律，并且自此，个人和社群开始分道扬镳。实际上，或许老年是我们一生中终于能做自己的唯一一段时光，不用忧心他人的需求，也不用遵守我们不断被教育要听从的社会规范。最终，青春

期时必须归属某个团体的义务也就不再适用了。

这就是为何《魔角》中的古怪哲学与年龄有关。可将其看作老年人逆时间之流，致年轻的一条特别信息。我们必须做古怪之事。在所有人都在做这件事的世界，我们必须做那件事。当整个中心都在吵吵嚷嚷地建立自身秩序，我们就要待在边缘——我们绝不让自己卷入中心，我们会忽视并超越它。

因此，古怪被定义为一种自发、欢乐的反叛，反对一切既定秩序，反对一切被视为正常和不言自明的东西。这是向服从和虚伪发起的挑战。

最后，《魔角》是一本能带来极致愉悦的书。让我们享受共读这个荒蛮故事的机会，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妇人无法去拉普兰，所以拉普兰只得来到了她身边。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本文根据安东尼娅·劳埃德—琼斯的英译本译出)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 年授予），当代欧洲重要作家、波兰国宝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为：“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呈现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她善于在作品中融合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故事等元素来观照波兰的历史与人类生活。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Pawel Czerwinski](#) on Unsplash

小说

克雷姆斯的弯曲时间

克劳迪奥·马格里斯 | 新书试读

若时间弯曲，
可否遇见青葱年华的自己？

《克雷姆斯的弯曲时间》是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的最新作品，收录了五则与时间有关的短篇故事，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着不同的身份，年轻时曾是企业家的老门卫，与学生相遇的老音乐教师，遇到陌生女士的演说家，大器晚成的作家，观看青年时代电影的老教授。

在每一个故事里，主人公都回忆起从前的某个片段，每个人都去寻找自那些已失去的和已找回的时间。那些与生命、爱情和经历有关的时间。时间与因果关系如影随形：由因结果，果又会成为后续的因，最后一切都会归于原点。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同名小说的部分，分享给读者。



公元一五三年，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尔·易得里斯说，在他看来，克雷姆斯的辉煌和荣耀超过了维也纳。而如今，它更像一座当代的维内塔^[1]——那座被海水淹没的城市，根据传说，在海底的阡陌中，还能看到穿着古装的人在游荡。如果有人忽然从巷子间的一道门里出来，在时光的暗影中，就仿佛挂毯上的人物闯入了世间。而在更加沉寂的迪恩施

泰因，那里距离纪念克歇尔（据说莫扎特作品目录是他做的）的铭牌不远，药剂师看到了一位远方来客，顿时神采奕奕，他自豪地向来人展示了整间药店，并且炫耀这座城市过去的辉煌，随口贬低了一下克雷姆斯，让人听出瓦豪河谷的这两座城市的旧怨。

那天晚上发生在克雷姆斯的事，证实了因果关系可以逆转。人们在一家简朴的宾馆庆祝我那日短暂的荣耀——那里的葡萄酒很有名（那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赞美过的酒，但有人觉得它过于酸涩），所以被选作了场地。那天下午，我在克洛斯特新堡——维也纳的“埃斯库里亚尔”——举行了一场关于卡夫卡的讲座，我是主讲人。克洛斯特新堡^[2]保存着圣利奥波德的圣骨，那是巴本堡的利奥波德三世公爵。这座修道院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六世表现出过多的悼念，在教堂的圆顶上，本该是十字架的地方，却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冠。

讲座一般都会成功，诀窍在于深入浅出，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一些风趣的陈述来揭示有深度的思想。总之，那次讲座很成功，和其他比较重要的研讨一样，会后，主办方会邀请主讲人吃晚饭，也会有一些崇拜者、朋友，还有这种场合不可或缺的人参加。他们带我去吃晚餐，不知道为什么，地点选在了克雷姆斯。那晚下了雪，空荡荡的老城愈发寂静沉闷，我们面对当下的那个夜晚，仿佛那已是过去的夜晚，像记忆一样无声无形。白色的雪似乎不是真实的，而是一种柔软虚无的存在，像一个遥远黯淡的影像。

我是晚宴的主角，几个人围着我说话，一位的里雅斯特太太不失时机地加入了谈话。她嫁给了一个奥地利人，在一百公里外的林茨住了很多年，她很高兴在异国他乡见到自己的同乡，认为自己有权和主讲人攀谈一下。这位太太后来对我说，她表妹和我是同学，经常和她说起我，说起我们的友谊。“她其实不是我表妹，她是嫁给了我表弟。我想她，她当姑娘时叫什么来着……我一时想不起来。等一下。她姓什么，就在嘴边呢，她叫……”

不幸的是，我从来都没有过女同学，班里全是男生，我是在男生班级的汗臭中长大的。我对她说，这一定是个误会，但她坚持回忆起那个名字。我一直很讨厌那些打着心理学旗号的瞎扯，当然也不喜欢一些装神弄鬼的东西。她还在思索那个姓氏，让我惊异的是，我用平静的语气简洁地说：“您说的是诺丽·S 吧？但您记错了，我们不是同班同学。她一定不记得我，因为她不认识我，我们从来没说过话。”

我很吃惊，甚至比她更吃惊，自己竟然在那么多名字中说出了这个名字。她惊奇地加以确认，我却无暇去思考自己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从何而来。眼前这个健谈的女人，她明显的谎言、毫无疑问的误会让我很享受，我更愿意相信她，而不是根据科学推理，拒绝这种不符合事实的断言。“是的，当然是她，不过您是怎么猜到的？诺丽，我说真的，她记得您，她经常说起……”

我谦虚了几句，态度明确，也很温和，但我流露出像溪水一样清澈的幸福。这件事假得太明显了，诺丽·S 读高三时，我在读高二，她很美，遥不可及。她棕色的发卷在明媚的阳光下要显得浅一些，阳光会从高中教室开着或关不严的窗子洒进来，照在她的头发上。全校的男生都爱她，我们爱了她很多年，像卫兵一样忠诚而坚定。当她从走廊上经过时，旁若无人，若有所思。她让几百名新手明白，并永远记住那个景象：命运之外的东西写在她脸上，在她浅色的弯弯的眼睛里，比任何名垂千古的诗歌都更清楚。

对于一个十七岁的男孩来说，一个十八岁的迷人女孩比一位教授眼中的好莱坞天后更加遥不可及。通常我不会高估自己，也不会太低估自己，但事情一直是这样，我无法想象自己和诺丽之间的差距会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像每个“稍息、立正”的卫兵和风中飘扬的旗帜之间的距离，在所有男生对诺丽的爱恋中，我们明白了爱神的普遍性。爱神是绝对、普遍和神圣的，展现在每个人眼前，就像内沃索山的林中空地和米霍拉什卡敞开的海面。在那份没有例外的公开爱情中，我们都是兄弟，就像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一起面对光芒四射的未来，因为太年轻了，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我只是羡慕一个同学，他叫斯特凡努蒂，当然他在诺丽心里也没有任何分量，他因为单相思而被大家熟知和嘲笑；可以说他是官方的“不幸情人”，是我们大家的代表。显然他有做代表的天分，后来他出现在一些大会的代表席上，职位虽没有代表诺丽的爱恋者那么重要，但仍然具有代表性。

我很羡慕他，嘲讽和舆论让他和诺丽在某种程度上有公开的关联，不管是被拒绝还是一厢情愿，他们总是有某种联系，但我和诺丽没有，就连一些负面的、间接的联系也没有。实际上，我认识她，但她不认识我，就像我知道美国总统长什么样子，他却不知道我一样。所以诺丽不可能跟这位太太说起我，因为她不知道我的存在，我们俩从来都没说过一句话，我不可能成为她句子中的宾语。毫无疑问，她的语言中即使没有我，也会像海鸥的飞翔一样和谐流畅。当时，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处境让我很享受。那位太太和我套近乎，因为她表弟的妻子和我很熟悉，她以为，我那晚上短暂的辉煌也可以让她脸上有光。但唯一的可能是——尽管没有任何根据——诺丽谈到我，对我来说是无上的荣耀，就像给我

戴上了一顶奥林匹斯桂冠。

那位太太还在坚持自己的说法，说她所言全是真的。我对那位太太说，我很高兴，也很感激她善意的谎言。尽管我知道那是谎言，但我整个晚上都会很开心，那会像音乐一样萦绕在我耳边，激发我的想象，虽然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然而，克雷姆斯的这个夜晚于我而言只是一个讽刺而甜美的序曲，让我在不久后扳回一局。差不多一年后，在罗马，我和一个朋友谈起以前的高中同学时，他告诉我，几个星期前在海边度假时，他遇到了诺丽，说她提到了我，谈起了我的很多事。那时尽管已经很晚了，但我实在忍不住打通了岛上那家酒店的电话——他们就是在那意外相遇，并在海滩上聊了一会儿。在等电话接通时，我意识到这通电话很奇怪，然后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我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说几个月前在克雷姆斯，她表姐——那位太太告诉我……很冒昧……但我很快被电话另一头的声音打断，她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开始和我寒暄，就好像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所以，我就像斯韦沃笔下的那个老人？多年后的一个傍晚，他才和少年时遇到的女孩建立了联系完成了记忆中的心愿。那是他在多年之前的一个夜晚隐约看到的女孩，或者说，半个世纪前，他其实并没有燃起爱火，因为在当时，生命的光芒被生活的焦虑所遮蔽？夏日的微风从电话旁边的窗子吹进来，那是来自无限空间的风，一切都同时存在，行星的公转和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恒星的光芒。也许克雷姆斯附近的多瑙河就是环绕世界的海洋，水在流动，同时瞬间又回来，海岸一直倒映在大海的波浪中。

时间是因果关系的核心：原因产生结果，原因在结果之前出现，从一个结果出发，人们可以追溯到产生它的原因。因此，电话里那种亲切的语气，是过去相互认识和熟悉的结果，它修改了结果，回到过去，产生了几十年前不存在的东西。是的，时间是因果次序，但如果原因在时空中的传播速度一直低于光速，我心想，我努力回忆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还问了物理学家朋友，都没有得到理想的解释。狭义相对论可以肯定这一点：两个事件在低于或等于光速中运行，不能通过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不能以绝对的方式安置在时间中。

所以，我和诺丽住在林茨的表姐交谈、和她在电话里聊天是原因，还是结果？也许两者都有，这多混乱，多迷人——这是我和诺丽熟悉的原因，这种熟稔应该出现在四十年，不！差不多是六十年前，在克雷姆斯附近流淌的多瑙河水已经流入黑海了吗？为避免混乱，我们应该改革语法，将动词的其他时态去掉，只留下现在时。诺丽走在高中的走廊里，这就像巴门尼德的“存在”，这不是过去，也不是将来，只是一种现在？时间——灵魂的延伸，这是圣奥古斯丁说的。我的灵魂已经延伸开来，拥抱了我当时不在的时间？我更希望诺丽的灵魂拥抱了我——广阔心田上的一个点，一切都在里面，一切都说得通。

她的发丝，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颜色更深一些。夜幕已经降临在海面上，没有月亮，但天空很明亮，地平线上还有一抹亮光；白色的浪花拍打在海岸上，向后退去，又回来，她就在那里，脸上是明媚的笑容和对世界的爱意。有一次，学校组织高中最后一年的学生去米拉马雷城堡参观那个著名的物理研究中心，它就建在迷人而媚俗的城堡公园里。一位缺乏远见的大公贸然从这里出发，成为了一个注定要走向死亡的皇帝^[3]。“物理学的共形场论，也概括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是学习之旅，聆听杰出科学家的讲座，也是参观的一部分，校长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几何实体，使人想到巴门尼德关于永恒的概念……”

那声音从许久以前传来，听起来富有磁性，流露着一丝得意。海风吹动一簇簇叶子，风穿过柏树和榉树，那是马克西米利安和夏洛特种在这座花园里的，圣人和死者的岛屿。倾听或者没倾听，声音散落在记忆的回声里，同学中有人时不时扔出一块石头，同心的涟漪在公园池塘里一点点扩大。那时声波已经把这些话传到礁石和树叶之间，城堡脚下有一座大理石狮身人面像，它望着神秘的大海。这些话通过耳道和耳膜，传递给听众理智而有教养的神经元突触。大家都很高兴能有那次机会，就像任何记忆深刻的讲座，那些话还在继续传播，传到城堡前幽暗的树林里——除了靠海的那边没有树，茂密的树林从三个方向环绕着那栋白色的忧伤城堡——还继续在传播。从那一刻起，一年年的时光，像从公园的中心喷泉向每个方向延伸出来的小路，在经历那么多年稠密的时光之后，到了我这里，回荡在我的心田里，荡起了波浪。今天，现在……这是什么意思？那个特别健谈的演讲者坚持说，今天和昨天，现在和明天，之前和之后，都只存在于脑子里。我们的脑子反复无常但很专制，决定把“之前”放在这里，“之后”放在那里。

因此，现在是何时？是永远，虽然有时只是一秒，白兔先生对爱丽丝说。奇境和镜子的另一面是任何地方，也是永远，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另一面，没有任何另一秒。如果事情就像那个教授说的，不仅仅是动词时态，包括时间副词和介词都要被取缔。共形场论，几何体，“之前”和“之后”只存在于大脑中——在这个专横的头脑中，很麻烦，很混乱。

现在，现在的诺丽和我……她脸上明媚的微笑；清澈的流水，大海深处的云，透明的心。那些话延伸出来，环绕着大海，到达演讲者的肩头，地平线的直线变得弯曲，穹庐四合……假如在时空中，按照演讲者的说法，时间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在一个巨大的实体上，时间可能会是一条闭合的线，或者呈圆形。这样一切都会回到原处，我已经去过多瑙河的入海口，我正在这里，与此同时，我正随着流水追上它。

至少对于某些来自维也纳的人来说，克雷姆斯排在迪恩施泰因前面。一九一八年，有人从亚得里亚海滨的公共建筑上撤下了双头鹰标识，属于奥匈帝国的的里雅斯特成为意大利领土，一九八九年，柏林墙被推倒，而宇宙大爆炸发生在一百四十亿年前，有人这么说。一年意味着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一天是地球自转一圈。但当地球和太阳都不存在时，年月是什么？在那些不存在的年份里，能存在和发生什么事呢？无论如何，在一年年的时间里，战争起起落落——落在哪里？伤口还在，就像身上的纹身，在世界和个人的皮下燃烧。地球仪很光滑，手轻轻触摸地球仪多彩而圆润的表面，在蓝色的水面之下，在那些遥远的岛屿，都是流血和腐烂。子午线像切开一个橙子那样，把地球切成一份份，船只切断那条线，就像切断了时间。有那么一刻——这是什么意思？不，不是一刻，是几分钟——船头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船尾在二十六日，是的，也可能正好相反。日期的分界线，一份爱向前，另一份退后——明白吗？这都是在时间里，否则还能在哪里？而如果爱情就像那条线，那条看不见、不存在的子午线，只是一种纯粹的共识呢？

[1]Vineta，传说中的海底城市，位于波罗的海南部海岸。

[2]克洛斯特新堡是维也纳北部小城，有“修道院之镇”的称号。下文“埃斯库里亚尔”是西班牙小镇，其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宗教建筑群之一。

[3]指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Maximiliano I, 1832—1867)，奥地利大公，1864 年在拿破仑三世的怂恿下，接受了墨西哥皇位，后被墨西哥军事法庭处决。



克劳迪奥·马格里斯

意大利作家、批评家、翻译家，《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其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作家和文学哲学家之一”。出生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先后任都灵大学和的里雅斯特大学教授。创作大量小说和随笔作品，主要作品有《微型世界》《多瑙河》《另一片海》，曾获斯特雷加文学奖、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奥地利欧洲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德国书业和平奖等。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Igor Starkov](#) on Unsplash

小说

美是一种伤

埃卡·古尼阿万 | 新书试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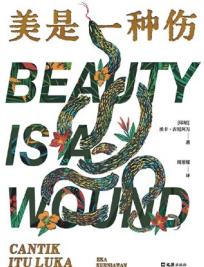
狂野而荒蛮，
一部融合了历史、神话和屠戮的史诗

2002年，《美是一种伤》以印尼语在印度尼西亚出版。2015年，该书的英文译本出版，随即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轰动，多家权威媒体纷纷给出高度赞誉，称本书是“东南亚版《百年孤独》”。

《纽约时报》将本书列为“百部值得关注的图书”，认为“作者古尼阿万熟练地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他笔下的哈里蒙达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展现了人们如何被历史的洪流虏获、搅扰、裹挟和淹没”。

《出版人周刊》评价本书是“一部融合了历史、神话和杀戮的史诗，包罗万象，令人难忘。它比《百年孤独》更暗黑”。的确，在《美是一种伤》繁茂的故事丛林中，不只有妓女、殖民者、侵略者、游击队员和各种蛇虫鸟兽，还会时不时出现罗摩、鬼魂和飞升的精灵。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美是一种伤》第一章的部分，分享给读者。



三月一个周末的午后，黛维·艾玉从她的坟里爬出来，这时她已经死了二十一年。在鸡蛋花树下打盹的一个牧童醒过来，尖叫着尿湿了短裤，他的四只羊在石头和木质墓碑之

间逃窜，仿佛有只老虎扑到了它们中间。一开始，从一片老墓地传来一阵声响。老墓地上有块没刻字的墓碑，周围草长及膝，不过谁都知道那是黛维·艾玉的墓。她享年五十二岁，死了二十一年又活了过来，从此以后，谁也不知道她的年纪究竟该怎么算。

牧童把发生的事告诉了附近的人，他们赶到墓地。有的卷起布裙的裙脚，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抓着扫帚，有的身上还沾着田里的泥巴，他们聚在樱花树丛和桐油树后，以及附近的香蕉园里。没人敢靠近，他们就像聚在那个每星期一早上在市场叫卖的卖药郎周围一样，只远远听着从旧坟墓里传来的骚动。那景象令人不安，但众人乐在其中：要是独自一人，肯定会被那样的恐怖景象吓得半死，但他们不以为意。他们甚至期待出现某种奇迹，而不只是一座吵闹的旧坟墓，因为埋在那块地里的女人战时曾是日本人的妓女，而奇阿依总是说，沾染罪孽的人在墓里必受惩罚。那声音想必是天使折磨人的鞭子声，而他们听腻了，渴望其他小小的奇迹。

奇迹出现时，场面实在不可思议。坟墓震动、裂开，地面爆裂，好像底下发生了爆炸，引起了小型地震和风暴，杂草和墓碑飞散起来，飘落的尘土宛如雨幕，其后是一个老女人站立的身影，她看起来恼怒又僵硬，身上还裹着尸布，仿佛前一晚才被埋下似的。人们歇斯底里地跑开，场面比羊群逃窜还要混乱，齐声的尖叫在远方丘陵的山壁上回响着。一个女人把她的宝宝丢进了灌木丛，孩子的父亲错把一截香蕉茎当成孩子来安抚。两个男人纵身跳进一条水沟，有些人在路边昏了过去，有些人拔腿就跑，一连跑了十五公里才停下来。

黛维·艾玉将一切看在眼里，她轻咳一下，清了清喉咙。她发觉自己置身一片墓地中，很是惊奇。她已经解开裹尸布最上面的两个结，正要解开最下面两个，好让双脚自由活动，方便行走。她的头发神奇地长长了，所以当她甩动头发，它们从包裹的棉布里松脱，在午后的微风中飘动，扫过地面，像河床上的黑色地衣一样闪亮。她的皮肤布满皱纹，脸庞却白皙发亮，眼窝里的双眼恢复了生气，盯着旁观者——他们正要离开灌木丛后的藏身处，一半人跑开了，另一半人昏倒了。她自顾自地抱怨人们将她活埋，这实在可恶。

她最先想到的是她的宝宝，不过宝宝当然已不再是宝宝了。二十一年前，她在生下一个极丑的女婴十二天后过世。那个女婴丑陋至极，连她的接生婆都不确定那是否真的是个婴儿，而怀疑可能是坨屎，毕竟婴儿出生的洞口和屎出来的洞口仅相隔两厘米。不过这个婴儿会扭动、微笑，最后接生婆判断她确实不是屎，而是一个婴儿，于是对婴儿的母亲说孩子生下来了，很健康，看起来很亲人。黛维·艾玉正虚弱地躺在她的床上，显然没兴趣看她的小孩。

“是个女孩，对吧？”黛维·艾玉问道。

“对，”接生婆说，“就像之前那三个宝宝一样。”

“四个女儿，个个美丽。”黛维·艾玉的语气厌烦至极，“我该开个妓院才对。告诉我，这一个有多漂亮？”

接生婆怀里的婴儿被紧紧包在襁褓中，此时开始扭动哭泣。房里有个女人忙进忙出，拿走沾满血的脏布，丢掉胎盘。接生婆一时没有回答，因为那个宝宝看起来像一坨黑屎，她怎样也不能说宝宝漂亮。她尽量忽略这个问题，说道：“你已经年纪不小了，我想你应该没法喂奶了。”

“的确，我已经被前三个孩子榨干了。”

“还有上百个男人。”

“一百七十二个男人。最老的九十岁，最小的十二岁，那是他割完包皮一星期后的事。他们我全记得。”

婴儿又哭了接生婆说她得替小家伙找母乳喝如果找不到就不得不去找牛奶或是狗奶，甚至老鼠奶。黛维·艾玉说，好，去吧。接生婆瞥向婴儿难看的脸庞，说道：“可怜的不幸的小女孩。”她甚至无法形容婴儿的长相，只觉得她看起来像一头受到诅咒的地狱怪物。婴儿全身乌黑，好像被烧过，外貌古怪难辨。比方说，她不确定婴儿的鼻子是鼻子，因为跟她这辈子见过的任何鼻子比起来，那东西更像是插座。而婴儿的嘴让她想起存钱罐的投币孔，耳朵看起来像钢把手。她确信世上没有任何生物比这个悲惨的小东西更丑陋，如果她是神明，恐怕会立刻杀了这个婴儿，而不是让她活下来；这世界会无情地欺侮她。

“可怜的宝宝。”接生婆又说了一遍，然后才去找人给她喂奶。

“是啊，可怜的宝宝。”黛维·艾玉说着，在她的床上翻来覆去，“我为了杀你，能做的事都做了，却没成功。我应该吞下手榴弹，让手榴弹在我肚子里爆炸才对。唉，不幸的小东西——就像恶人一样，讨厌的家伙不会轻易死去。”

起先接生婆试图遮住婴儿的脸，不让过来的邻家妇女看到，但她说她需要奶来喂婴儿时，她们争相推搡着想看婴儿；认识黛维·艾玉的人觉得来看看她迷人的小女婴一直都很有趣。她们拼命想要拨开婴儿脸上的布，接生婆挡也挡不住，但她们一见到婴儿就惊恐地尖叫；

她们这辈子从没经历过这样恐怖的事。接生婆微笑着提醒她们，她已尽可能不让他们看见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面容。

这场骚动之后，接生婆匆匆离开，而他们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表情宛如记忆被突然抹去的白痴。

最先从突发失忆状态恢复过来的女人说：“就该杀了她。”

“我试过了。”黛维·艾玉出现在她们眼前，只穿了一件皱巴巴的家居服，腰间系了一条布。她的头发乱成一团，好像斗牛之后蹒跚着离开现场的人。

人们同情地看着她。

“她很美，对吧？”黛维·艾玉问道。

“呃，对。”

“这世上的男人都像炎热天气里的狗一样肮脏，没有比生个漂亮女孩更可怕的诅咒了。”

没有人回答，她们很清楚自己在骗她，只好一直以同情的眼光看着她。罗西娜是多年来一直服侍黛维·艾玉的哑巴女孩，她在浴缸里放好热水，带黛维·艾玉去浴室。黛维·艾玉泡在浴缸里，用了芬芳的硫黄皂，哑巴女孩用芦荟油替她洗头发。发生这些事之后，似乎只有哑巴不觉得困扰，尽管她一定已经知道了那个极丑的小女孩。毕竟接生婆工作的时候，只有罗西娜在旁边。罗西娜用一块浮石揉搓黛维艾玉的背，用毛巾包住她，等她一走出浴室，就着手清理。

有人想让阴郁的气氛轻松起来，于是对黛维·艾玉说：“你得替她取个好名字。”

“是啊，”黛维·艾玉说，“她的名字叫‘美丽’。”

“噢！”人们惊呼道，尴尬地劝她打消念头。

“叫‘受伤’如何？”

“或是‘伤口’？”

“拜托别给她起这个名字。”

“好啊，那么她就叫‘美丽’。”

她们束手无策地看着黛维·艾玉走向房间穿衣服。她们只能面面相觑，难过地想象一个黑如煤灰、脸中央有个插座似的鼻子的小女孩，却叫“美丽”这种名字。真是丢脸的丑事。

然而，当黛维·艾玉发觉不管她是否已活了整整半个世纪，总之她又怀孕了的时候，她确实曾设法杀死胎儿。她不知道她其他孩子的父亲是谁，这次也不例外，不过和其他孩子不同的是，她完全不想让这个宝宝存活。于是她就着半公升苏打水，吞下她向村里医生讨来的五颗强力解热镇痛药，那几乎要了她自己的命，但结果还不足以杀死胎儿。她想到另一个办法，叫来一个愿意帮忙的接生婆，将一根小木棍插进她的肚子里，想杀掉胎儿，之后再把胎儿从她子宫里弄出去。她大出血长达两天两夜，小木棍变成碎片排了出来，但胎儿还是继续长大。她试过另外六种办法，想战胜这个胎儿，全都徒劳无功。她最终放弃了，抱怨道：

“这家伙真厉害，显然会在这场战斗里打败妈妈。”

于是她任由自己的肚子愈来愈大，七个月时举办了共食仪式，最后让宝宝生下来，不过她没看孩子一眼。在这之前，她已经生了三个女孩，全都貌美如花，简直像分三次陆续生下的三胞胎。她对那样的宝宝已经厌倦了，按她的说法，她们就像商店橱窗里的模特，因此她不想看她的女儿，确信她与三个姐姐没什么不同。黛维·艾玉当然错了，但她还不晓得她的小女儿实际上多么令人反感。就算邻家妇女偷偷地小声说那个宝宝活像猴子、青蛙和巨蜥胡乱交配生下的后代，她也不觉得她们是在谈论她的宝宝。当她们说到前一晚森林里曾有野狗嗥叫、猫头鹰飞进鸡舍，她也完全没把这些事当成噩兆。

她穿好衣服就再度躺下，她生了四个宝宝，活了半个多世纪，突然对这一切感到疲惫不堪。然后她难过地领悟到，如果那个宝宝不想死，或许该死的是母亲，那样一来，她就用不着看宝宝长成年轻的女子了。她爬起身，踉跄地走到门口，看着屋外的邻家妇女；她们还聚在一起讲那个婴儿的八卦。罗西娜感觉女主人有事要吩咐，于是从浴室出来，站到黛维·艾玉身边。

“帮我买条裹尸布。”黛维·艾玉说，“我已经让四个女孩诞生在这个该死的世界。是时候迎接我自己的送葬队伍了。”

妇女们听了尖叫起来，瞠目结舌地看着黛维·艾玉，一脸痴呆样。生下极丑的婴儿固然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但就这么抛下她更加令人发指。可是她们没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只是劝她别傻傻地死去，说有人活了一百多年，黛维·艾玉还年轻。

“如果我活到一百岁，”她平静自持地说，“就会生下八个孩子。那太多了。”

罗西娜拿来一条干净的白棉布，黛维·艾玉随即披上——不过这并不足以让她立即死掉。于是，正当接生婆在邻里间走动，寻找处于哺乳期的女人（尽管这白费功夫，最后只好给

婴儿喝淘米水），黛维·艾玉却平静地包着一条裹尸布，怀着异常的耐性躺在床上，等待死亡天使降临，将她带走。

等到喝淘米水的时候过了，罗西娜喂宝宝喝牛奶（在商店售卖时被称为“熊奶”），而此时黛维·艾玉还躺在床上，不让任何人把那个叫“美丽”的宝宝带进她的房间。不过宝宝模样骇人、妈妈裹着尸布的消息像瘟疫一样迅速地传开，不只是引来邻近地区的人，还有人从最偏远的村落前来，想目睹这件被传为如先知诞生般的事件。他们将野狗的号叫与耶稣诞生时东方三博士看到星辰相比，将裹着尸布的母亲与筋疲力尽的马利亚相比——这样的类比颇为牵强。

访客脸上的表情就像一个小女孩在动物园里抚摸老虎宝宝那样，他们摆着姿势，让流动摄影师替他们和极丑的婴儿合照。之前他们已对黛维·艾玉做过同样的事。她还神秘安详地躺着完全没有被无情的喧闹所扰。一些患了重病或不治之症的人跑来，期望碰碰婴儿，罗西娜急忙阻止，以免这种行为让婴儿感染到病菌，不过她提供了几桶美丽的洗澡水作为替代。其他一些访客或是希望讨点赌桌上的运气，或是想要顿悟生财之道。对这一切，哑巴罗西娜作为宝宝的守护者立刻挺身而出。她为这些需求准备了捐款箱，箱里迅速装满访客的卢比钞票。这个女孩明智地预料到黛维·艾玉最后可能真的会死，于是利用这极为罕见的机会赚了些钱。她根本不指望美丽的三个姐姐会出现，有了这些钱，她就不用担心熊奶，也不用担心未来她不得不与宝宝在屋内相依为命。

然而有位奇阿依将这整件事视为异端，带来了警察，因此这场骚动不久就平息了。那位奇阿依大发雷霆，命令黛维·艾玉停止无耻的行为，甚至要求她脱下裹尸布。

“你这是在要求妓女脱衣服，”黛维·艾玉轻蔑地说，“所以你最好有钱付给我。”

奇阿依急忙祈求上天宽恕，然后便走了，一去不回。

现场又只剩下年轻的罗西娜，无论黛维·艾玉以什么形式展现自己的疯狂，她从来不以为意，由此可见，只有这个女孩真正了解这个女人。早在黛维·艾玉试图杀死她子宫里的胎儿之前，她就说过她生孩子已经生腻了，所以罗西娜明白她在期待什么。邻家妇女对八卦的热情更胜于狗对吠叫的热情，如果黛维·艾玉对邻居妇女说那样的话，她们一定会露出轻蔑的微笑，说那只是空话——她们会说，不再卖身，就永远用不着担心被搞大肚子。不过，偷偷告诉你：那种话大可对其他妓女说，但别对黛维·艾玉说。她从不觉得她有三个孩子（现在是四个了）是一种身为妓女的诅咒，她说，如果女孩们没有父亲，那是因为她们确实没有父亲，而不是因为她们不晓得自己的父亲是谁，更不是因为她自己从没和某个家伙站在村长面前。她觉得她们是恶魔的孩子。

“因为撒旦和上帝或其他神明一样，都喜欢找乐子。”她说，“就像马利亚诞下上帝之子，般度的两个妻子诞下她们的神之子，我的子宫则是恶魔散布种子的地方，于是我诞下恶魔之子。罗西娜，对此我已经厌倦了。”

一如往常，罗西娜只是微笑。她不会说话，顶多吐出破碎的呢喃，但她可以微笑，她也喜欢微笑。黛维·艾玉非常喜欢她，尤其是她的微笑。黛维·艾玉曾说她是象女，因为大象总是在微笑，即使再如何生气也是一样，几乎每年年底都会进城的马戏团里的大象就是这样。罗西娜有一套自己的手语，哑巴学校里学不到，必须由她亲自教授。女孩用手语告诉黛维·艾玉，她不该觉得受够了——甘陀利为持国诞下百子，而她的孩子连二十个都不到呢。黛维·艾玉听了哈哈大笑。她喜欢罗西娜孩子气的幽默，她在反驳时还笑个不停；她说甘陀利不是分好几次生下一百个孩子，而是生下一坨大肉块，那坨肉块变成了一百个孩子。

罗西娜就这样愉快地继续工作，完全不觉得困扰。她照顾宝宝，一天进厨房两次，每天早上洗衣服。而黛维·艾玉几乎一动不动，活像一具等人替她挖好坟墓的尸体。她饿的时候当然会爬起来吃东西，每天早晨和下午会上厕所。但她总会回来裹上尸布，僵直地躺下，双手盖在肚子上，闭着眼，嘴唇弯出一抹淡淡的微笑。有几个邻居从敞开的窗户偷看她。罗西娜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嘘声，想赶走他们，但都徒劳无功，而人们会问黛维·艾玉为什么不干脆自杀算了。黛维·艾玉忍住她惯常的挖苦，默不作声，动也不动。

生下丑陋的美丽后第十二天的下午，等待已久的死亡终于降临，至少大家是这么认为的。那天早上出现了死亡将近的迹象。黛维·艾玉吩咐罗西娜，说她不想要自己的名字写在墓碑上，她只想要一句墓志铭：“我生下四个孩子，然后死去。”罗西娜的听力好得很，而且能读会写，于是原原本本记下那句话，然而黛维·艾玉的吩咐随即被主持葬礼的清真寺的伊玛目拒绝了，他觉得如此疯狂的要求会让整个情况变得更加罪恶，于是他擅自决定在这女人的墓碑上不刻一字。

下午，有个在窗外偷看的邻居发现黛维·艾玉陷入了安详的沉睡，只有时日不多的人才会这样。不过不只如此——空气中弥漫着股硼砂的味道。硼砂是罗西娜从面包店买来的，人

们有时会把它和牛肉丸混在一起，而黛维·艾玉将它与尸体防腐剂一起撒在身上。罗西娜放任这个一心求死的女人为所欲为，即使要她挖座坟将黛维·艾玉活埋，她也会照做，她把这些事视为女主人独特的幽默感，然而无知的偷窥者不这么认为。一个女人从窗口跳进来，她深信黛维·艾玉已经做过头了。

“睡遍我们男人的婊子，听着！”她愤恨地说，“你要死就死，可是别做尸体防腐，因为唯一没人羡慕的就是你腐坏的尸体了。”她推了黛维·艾玉一把，黛维·艾玉的身体翻了过来，人却没醒。



埃卡·古尼阿万

印度尼西亚作家、平面设计师，1975 年生于印尼西爪哇省打横市，毕业于印尼日惹加札·马达大学哲学系。擅长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因此文学评论界经常将古尼阿万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相较，称他是印度尼西亚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其作品已被译作 27 种不同语言，小说代表作《美是一种伤》被《纽约时报》列入“百部值得关注的图书”。2016 年，凭借小说《人虎》成为印度尼西亚首位入围布克国际奖的作家。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中国合伙人》(2013)剧照

非虚构

改革开放的长子 | 邓小平的信徒①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我们与四个人聊天，
讨论 1978 年以来的社会种种。

他们试图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证明过去做对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显然是做对了什么事。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崛起与质疑是同步发生的，就是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大家还都将信将疑：这是可持续的吗？这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吗？这是脆弱的吗？这是真的吗？这种将信将疑与经济突然间的高速增长有关，与仿佛前一天还在讲的积重难返有关，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知道很多发展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有关——比如分配不公，比如产权与物权，比如理性，比如普适价值——与富裕在一个前现代的政治文明中是否有可能“真正”实现也有关，这是一个更原始的母问题。

张五常认为“做对了”的地方是“县”的主动性发挥到极致。他说中国的“县”的制度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重要而且新的东西在于既有制度的组合。

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中心，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中心，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的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中国的经济制度》，p162）

张五常给我们的启发之一，是单纯地看哪件事的“对”与“错”不足以解释一个复杂的磅礴的历史事件。如果去看世界史里权威学者对工业国家的崛起的总结，大约会看到同样的总结方式，并非单纯的牛顿力学、复式记帐法、蒸汽机、启蒙主义、地理大发现或者长子继承制发挥了作用，它们每一个都不可替代而且关键，但真正催生了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其后的所有进步，是所有这些东西的组合。

启发之二是万物其来有自，有时“做对了”那一部分并非原因，而是结果，即使我们一时因果不辨——这事发生的概率还挺高——“做对了”至少提醒我们不要“反其道而行之”。

启发之三是此一时彼一时，“摸着石头”过得了前面的河，未必过得了后面的，对于“做对了”的事，还是要随时关照，你都承认四十年发展凝固了别人上百年的时间，面对复杂的变化，就要知道彼时善因未必一直管用。

发展到今天，县制度的权力结构是不容易拆除的了——这是支持着可以乐观地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可持续一段长时日的主要原因。困难在于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管制，对处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讯，以及庞大的有垄断性的国企。（《中国的经济制度》，p167）

我们找了四个人聊一些“大问题”。

他们共同标签差不多有这样几个：

知识分子出身，且有公共性，在十几年前会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现在当然也可以，只是自从“公知”被污名化，大家回避了这个称呼；

大体上都是媒体人，其中萧先生虽然不做媒体内容，但他是媒体法务专家，熟悉媒体运作和媒体生产每个环节，同时自己也是一位作家；

都称得上成功人士；

他们有自己的表达渠道，并且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说，他们不同程度上是有话语权的人；

他们因此也会有自己的“粉丝”，更准确地说是意见相近的人；

当然，更有反对他们的人。

我们与他们熟识程度不一，聊天时间不等。在与他们聊天之前，我们都假定他们是真诚的，也就是说他们采取什么立场或者代表某个群体说话是出于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理性思考，而不是被太多利益纠缠。

聊下来，我们也相信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们的思考是认真的。他们得出的结论当然不尽然相同，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1978 年以来又持续发展了四十几年，每个人都会有所侧重，这与他们的学识和专业有关，也与他们个人经历有关。

我们前面说到因为成功或者富裕（或者说是成功以及富裕的表象——他们几个人对此有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来得过于突然，所以他们始终处于一种试图去把握它的状态，其间可能经历得要更复杂一些：不但要审视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也要审视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见识水准，或者干脆要审视自己——审视意味着他还有可能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在这四个人身上这一点还不够明显，很多人证明了这一点。但不管怎么样，这种审视和调整显然有一个巨大的好处：保持冷静。这是我们能确认的富裕社会和理想吗？

胡先生可能是中国最有名气的主编。即使《南方周末》在鼎盛时期，人们也很少在意它的主编是什么人。胡先生不一样，他在中国的舆论市场上开始传递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个人的身份渐渐变得更重要，而他恰好是个喜欢抛头露面的人。他主编的这份报纸最初被人蔑视地称为一份“民粹主义小报”，这么说对它不是很公道，如果看它的出身，它的母报是《人民日报》，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如果从它热衷于民族主义话题、和对战争、对敌对势力夸大甚至捕风捉影的报道上看，它符合全球范围内对“小报”的标准定义。它把自己定位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地缘政治媒体，借助它母报的全球记者资源，看上去确实很权威的样子，但它志不在此，它似乎从开始就笃定了要去迎合某种“情绪”。从它诞生那天起，它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市场化”的报纸，这类报纸往往更重视对问题的报道、特别是批评性报道；它也不像中国的官方媒体如它的母报那样，四平八稳、韬光养晦，不苟言笑，胡先生的报纸还是有一种煽动性，有的时候甚至不惜冒犯官方的政策取向。

胡先生显然有足够的经济头脑，他很会撬动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将之变成自己报纸的销量和广告收入，最初的时候还不用“爆款”“流量”“带节奏”这样的词，而是用吸引眼球、有冲击力、“好卖”之类来形容，他证明他是把握流行的行家里手。即使不考虑这一点，他也是最早把报纸送上飞机免费阅读的人。他明白，展示是最好的广告，虽然在麦克卢汉的表达体系中，这被称为“贿赂读者”，但在纸媒走下坡路的时间里，它被称为“有效发行”或者“精准发行”——高净值人群的高到达率的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胡先生很自豪于这一点，虽然他与他的竞争对手在微博上争夺粉丝、阅读量、评论量、转发量，甚至更直白地说，在意识形态上竞争得不亦乐乎，但在他们的传统本行——报纸发行量和内容竞争领域，他的对手大多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他总是会轻描淡写地指出“他们没有读者”这一尴尬现实。胡先生认为自己是“真正有读者的人”。

我们见到胡先生的时候他即将退休。“我，六〇年的。你们说的这个年龄段，有点意思，九五年到〇五年，掐头去尾，取个中间值，平均是 2000 年出生的人，跟我正好差 40 年。奥运会时八九岁，能看懂一些东西了。太小没有判断力，”他说这些人跟他小时候不一样，“我小时候绝对贫困，被人看不起，2000 年出生的人，社会舆论和环境、心理、对国家认知，都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对国家感受不一样，这个国家挺有力量的。”

这是胡先生一直想跟公众说的话。准确地说，他是一个宣传工作者。

“他们对中国的感受，应该是改革开放差不多的感受。改革开放已经成型了，他们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果实里了。改革开放拓宽了中国的视野，改变了中国行为方式社会规则，他们是这一代，跟我们那一代有本质的区别。”

胡先生管自己这一代叫“改革开放的长子”，他 18 岁上大学，1978 年，正好改革开放。在 18 岁之前，“小时候我们乱七八糟的，也没什么学习，文化大革命什么的我们都经历了，但我们可以作为孩子经历的。更大一点的他们经历的是痛苦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游戏的文化大革命。”胡先生说文化大革命对他们这一代“正好”，一天到晚瞎玩，不上课，“不上课不挺好的吗”，大多数人不会有意识地去比较，“我没有父母被迫害，很少，我也有一个奶奶因为出身地主被赶回老家了，但没有啥痛苦，或者痛苦很小。”

“等我们十八岁想着展开自己人生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有改革开放，使我们有上升的人生。”胡先生说的“改革开放的长子”身份，有“长子”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潜台词于其中；年轻一代也认为胡先生这一代是“长子”，只是他们理解的是“长子继承制”，是时代“不公平”的关键所在：海量机会都被长子们拿走了，轮到他们几乎一无所有，甚至是被剥夺的。至于被谁剥夺，父辈的贪婪、政策不再支持，还有马太效应下的过去的成功者、企业家、早起的鸟……资本。他们不大敢指责政策的“不是”，只能说父母、说资本，资本又最容易拿来说事情，所以突然用那点政治经济学知识来对抗资本来了：一定是资本剥夺了年轻人。

胡先生不认为长子占了什么便宜。“我们年轻时的感觉跟他们今天感觉是一样的。我们感觉获得的东西多，收获了改革开放的果实，那是回过头来看的。当年谁会有这种想法？那时候，每一步也都是死拼、血拼，哪一步都不能输，哪一步白白给你机会了。”

他又强调了一遍：“每一步都是血拼！”

胡先生说当年最大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没有钱”。“搞导弹的不如搞茶叶蛋的，不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嘛？那时候我们都很穷。倒爷们、敢下海的、最开始富起来的，都不是知识界，都是地痞流氓，社会低层次的。知识分子富起来都是九十年代后期了。我们当时说的一句话是，‘知识分子要想富，只有出国一条路’，有点开玩笑，出国带几个大件回来。”胡先生回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金钱，这种意识总的来说是 2000 年以后的事了。

“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是用今天的短时间的感受来和我们长期的收获来做对比。这种对比是不客观的。”

“可是，你们那时候‘主动’是有价值的，有回报的。”我们替现在的年轻人发问。

“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啊，实际上他们的主动性更强。我们当时毕业是分配的，我们现在可以自己选择，我们那是啥地方，部队里的教导队，相当于一个学校，基层的一个小中专，四周都是山的山沟里，很偏僻的。故意把部队建在山里，搞侦察啊技术啊什么的，情报工作。中专，我们没有选择的。”胡先生认为，还有一点是年轻人忽略的，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大得多。在他刚工作的时候，也是中国年轻人口最多的

时期，没有多少老年人，一家都有五六个孩子。如今小学校都全空了，年轻人少得多，经济规模又大，工作机会实际上是多的——我们的聊天发生在 2020 年秋天，那时候经济还不如两年多以后这么严峻，胡先生跟我们一样对未来一无所知，得出如此结论也不足为奇。

“首先，你看年轻人上大学机会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吧？然后，社会上提供的高收入工作也多多了，除了在中国国内，还有全球化，他们可以走向世界，而且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还处于一个优势地位。今天的机会确实比我们那时候多得多啊。基本盘，社会，经济体，这么庞大的经济体，年轻人数量在减少，总体上跟我们那时候怎么比啊？有人说了，我们那时大学生数量少，我是大学生，那是当时我争出来的啊。你现在也争啊，你现在争清华，争北大，不是跟我现在一样吗？我们那一届，全国一共招了 30 万大学生，大专院校，一共 30 万。现在你看有几百万毕业生，那你现在走到前 30 万里不就行了？如果说现在，年轻人觉得比我们那时候路更窄，纯粹是他妈的一种错觉，一种没出息的胡说八道。他就希望，这一来什么都有了。一到北京分套学区房给他，学区房，我们房子来得容易吗？”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人的苦，每一代都有每一代人的福，对吧？今天的人，如果羡慕上一代的人，这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牢骚。”

胡先生有点激动。想起了他们这一代的牢骚——“我们多少年都没有房子啊？”这是到了他发牢骚的时候。

我第一次分房，给我房子，三十多平米，简易楼，我 32 岁。32 岁我才简单楼，在那之前我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9 平方米的房子，结婚都是 9 平方米。

你说他们那一代人怎么跟我们这一代人比。你说要现在，不至于结婚住 9 平方米，他还可以租房子。32 岁，也不至于 30 几平方。我那房子是《人民日报》分的，在市里面，位置挺好，但太小了。我结婚早，24 岁就结婚了。孩子好大了。30 几平方米。两间屋子，一个大屋一个小屋一个过道，什么也没有，厕所厨房都在外面。大屋 14 平方米，小屋 6~7 平方米，中间小过道，四五米，小过道里搁一炉子，可以做饭，水和厕所都在外面。

以前住我妈那儿。我妈那儿一共 50 多平方米，还有我妹妹。我们那生活，走过来，他们看我们，我们到四十几岁逐渐逐渐好起来了。他们这时候看我们，哟，你们这一代人真好啊，不断变化。废他妈话，但是我们每一步都非常艰辛，真是，流血流汗流泪，他们没看到这些东西。这些年轻人，都这样，连我女儿都觉得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困难。这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如果强烈的话，是这一代人奋斗精神衰退的一种表现。

不是奋斗精神，是心理脆弱的一种表现。

胡先生大概觉得愤怒——哪怕是假意的愤怒——会显得很“爹味儿”，很快让自己平静下来，换到语重心长的频道：这不是要说服对方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通过人生慢慢体会”的过程。为了弥补这个因为愤怒而产生的隔阂，也为了自己有能力与年轻人共情，他说：“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是，生活没有希望。”

“你想想我们对生活有什么需求？我都到《人民日报》来了，29 岁来的，过两年都三十一二岁了，我对生活的设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就算，我能出几次国，这辈子大约能出几次国，能攒多少外汇。真的，当时就这样，弄点大件，这就是我当时的视野，人民日报的视野，普普通通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的视野。”

出国就是改善生活。胡先生解释出国的意义，第一层，做国际部记者，出国是受到重视的表示，工作的基本平台，开拓自己的工作平台，要不你就在国内当编辑，出国是事业上升的一个表现；第二层，改善生活，拿外汇。出国工资高，他说他刚出国的 1993 年，他和太太加一起，一个月有 300 美元，国内当时也不过是三五百块人民币的工资，1996 年回国的时候，两个人可以挣到 600 美元。

“当时在国外做保姆，美国记者带到南斯拉夫去的一个保姆，中国去的，那保姆工资跟我一样，也是 300 美元。胡先生总结，现在看美国，跟当时看他美国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他需要仰视，现在可以平等地看，好多东西可以理解了，现在看美国有新的感受，“人啊，穷是万恶之源啊。有的时候，人不能太穷，太穷会束缚你的视野，束缚你的行为，束缚你的行动能力。所以，中国真的是，这几年逐渐富裕起来了，视野也逐渐打开了。”

胡先生把自己定位成“随波逐流者”。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提到了他的那个同学，在航天部大院里的竞争者，当年的学霸，八十年代的出国精英。先知先觉者会更主动地选择自己的生活，他说像“扳道岔子”，人生就扳到另一条轨道上去了。“我是时代大潮中的随波逐流者，个人创造力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也不是特别主动。没出国，没下海，没去想这个事。”

高考，给我直接分到了军校。我没报军校，但军校扩招，它就从地方找分数还比较好的去。我没想过当兵，我报的是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理工科。突然就问我，军校你去不去？那时候能上个大学就不错了，能去就去呗，就到了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国际关系学院。跨度多大！不但改了科，还入伍了。那时候能怎么办？有一个上大学的机会就走了呗。那时候家里，几个妹妹都是普通工人，我爸爸是普通职员，也算是军人转业的老干部，但是非常低层次的。我们家就在工人社区里，非常普通的家庭。他算是离休，职员，就这样一个家庭。

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是应该大部分都是随波逐流。国家上升，赶上了，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我那个同学，一下子人跳到美国去了。这个我很吃惊。一下子就把命运转到另一边去了。他大学在邮电学院。就跟扳道岔一样，他扳道岔到另外一边去了，我们就一条铁轨，这太神奇了。这对我触动很大。

你想想，一个人如果消息闭塞有多可怕。我在我们部队里，大学老师跟我说，他开始招研究生了。因为我本人学习挺好，他鼓励我考他研究生。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考研一条路。

回学校问怎么考，只有两个月复习，专业课没有什么问题，很多公共课，我考不过去。没考上。第二年，老师突然跟我说，再考来不及准备了。政治啊，英语啊，都来不及准备。

我是学俄语的。第二年我去北外，看我同学，他们班里有一个军人研究生。我就问那个研究生，我说你是军人？他说是，我说军人可以考地方研究生？他说可以。我那天才知道，军人是可以考地方研究生的。然后我回去了，我就说我不考南外了，我考北外。南外是部队学校，可以考的，这是军队内部流动。北外，我跟部队讲，部队说不行，怎么可以考地方研究生，他们说根本就没说规定。我说我在北外看到了军人研究生，他们还说绝对不行。

我自己跑到空军司令部政治部，跑到门口，打电话，我说我是基层部队，人说你什么事，我说我查文件，人就放我进去了。我到政治部去查，我一条条找，找到了那条，军队的人可以考地方研究生，毕业以后回军队工作。那，先考上再说啊，我复印了这一条，回到部队，给部队看，部队这才允许。

“您这不随波逐流啊，特别主动。”我们说。

胡先生嘴上客气：“总得是社会给了你这样的机会。我随的是主流，我没有出国，没有下海，我一心按主流的方式来做，一心按规矩来做。我这回去准备考，结果考到北外第一名。好好努力，顺利上了北外。毕业想尽各种办法转业，那就是扳道岔，就是主动性。”

胡先生很爱惜自己在《人民日报》的工作，离开部队调到《人民日报》是他最重要的一次“主动出击”——他的这一次选择，可以说从山沟里重新回到“主流”的一次努力。所以，尽管其后他会对房子、对收入、对知识分子待遇有种种宏观或者微观的牢骚，“我们那时候骂得最多的是什么？凭什么知识分子收入这么低啊？那知识分子你下海去啊，你嫌收入低你干吗不下海去啊？这就是一个出口，情绪出口。”他可以回到“主流”中“随波逐流”了。

我就是随波逐流。我从来没设定过，跟党走。在人民日报，在单位里，你看我多少年没换过单位，好多人换单位了，换这儿换那儿。我就是把我的这个工作做到极致。

唯一的工作做到极致。人一己百。人做一遍，我做两遍。人工作十个小时，我工作十三个小时。就这么个东西。我没有任何对自己规划，谋略，战略啊，什么都没有。我根本就没有计划。我也特讨厌计划，单位里，我们一说要制定什么计划，要什么计划啊，都他妈假的，计划没有变化快。我说就一样，实事求是。我不是做媒体嘛，做媒体，我去波黑，去南斯拉夫，我到现场，上战场，不去战场干嘛啊？我干这个的啊。第一次去，不给报道，自己违规上战场，后来看我还行，就派我去了。我就做到极致。

互联网，是别人把我推上去的。我都不懂，人说你去上个微博吧。我都没见过那微博是什么样。他们给我注册的。一上去就被人骂。骂我。开始还不理解，我说怎么这样。那就呆着吧。他们轰我走，我想凭什么走啊，又不是你家的。我就跟他们骂起来了。不是骂了，就是……

这事儿我见得多了。我不在乎。我们单位，我做舆论，我要把舆论做好，想做好，你得说话啊。不说话哪来的舆论影响力啊。哪儿有影响力我去哪儿，哪儿人多我去哪儿。我就说实话，说我想说的话，不让我说，我想办法说出来。我就这么做。

“无所谓谁好谁不好，”对于现在的多元选择和过去的随波逐流，胡先生举了个还算急智的例子，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发明，“这就跟包办婚姻好还是自由恋爱好一样，包办婚姻，好歹是嫁出去了，自由恋爱，好多个剩女就出来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诉求，我们那时候就这样一个环境，没有什么去想的。”

“我们那时候是看不到今天的。20 几岁刚到人民日报的时候，哪里想到今天中国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辆车啊？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胡先生在说到“打死我”这几个字的时候咬得响亮，发自内心，“那会儿，这是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是电影里头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没有车不会生气，都没有妒忌，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就坐公共汽车。打死我我也想不到，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套房，房子里头还有什么都有，几居室什么的。就没想过这些事，生活中没有人跟我们提你的生活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当时人的视野很窄的。”

“我们能看到什么？前门那儿开肯德基，我们有多少人从北外去前门吃肯德基的？那都哪年了？至少八六年八七年了，那时我在北外读研究生，大老远从北外去前门吃肯德基去。诶哟，那排队排得老长。”他吃到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特别开心，他说这就是“包办婚姻”，没有什么可选的，好多东西都是从无到有。

我想起苏联人以前写过去美国访问，看到超市里出现十好几种香肠，感觉世界崩塌了一样……我问胡先生：“在从无到有这个过程当中，您的世界观发生过什么变化吗？那些想都没想过的东西都实现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您这个问题，还是小孩的那个问题，还是拿今天的世界跟昨天的世界去做对比，跟四十年前的生活在做对比。我们在思想、文章、书里进行这种对比很正常，但生活在当中我们很少比。实际上就是一天一天走过来的。今天比昨天好了一点，明天比今天稍微好了一点点，它不是一个对比的关系。不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然后我的思想就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东西是个渐变的过程。其实生活里，不都是非黑即白的，生活就是在灰色中前进的，灰色的，慢慢悠悠的，你也搞不清楚，一点点就前进了。”

他在说起六〇年的他与〇〇后正好差了 40 年的时候，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只是那个跨度是 10 年，“一代一代人，十年一比，就会有一点小差距，你看这差四十年，差距就大了，”他说他们这一代一天天一年年过来，不觉得有什么变化，但现在看 2000 年前后出生的人，就完全是“改革开放定义的人生”了——改革开放在他们人生意义上发生了作用。



题图为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2023)剧照

非虚构

胡先生的历史观 | 邓小平的信徒②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他说，我们走得太快了。

胡先生当然思考过这些问题，这些变化，这些“改革开放”打在年轻一代身上的印记，某种意义上他做“舆论工作”——他既回避了意识形态色彩过于强烈的、但本质上更准确的“宣传工作”，也很自觉地把“新闻工作”这样的词放在一边，这是一个“做舆论”的工作——的核心就是这个。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胡先生成为中国舆论场上知名度最高的人物，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诸多恶名与骂名。某种意义上他甚至不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与他政见不同的人会视他为小丑。

他很谦虚地说，这只是他的一些感受。真正能解答这些年变化与问题的，得听专家解读。

政治参与与平等

“互联网提供了平民、普通老百姓参与政治的绝佳机会，议政的绝佳机会。我们年轻时哪有这机会，政治离我们很远，我们也不谈政治。就像我们这些人，我读研究生的身份是军队的，走得已经很靠前了。我们从来不会去谈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应该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上边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些东西它到不了我这儿，不是我们操的心。社会也没给我渠道让我操这个心。”

不过，后来他在谈他的八十年代的时候，又很热情地说及往事，胡先生 1989 年 11 月正式成为人民日报员工，在那儿之前的春天身份还是北外的学生，“正是要毕业的过程当中，我一天到晚跟学生在广场上，我不跟北外的人在一起，我跟别的学校的在一块。我怕北外那帮小子把我告了，因为我是军人啊。策略还挺成功，我什么都闹，但我毫无踪影，审查的时候我啥事也没有。”

已经过了三十几年，胡先生提及过往精神放松，没有任何负担，有一种百家讲坛的轻松劲儿——我相信他此刻讲及此没有太复杂的心情，他当年的参与热情是事实上的“谈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那时，他应该也是真诚而且投入的——胡先生的恶名当中包括“投机分子”，我相信至少三十年前，还不是。“事件过去一段时间了，在书店里买书，有人买带子，买就买了，他还要放一放，放出来《国际歌》。唉哟，在书店里，我突然听见有人放《国际歌》，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

三十年后，他有一种当年“过来人”几乎都有的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那“不是我操的心”。紧接着的一句话，我相信他也是真诚的：“那时候人民日报最热闹了，集体游行。回过头来看，大多数都冷静下来了，当时我们没有这个视野。”

胡先生所没有的“视野”，指的是邓小平的视野，“邓小平多厉害啊。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出来一个魏京生，一出来就马上搞一个四项基本原则。我印象中，刚一改革开放，好嘛，一下子就乱了，就出了西单民主墙。毫不犹豫就给魏京生抓了，西方当时骂得多厉害！你看当时西方怎么说魏京生。The father of China democracy movement，中国民主运动之父！前几天我才看到还这么说。邓小平毫不犹豫给他抓了。”

“在广场上，天天晚上累了，就喊放《国际歌》！年轻人，经历了那段时光，如果说排练排练，让每个人都经历这么一段，挺好玩的。但是回过头来，学生那时候挺激烈的。你看后来我成了一个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者的话题暂且不谈，关于是不是可以谈政治，他有选择地忘记了他曾经不是那么保守主义的时候的热情。

胡先生会觉得现在的互联网才是真正的“参与”。“北京出租车司机那种都是信息，谁当外长啊之类的，那不一样。现在是什么，是国家政策国家道路的一个参与者，议政者。他要参与到这个当中，让国家按他说的这种方式来运转。虽然他的力量小，但是他觉着国家现在走这条路，他很生气；或者他觉得，你们怎么能这样！”

胡先生先是看到“打赏”，然后意识到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人与他是“平等”的，“你发现，他跟我是平等的，我们的资源和力量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心理上是跟你平等的。”胡先生出身于传统媒体，不可避免会有精英意识，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翻译成社会学的语言，他所经历的是言论的“民主化”，因为技术发展，普通人获得了与他同样的话语机会，而受益于言论“民主化”的人，与受益于任何“民主化”的人一样，会充分使用这个权利……直到有外力遏制了他们的发言机会，或者限制了他们的发言——用“算法”、或者用政策性强制性的手段。

“互联网给了人们参与政治，对社会进行价值评判的前所未有的机会。现在的年轻人处于这样的机会中，得到这样的机会，他们很开放，他们说这说那，国家朝哪个方向走，他们有权利表达。你看我们那时候，跟中央走，跟党走，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他觉得不足以说明问题，又加了一句，“能有你说话的份儿？”

他确实忘了他眼泪刷地一下流下来的时刻，那也是一种表达啊。

“现在的年轻人参与政治了，有一些人给他们灌输这个东西，他们就会觉得：欸，我们的生活有问题，是社会的责任，是社会不公平所导致的。我们过去也有农村孩子，使劲往上考，使劲往上折腾，做最大努力，他牢骚不牢骚也都是跟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怎么我就不行啊？怎么就轮不到我啊？他可能会抱怨单位，攻击目标比较小。”

胡先生时时不忘他和他的同学，他在航天大院里，他的同学条件比他好，好太多了，人家有大彩电，他们家小破电视，人家有电冰箱，家也宽敞，他们家五六十人一起挤在一起，“但我没那么多敌视，我觉得是正常的，我们关系一直都挺好，家庭条件不一样，但我们一块高考，一块参加竞赛什么的。没敌意。”

“现在怎么着，公知不是老说吗？影响到他们了，凭什么我一出生就跟他不平等啊？他们阶级意识比我们那时候要强，凭什么我就不行，我为什么考来考去，我只能考成这样。我学校不行，为什么我学校不行呢？”

胡先生用了两个词来定义这个现象，先是把它定位成是一种“情绪”，同时又以进步主义口吻说它是一种“启蒙”。“就这种情绪吧，这种启蒙是公知们对中国社会、社会公平所起的作用，这些作用在小孩身上确实产生了影响。”

移民与城市化

“很多人都会觉得，哟，我到北京来了。为什么到北京来呢？移民，这是相当于移民啊。你只要是移民，就会有移民的痛苦，全世界都一样。”胡先生现身说法，如果

当时他也参与到移民大潮中，他不会觉得在美国从底层做起就会抱怨，他不是不知道自己住的不如人家、收入不如人家，他会觉得这一切是自然的。但一个外省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来到北京、一个大学毕业留在北京，本质上同样是一种移民现象，但他可能就会更在意平等性问题。“在我们办公室里有很多这样的人，外交部里也有很多农村孩子，占一大半。外地的，家庭条件不好，容易有阴影，他们参与这种话题，对他们来说可以疏解压力，抚慰他们，他们会觉得自己挺舒服的。”

他觉得这也是一种政治参与，“对社会的大道路、大的价值框架，每个人都可以进行批判，人就参与进去了。平均看下来，宏大性，肯定超过我们那会儿。”胡先生似乎潜意识里还是要把它归结为即使年轻时他也“不是我们操的心”那个范畴。

这个时候，他还很体贴地不忘提醒我们：“每一代有自己的经历，成长环境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判断力的逻辑。总结中国可不容易，九五到〇五这一层，切面太大了。”

城市化与移民确实是个大问题。中国官方在 2022 年底的数据说，中国从 1978 年开始完成了接近 7.5 亿的城市人口增量，超过欧洲总人口。城市化从 1978 年的 17.92% 提高到 2022 年的 65.22%，中国城镇人口从 1978 年的 17245 万人到 2022 年的 92071 万人，增长 74826 万人。

他们基本上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两代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我们所说的“父辈”——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是塑造新的城市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城市里的新移民。与此同时，他们很多人还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获得财富的人，他们获得了机会，并且相信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还相信只要努力就会得到回报；而另一部分，我们的主角九五到〇五一代，很大程度上也是货真价实的“第二代移民”，他们几乎具有所有第二代移民的特征：第一代对标自己，相信世界是奋斗的结果，第二代的对标参照系则是所有移民地的同龄者；第一代恰好赶上整个国家的财富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第二代看到的世界都是天经地义存在的：柏油路、监视摄像头、父辈的财富、宽带、高铁……；第一代还关心它们得以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因缘际会最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WTO 带来了什么，制度本身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基础的法制环境对于规范发展的价值，第二代可能更多地看向自己……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很多年轻人已经把它作为“文物”来打量了。2000 年出生的人，在他们开始关注类似话题的时候，他们已经快退出公共舆论平台了——在他们那里，甚至没有一个“污名化”的过程，跟天经地义就存在的高铁一样，他们接触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它就已经是污名化的了。

“公共知识分子最活跃的时候在 2011 年和 2012 年，微博高峰期跟公知的高峰期是同步的，2009 年起步，高峰是那两年。”胡先生对公知话题有足够的发言权，他是现场的一分子，虽然他几乎是所有公共知识分子调侃的对象，“公知得客观评价，他们有积极作用，当然有积极作用，推动了社会进步。”作为与公共知识分子对抗的最后的赢家代表，他很大度。

“但走过头了。什么事就是这样，就跟美国人对中国人权施压，我在社论里写过，它有积极的一面，推动了中国给我们输入一些人权观念，从历史上大的概念来说，输入人权观念，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应该注意但忽略的东西，当然是有价值的。融合和学习是在对抗中实现的。”

胡先生在提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总是同时要提到美国。这跟公共知识分子们的语言习惯有点接近，只是知识分子们在提及欧美的时候会强调进步、学习、借鉴和理想的中国应该怎么样，而胡先生在提到的时候，更多会涉及到一种对抗。

“我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什么是改革开放？就是一边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一边与美国对中国的干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就是改革开放。”

那篇社论是胡先生以社论形式为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所写，标题是《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信仰》，在那篇文章里，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学习西方的历史，也是与西方干涉进行斗争的历史，实事求是精神帮助中国以最有利的方式把控了这当中的界线和分寸。”

“这是种辩证关系，在对抗中学习融合。公知们呢，他们是开辟了一种社会运行的方式，”胡先生强调过去的中国是领导“一水儿下来”，由领导来决策，“公知们开了个先河，他们开拓的是在对抗中、在论辩中形成一种共识的中间路线。它提供了很多好的东西，很多正面的东西。好多东西是公知推动解决的，劳教制度啊、刑诉法啊、

公平啊，公知给这个体制压力，体制是需要有这种压力的，他们有正面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

“但公知的问题呢，是走过了，”他第二次拣起这个话头，通常来说，“但是”之后才是一个人要说的重点，“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个问题，历史上就有这个问题，一旦给了空间……这也是一种规律，没有办法。”他没有说“一旦给了空间”就怎么样，不过这个意思在历史上曾经颇为主流，毛泽东主席风范亦如此，他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那篇著名文章中说：“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我要、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所以胡先生所说“一旦给了空间”，首要就是“翘尾巴”之类。胡先生显然还发展了一步，指出其中“内卷化”的特征：“因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群体，没有组织；它有战略，没有什么谋略。他们是分散的，一个一个的个体，是由每个人的个人利益组成的。这些个人的利益呢，就组成了公知间的竞争，批判竞争，你批判，我比你批判得更厉害，这样我才能出头。”

他把这个内卷化现象扩大到整个媒体业。“你看最开始《南方周末》批判，你现在看它当时挺温和的，没有那么重；从它开始，全国就学《南方周末》，一学，就把《南方周末》逼得更犀利；然后出来网站，网站一出把《南方周末》削弱了，网站就标题党，各种极端的东西。批判有利益啊，批判能变成钱啊，报纸批判你发行量就大，你就有名，你就能挣钱。利益多大啊？谁不搞批判啊？所以你看全国都市报、互联网，全是批判的劲头就出来了。”

胡先生主编的报纸也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开始产生影响力。多年之后观察，这是中国报纸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以门户网站为代表的互联网新媒体虽然已经显示出咄咄逼人的竞争力，但它们主要还体现在传统平面媒体内容输出和分发的平台价值上。但是变化已经来临，虽然门户网站没有独立采编职能，但因为掌握最广泛的分发渠道，门户网站首页作为稀缺资源已经影响到媒体采编走向：传统报纸以在首页露出为重要影响力考核指数。

真正变化是在移动互联网日益普及之后。胡先生和他的意识形态对手——大 V，开始了新平台上的竞争。

“结果又出了一个社交媒体，社交媒体让人人都有话筒。那几个大 V 出来了。你看那几个大 V 多不像话，确实过了。你看那薛蛮子，”他第三次提到“过了”，从这个时候起，胡先生从公共传播史梳理人的角色转换为手舞足蹈式，说说话就会“啪”一声拍响桌子，“看他那微博吧？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刷微博，就跟皇帝阅批折子一样，看哪个好，啪，转发，我当时看，这小子快出事了，尾巴都翘成这样了。在中国社会，我跟同事就这么说，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他连笑带着拍桌子。

“然后呢，几个公知早上的微博互相一转发，今天的舆论导向就定了。是不是？定当天的舆论，那时候传统媒体采访，说，胡老师，我们每天早上看这微博，他们微博说的事我们要是不报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漏题，所以我们天天都盯着他们几个人的微博。”

宪法

“当时互联网管理规则也有限。当时我们内部有个判断，这个庙要是不收拾他们才怪呢。要是不进行整理才怪呢。它确实过了。中国知识分子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呢，需要一个又能往前开拓，同时呢，又不能突破宪法。宪法不是一个瞎写的东西，宪法是多少人流血，社会上多少冲撞，最后死了无数人，”胡先生又用力拍了一次桌子，“出现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宪法背后的力量是巨大巨大的。你要改宪法的东西，违宪的东西，这在社会上，老跟美国比，怎么美国这样，我们就不行啊。美国可以骂总统，我们怎么就不行啊。美国骂总统，是人家宪法里面，是美国总统轮换制，你骂总统就是帮着完善这个轮换制。”

胡先生的观点与宪法学者田雷有相似之处，他在《与其探讨宪法，不如改造我们的宪法观》这篇论文中也说中国宪法是中国人打仗打出来的，“在此意义上，我们据以展开宪法研究的经典，不是那些记录着我国历史内的伟大政治斗争、决断和妥协的历史文献，而是走在西方文化前沿的《纽约书评》或在法学界弄潮的《哈佛法律评论》”。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是在谈中国宪法，但实际上不过是在建构一种自

我想象的政治秩序而已”。

胡先生在第四次说到“过了”的时候，我大约理解了他深刻的担忧：宪法。

“我写好几次了：我从宪法第一条出发，朝着宪法第三十五条行走。我反复说这个。我认为这是唯一的路。中国如果不把宪法第一条和宪法第三十五条真正结合起来，中国就老折腾去吧。但怎么结合，没有人告诉你，你自己摸索。哪个国家的伟大，不是自己走出来的，不是自己蹚出来的啊，摸索出来的。美国也是自己蹚出来的啊。英国人也是自己蹚出来的。中国也得自己蹚出一条路来，宪法第一条和宪法第三十五条真正结合起来，你没有党的领导，你只有言论自由，抨击党的领导。那允许你才怪呢。”

“你在中国搞这玩意儿，你去消除共产党的权威，打击共产党的权威，那就跟宪法不一样了，那不可能的。跟宪法就偏离了。宪法说是党的领导。你们几个公知要领导整个中国舆论的方向，这跟宪法发生分岔。”

胡先生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定了调。

保守主义胡先生陷入到“惋惜”模式，虽然很难判断这个惋惜模式的真诚程度，但以我们的经验看，这是我们这个社会里最常态化的心理。

“我不知道，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个社会，我们有一种压力意识，大的意识要知道是这么回事是这么个理。但一段时间里呢。前进不是这么标准的，大的原则一定是这个原则。没有党的领导。好多人否定党的领导，那这社会能不着急吗？”

他当时用的词是“捉急”，互联网上的一种谐音提法。

“那拨公知，我就骂他们。我说你们就跟流星一样闪过了，六四，出了一拨，这一拨应该聪明一点了，但这帮小子没聪明，怎么还那样啊？怎么还是那么极端，没变。你得吸取点教训啊。不过，国家现在变了。国家宽容多了，全在那儿呆着。都好好活着，活得挺舒服。我认识好多公知，他们都活得挺舒服。再不在互联网上发声了。”

他并没有解释“再不在互联网上发声”——这是被禁止被威胁不得发声，这也是“吸取点教训”的一种。他提到当时一位试图更进一步挑战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刚刚因为几个经济犯罪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总的来说，我跟他们说公知应该贴着底线飞。不要撞底线。不要撞底线。”他说了两遍，“但我也知道，我可能走的这条路也是错的，我也不知道我这条路能走多远。反正我是坚决跟着宪法第一条，绝对不会偏，而且我这个是信仰。这是理性也是信仰。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是人民需要的东西。我们带着宪法第一条出发，朝着宪法第三十五条走。”

胡先生的历史观

我们问胡先生如何评价当前正在形成的历史，他说的第一点是总体上是延续的，第二点，今天的结果、我们是无法评价今天的，“我们只能让历史来评价，改革开放大的东西、今天的执政，今天的事情真的要历史来评价。我觉得评价点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

他说了三个评价的点：中美竞争、知识分子和民生。

“中美竞争的结果，这是一个评价点。中国经济会不会持续地发展，是相对的，是跟其他国家比的，我们经济是否在继续前进，是跟美国相互的角力的结果。如果，中国未来美国化了，中国真赢了，比如说GDP过几年超过了美国，综合国力超过了美国，如果是这个结果，历史一定会对这个时代有一个很高的评价。不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怎么看，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对历史都不重要。历史一定会很高的评价。”

“第二个是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想法比较多，让中国知识分子满意也不太容易，根本原因是选择社会主义，跟美国不一样。其实知识分子享受着社会主义这些东西啊，安全啊，也都有，确实也希望跟美国人一样达到同等的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许多知识分子有长期的这种追求。所以我说怎么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好一些，争取中国知识分子很重要。我跟人说，要宽容要宽松，很多人谈起这些事的时候，不考虑知识分子，他们头脑中没有这东西。最后的历史评价，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所以也是一个元素。这几个点将如此决定评价。”

“第三个是民生。比如说这次抗疫，我们做得是真不错。虽然过程当中我们也骂了一些。但你看今天，中国还记得这些东西吗，我们今天一看，我们做得真是比美国

强不知道多少。而且老百姓还是受益了吧。前几天见法国大使，大使说，中国日子过得真好，比法国好。但还有呢。接下来五年十年，这个过程哦，会被很多人忘掉的。”

胡先生在2020年的感受与很多人的感受接近，但他也知道，所有这些——跟美国的较量、知识分子的态度、民生——是一个长时间段考量的结果，“不是一年两年，是长时间的整体感受”。“我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看了太多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多危险，如果三十年前另一派胜了，今天中国肯定不存在了，百分百不存在了。”

“您是说政治意义上不存在还是文化意义上不存在了？”我们忍不住打断了问。

“我是说分裂了，国家解体了。百分之百的。苏联，南斯拉夫，中国也是一个民族自治的国家。全独立了。过程当中肯定会发生战争。这是我们回过头来能看到的。当时看不懂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在广场上，多受欢迎，那是偶像。那废物。”他毫不掩饰他的厌恶。

“当时苏联解体就愣了。怎么就解体了？人民日报非常震动，我操，怎么这样。那时候开始反思，中国真正反思是从苏联解体开始的。苏联乱了，对中国人冲击非常大。然后波黑战争，这些国家衰败。中国就不断发展，那些国家不断衰败。完全不一样。我的老师当时，在我面前，教俄语的，开始的时候有钱，我们没法比，后来看多穷。这个国家，承载着我们所有人的命运，能看懂这些东西太难了。我们特别容易被口号，1993年我刚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还是个很发达的城市。当时好啊，虽然受制裁，但比我们强多了。路灯都比我们的亮。到那儿一看，都是超市。我们还没有呢。人都划卡，支付系统跟现在一样，哗就支付了。我们那时候算盘、计算器还算呢。比咱们先进多了。现在去，我一看，哟。怎么落后成这样了。国家怎么这么落后了。在我眼里，落后得不得了。”他说的是民生问题。

“你看，我们现在就翻过来了。这东西，事实胜于雄辩啊。我们要过好日子，我们要让我们孩子，让我们过上好日子，而不是政治上的什么东西。是不是啊？”

“民生。生活水平，都能出国留学。你控制谁的思想啊。对不对。大家自然就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个国家还是要有规矩。规矩就是别乱了。中国社会特别庞大，得有规矩，否则就跟乌克兰似的，总统顾问，新的，老头儿，七十多岁，我跟他吃饭，还是沿用那个问题，用一句话总结乌克兰的经验和教训。那老头说，那我得想一想，老顾问啊，大学者，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当一个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变革的过程保持控制。我觉得还是挺深刻的。一变革，就特别容易失控。然后就打，就分裂，一塌糊涂。老人一辈子啊，乱了之后的总统顾问。”

那时候俄乌战争还没有发生。

“我觉得政治民主这东西，中国是这样，只要我们宪法不改。中国宪法是这样，我们绝对不可能出现西方式的那种民主，那就是人家宪法，人家打出来的，贵族之间打，出来的这个宪法。历史上皇权和社会权彼此制约，宗教战争，一次二次大战，反反复复折腾，死了多少人，打出来人家的宪法。这宪法记录了他们的历史经验，他们的文化脉络，所有的东西都记录在他们宪法中。中国的宪法是在中国的所有的历史经验和我们的奋斗过程中的记录，是对中国文化线索的一个呼应。这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这可不是那么容易改的。如果要改的话，还要加入大量的新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痛苦。政治痛苦，一定会加很多东西。那些痛苦，我不想是我们这一代人要经历的。如果我们这一代人经历，我们折腾之后，二百年之后，我们的孙子的孙子，可能觉得给了他们那一代人。我不希望我经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经历，我也不希望我的孙子经历。我就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平安地度过。你看我们生活也变得更好。我们变得更好。”

他再次解释了他对宪法的理解。“知识分子嘴巴说话受点委屈，委屈就委屈一点，无关大局了。就这么简单。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所以西方民主我也不知道好不好，让这疫情来证明吧，让以后的发展来证明吧。让中美这次博弈来证明吧。看最后到底是中国这套适应还是美国那套适应。看谁能活下来。反正我得到最后，中国和美国只能剩一个。不是剩中国还是剩它。”

可能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叫“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事实也是胡先生所说的“总体上是延续的”。胡先生显然不相信民主自由有什么价值，胡先生是一个“修昔底德陷阱”的信奉者，他更相信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更相信启蒙时代以来现代文明不敌零和博弈，然后，他把这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如期地甩出去，说：“也许，我们希望双赢。但这孙子不想跟我们双赢。是吧？那就在历史长河中，谁经受不住谁就被干掉吧。”

有点“三体”那意思。

他对自己有些与旁观者完全不同的认知。比如他认为他是一个给领导添麻烦的人，证据是他总要写检查，总是被删帖。在中国做新闻媒体写检查是常有之事，通常都是违反新闻宣传纪律，做了不该做的选题，舆论监督过界。他为前一年（2019年）六月发表了一篇三十周年的评论被批评而委屈，发在英文版，他说全世界都写，为啥我们自己不能说？发出来没有人管，第二天翻译成中文放自己微博上了，瞬间一万转发，一会儿就删掉了，他说别人删他帖他不生气，肯定是触动了一些人，“不合适就删了呗，下次我注意一点”，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殊政策，没有尚方宝剑，他的话语空间别人也应该有，他因此认定舆论空间还很大，还说让更多的人一起往前走。争取媒体空间，这些当年市场化媒体有的技巧他都懂，他会说尽量争取开拓你的空间，否则空间就会慢慢萎缩，慢慢领导就希望你啥都别说。他不怎么关心删帖的道理，领导为什么希望你啥都别说。

像他说的一样，他也会把这些话跟与他立场不一样的人说，大部分人不信，他们认为胡先生是个没有原则的人，他说的所有话都只是工作需要，总结了胡先生的若干特征，比如“唯一能打败老胡的是第二天的老胡”，当然最著名的那个是“叼飞盘”，他并不避讳。他说他特殊，没有把当官看得特重，如果看得重，他不会这样做。这样做太不保险，天天跟“三体”似的——他似乎懂得“三体”的行星运转轨道，这是我们听到的对“三体”最剑走偏锋的引用，他说他没有一个稳定的轨道，他觉得他的探索对国家是有益的，这似乎也暴露出他对国家运行轨道的理解。

更多时候，他跟普通的六十岁的那些人一样，有虚荣心，喜欢炫耀自己的成功，满意于爬一次香山被人认出来六次，喜欢被年轻人喜欢，可以跟年轻人可以打成一片，他说到大学讲课门都堵得死死的，喜欢表现自己的达观和大度，喜欢表达对年轻人的喜爱就好像做什么都能原谅的样子，他们挑战我，他会喜孜孜地说。还是跟这个年龄的人一样，回到家里，说到自己家事，表情会黯淡一点，他有一个女儿，32岁，他说女儿也做媒体工作，他跟女儿交流不多，沟通不好，有障碍，相互理解有障碍。那时候还没有曝出女儿跟他在同一家报社，但显然他很谨慎。

胡先生说自己带过兵，他两次高考，成功了，读研，是他们单位里第一个，年轻闯出去了，转业了，当记者，经历两次战争，走了六七十个国家，至少进入二三百个家庭里去采访，经历了苏联解体，他觉得“经历”还不过瘾，他又强调说他目睹了苏联解体。他说跟他差不多的人，起点差不多，努力程度差不多，最后成就也都差不多。有人当上副部，有人做生意，他在他的同学当中还算可以，虽然不是副部，但从互联网影响力上也还算可以。

胡先生的满意自然还包括人生路上的困惑和困惑之后的选择，八十年代刻在他记忆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人生的路啊为啥越走越窄，潘晓，当年的集体迷茫最后都会变成他脱颖而出的节点。他说比他再早一代的人就没这些苦恼，他们就是跟党走，就是为党为国家献身，而他这一代总是不断摸索，然后说年轻一代也得摸索，听过来的东西，从别人那儿学过来的东西永远是别人的，跟自己切身经历去感受感悟的东西还是不一样。

他为此还抒起了情。他说人的生活就像一个奔腾的江，刚开始，山里面有小溪，经过瀑布，啪一下掉下来，激流，三峡，有了宽阔的中下游，最后汇入大海。他说我们生活有这种感觉，他就平稳平淡一点，更多的人，特别是男人要壮怀激烈一些不是？抒情时他总是会想起他的同学，他一定会说起他自己的触动，早早就出国了，班里总是第一名，到今天，我肯定比他好吧？他忍不住点题，他说他要在国外，肯定是一个总工程师啊。他说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有一点失落。他说他在美国看他的同学，好多上学时的东西，照片啊、年轻时那时候的誓言啊，我们都找不见了，都丢了，他还都保存着呢。

他说，我们走得太快了。

北京金台路，人民日报的大院，胡先生的报社在一个独立的三层老旧的小楼里，我们到达这里要经历两道门岗。外面的院子，热情得体但又拒人于几万里开外的门房，还有门卫的正宗武警身份，共同组成了一种叫“单位”的存在。可能有七十年或者更久远的时间凝固在这里。

他说他是改革开放的长子。他是邓小平的信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管白猫黑

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所以这些被总结为二楼到三楼的楼梯上的一行大标语，红色、庄严：

既要努力开拓，
又要十分稳妥。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为电影《亲爱的同志》(2020)剧照

非虚构

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 | 邓小平的信徒③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这是萧先生的故事。

萧先生 1987 年考大学的时候，热爱文史，梦想当文学家。那个时候当作家是文科生为数不多的理想，社会上到处都是想写小说的文艺青年。困在山沟里给中专生上课的胡先生在知道考研究生也是一种走出大山的出路之前，寄希望于写小说扬名立万，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投。比他小 9 岁的萧先生也一样。他把第一志愿放在了厦门大学历史系，那里有一位教授是他的偶像。

萧先生的父亲有不同意见。父亲的人生经验比萧先生要丰富一些，不过丰富得也很有限，他可能觉得把人生押在写小说这一条道上面能不能赌赢是一回事，写成了可能也有很多变数，命途多舛。他主张儿子应该学法律，理由很匪夷所思：你不是想写小说吗？你看托尔斯泰是学法的，卡夫卡也是学法的……它路子够宽，怎么都可以拿来谋生。

萧先生的父亲是五十年代杭州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对小说界有一定的发言权，平生最爱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萧先生依了父亲的建议，又报了华东政法学院的经济法，作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没考上，第二志愿到了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系。托尔斯泰大概也没想到他还能指导一位中国的浪漫年轻人高考如何报志愿。

我们的聊天目的性很强，很自然地从父子关系和父辈对成长的影响说起来了。

萧先生说他很早就接受父亲的影响，没有叛逆期，以前在家里聊天，环境和气氛都很开放。萧先生分析这可能与父亲受高等教育有关，或者是与父亲的成长经历有关。萧先生的父亲是个孤儿，祖父母分别在父亲九岁和三岁的时候去世，完全凭借一己之力考上了大学，堪称个人奋斗的传奇——因此没有受过父权制的蹂躏，所以可以保持一种开放的胸怀。总之，当萧先生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父子在家经常探讨各种社会问题，父亲也鼓励萧先生提问题给他，父亲会告诉他他是怎么想的，“那时他还年轻，

脑子很清楚，现在可能有点糊涂了，但认识问题的逻辑根基还在”。萧先生很遗憾自己那时候还没有能力提问题。不过，父亲倒是让萧先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家里也没有任何娱乐，只能看书。那时候书还少，能找到的书就会看。”关于书荒，学者甘阳回忆更早几年时间，干脆说，“当时感觉书是读得完的”，所以各种争强好胜的年轻人，见面会暗自打量：“我看不看得上你啊？你到底行不行啊？做朋友，先要看看你够不够份儿。”

因为书少，因为什么书都抓过来看，因此萧先生有了一本他认可的真正的启蒙读物，那是他上高中的时候，那本书叫《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言论选编》。浙江省委宣传部编的，里面有诸多“人的异化”、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之类的内容，供做批判，他看了，从此沦陷，从此一直保持着“自由化”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这多少有一点象征意义，或者说其中包含着一个萧先生和他的同龄人的巨大的疑惑：他们所受的教育、所能接触到的知识，远不如现在的年轻人的丰富和多元，但他们似乎能从各种信息和有限的书籍甚至目的截然相反的论著中找到自己要的那些东西。萧先生的上一代似乎也具备这样的能力，他说他父亲那一代人开始认真思考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命运，是“九一三事件”，还有“九一三事件”之后同样供做批判的“五一工程纪要”。萧先生的疑惑在于，同样都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放弃自己的判断力，全盘接受课本上的东西？经常看到各种年轻人特别爱引用初中的政治经济学课本，用里面剩余价值理论之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东西来审视社会。他们是怎么想的？或许，对资本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更是一种身份和立场上的需要？

这些已经是三十几年后的疑惑了。当年萧先生接受父亲建议学法律并无障碍，只是他并不喜欢读法律。他当时对法律的了解就是法条，枯燥乏味。在他刚刚上学的八十年代，法律教材也很烂，老师也没有那么好，萧先生说那时候没有遇到一个能够点亮他的老师。萧先生的阅读大都来自于自己摸索，跷课去图书馆看书来完成自我教育。八十年代跷课现象很普遍，学校和老师都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萧先生现在特意提到的是看“汉译名著”，那时候他主要看绿边和黄边的，《汉译名著全称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大约从 1981 年开始问世。它分为橙色封底的哲学、黄色封底的史地、蓝色封底的经济学、绿色封底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赭色封底的语言学。这套丛书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力，在相关领域的爱好者中也有相当的影响。至今仍然不断再版，以及不断有新书面世。商务印书馆官方介绍称它出版二十辑九百余种，是现代出版史上最大规模的学术翻译工程。）“蓝边的经济学是最近十年才开始看，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之三》后，像炸弹一样，把过去脑子里的毒害全部炸掉。那个时候已经快四十岁了。”

萧先生说大学的时候也看过类似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囫囵吞枣，“少年时因为虚荣心而读书。大家都读，自己不能不读啊。你说那时候读尼采，哪里读得懂？”

萧先生把读书看作虚荣心的一种。因为我们的话题围绕着两代人之间的博弈，所以他时刻都会为我们做总结：“你要是发现孩子有虚荣心，千万不要打击他。小孩子的虚荣心完全可以发展为一种荣誉感。它们本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小时候学习就是这样，上学，为了显得自己懂得多一点，就多看一些书，这不就是虚荣吗？你说这有啥坏处？一点坏处也没有。”

停顿了几秒钟，他补充一句：“只不过，成年的之后你知道不能把这个东西当成目标。”

然后，他感慨起现在年轻人的虚荣心。他的一位朋友，夫妇都是检察院系统的才俊，他们的女儿在北京高考前五十名，聪明绝顶，就是感觉有点过于“务实”了，而且这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她说她当初读社会学是因为脑子不清醒，还是应该读法学读商学，我们跟她说，读社会学多好啊，好玩，她说也就是好玩，以后会跟同学们拉开差距的。”萧先生对此表示惋惜，“当年我辞职的时候，就是生活实在是太舒服了，生活跟猪一样。二十多岁时候能看到六十岁时是什么样的，所以走了。”

萧先生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正在被“虚荣心”引领着跑到人民广场去演讲。

“那时候在上海，人民广场演讲，讲自由民主这些东西，大量的听众，老百姓，上海市民，扔馒头送汽水，事后我会觉得很可笑啊，因为不懂，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以前的你是多么可笑，”萧先生反思自己，“也许明年我就会发现今年的自己很可笑。”

萧先生说好在大家也听不懂，他们不是来听演讲，他们是看热闹来的。

在三十年前，民主自由这四个字，再加上“人权”，就代表进步，它们的内涵外延，主张大力弘扬的人与不遗余力批判它的人，都说不清其中到底都是什么，大体上都是处于无知状态。曾经主掌上海市委宣传部门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到了 1999 年，他的反思还提到这一点：

我们对这些一概不知晓，只知道一种卢梭的民主学说，而且就是对这一种也还是一知半解。甚至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试问，以后要建设我们的民主，又用什么去建设呢？我曾戏言，如果给我们每人发一张纸，让大家写出你对民主概念会是怎样理解的？你认为应中国建立怎样一个民主社会？我相信，收到的答案将是千奇百怪的。自然对民主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在一般知识和重要原则上，应该具有一定常识，假使连这也没有，那么不仅可悲，而且也是一件使人不得不担忧的事了。（《九十年代反思录》 p.120）

三十年后，萧先生对此当然会有更多理性的思考。他现在是法律学者，研究权力，关心时政，他是一个知名博主。他说他喜欢阿尔贝·加缪，“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荒谬的，荒谬的我们还要这么活。”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当年遇到西西弗斯，惊为天人，这个推着石头上山的隐喻不但充溢着哲学性，而且与青春期很容易产生的“受难”心理和“圣徒”形象结合在一起，更何况加缪的出身、故事、所生活的时代、甚至长得样子都充满了偶像气质，每个知识分子心里都藏着一个加缪，展示给外人看的就是这个西西弗斯。“你推的那个石头是什么？”我问。

“思考吧。”萧先生想了想，拿不太准。这个回答不大经得起推敲。思考本身虽然可以一直推下去，不大可能像那石头那样到处滚，除非你忘了原来的思考，然后再思考一轮已经思考过的东西……不过，也许，确实如此，反复思考同样的东西，倒有一点像这个石头。

他在回答我最初的问题——什么东西是成长过程当中产生最重要作用的东西——的时候，他的回答是 1989，这么多年来反复思考的可能恰好也是当年提出来的那些个诉求：民主和自由。

萧先生说，现在这些民主问题，是世界性问题。“小粉红反民主，反美国的民主，反民主国家的民主，他们不知道民主是什么，就像很多人支持民主的人也不知道民主一样。”仿佛又回到了人民广场，那些为萧先生叫好、送馒头、送汽水的人同样不知道，这就真的有点像萧先生的那个石头了。

“民主是非常大的问题，精细的组件，你不拆下来，仔细清洗的话，是不知道发生问题的。”

“我对民主制有一个更开放的心态。1950 年代以来普选民主被高度简化，不容质疑，这是最致命的。一个思想不容质疑，它就是会僵化，僵化就会腐败。其实现在全球民主制都有这个问题。很多国家，没有检讨反思这个制度，包括美国在内，早年的时候，美国的两院制，参议员是间接选举产生的。后来在进步主义的推动下，参议员就变成直选了。这个不见得是进步。德国总统就是议会选举的，它不经过选民。美国就是把普选当成了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普选这个东西，选票平等，是个非常危险的概念。李光耀提出来，选票可以不平等，比如一个社会中，他提出 40 到 60 岁的选民一票算 1.5 票，进行票选权加权，60 到 80 岁的人一票算一票，他实际上是对一个人，这是举例子。以年龄来区分，有没有道理，它当然是有道理的。民主制里最核心的一个东西，中年人，中产者，这是民主制支柱，这个台柱不能倒。如果都平等，那就变成由这个国家的人口构成来决定这个国家的走向。这个东西就很可怕了。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概念。”

“我的意思是很多说法，我们以更开放的姿态去看待的时候，会让民主啊、自由啊、法治啊这些大词，该小的都能小，该大的都能大。”

三十年后的萧先生与当年相比，会更强调历史。他引用托克维尔的话，托克维尔说如果你只知道一个国家的历史，你就一无所知。萧先生说中国的政府权力从来没小过，所以他看福山讲政治秩序，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在那儿猛夸秦始皇，你知道秦始皇是怎么回事吗？”

“你去看英国的历史，它的民族就是个增量民族。他最开始的时候是自由和法治。原生的自由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形成原发性的自由理念和观念，它要用别的东西来保护，最初的时候是法治。所以英国历史最重要的东西是经验，是司法。我得出一

个结论是，英国宪政的核心是司法独立。其他的东西都没有那么重要，司法是最重要的。”

“你再看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它与最后司法的变化有关，与最后司法的偏袒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它怕共产党，所以它就偏袒右派，偏袒极右。比如共产党在暗杀，极右的纳粹也在暗杀，那么纳粹杀五个人，它可能会判一个，而共产党杀五个可能判六个。很不公正。司法不公正，就完蛋了，它被民意裹胁了。”

“英国不一样，英国最早在 14 世纪的时候，小镇里面没有行政长官，最重要的人是治安法官。小镇里的大问题、最重要的纠纷已经解决掉了。”

“看到这些的时候，会感觉中国的传统跟他们太不一样了。义和团那时出名的毓贤，在山西当巡抚的那个，《老残游记》里的毓贤，开始在山东登州当知府，把老百姓抓来，放到站笼里，站两天就站死了，一年要站死几千人。这在英国历史中是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想像的事。17 世纪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没有刑讯逼供了。伏尔泰游英国之后，在《哲学通信》里写，英国人居然没有刑讯逼供。法国人是喜欢搞刑讯逼供的，一直搞到阿尔及利亚独立的 1950 年代。”

大概是觉得说得太远了，萧先生又拉回来。

“我的观点是，民主必须是具体的。像雅典那种民主，是肯定要死的。雅典人，面对西西里阿西比亚德这种煽动家，几句话就骗过去了。没有抽象的民主，十几年前跟人在微博上争，我就是会把民主向后排，它没有那么靠前。我觉得自由更重要，民主是自由的一个工具，如果不自由的话，我们要民主做什么？其实是这个概念。包括法治，三架马车。自由是灵魂的东西，法治和民主这两个东西是工具。”萧先生总结，如果这三个东西排序，民主是排在最后的。

隔了一天，萧先生觉得话说得太简单了，担心会“模糊民主和自由两者的伦理性质”，他又编辑了一段文字给我。

我的看法主要是认为在制度设计上，民主是由许多细节和相互协调的零部件组合而成，如果出了问题，就需要具体解决，并不是民主不好，而是它有着复杂的面相，无法用口号而只能用非常具体的法治与制度行动来解决。1999 年之后，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制通常表现不佳，问题就出在他们总想用口号来解决专制后遗症问题以及民主的具体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所以结果常常是民主制的崩溃。

可惜现在已经没有很好的平台可以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

许多时候，若以绩效考察，尤其是经济绩效考察，专制未必比民主差，甚至还更好，当年西班牙的佛朗哥时代、台湾两蒋时代，以及前四十年的中共国，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所以，无论在自由还是民主问题上，我对于用功利主义的方法论来论证是深表怀疑的——自由和民主常常并不是如功利主义论证方式那样获得高于奴役和专制的绩效，逻辑上的绩效无法取代现实的结果，因为现实比逻辑复杂一万倍。

所以，唯有引入人权观念，才能摆脱功利主义的方法论，用耶稣的话说，“人不单靠面包活着”，这才是自由和民主最根本的核心所在。同时民主是一个比自由更形而下的工具性概念、工具性存在，所以它无法完全摆脱功利主义的论证，这时，如何从制度意义上完善它就变得至关重要。

我能感觉到萧先生慷慨激昂的阐释中背后的那个石头，他显然更自信、比以前更知道如何把石头向上推，但他似乎更知道无从谈起。西西弗斯是个宿命。

“一个文明啊，堕落起来非常快的，更何况你也没啥文明，堕落起来就更快了。汉也好，唐也好，明清也一样，大朝代，我管它叫帝国中期综合症，”萧先生最爱读的东西是历史，他说他乱读一气，中国历史了解一点，世界历史了解一点，“最早的开国皇帝，实在太穷了，也没有什么折腾的，所以也就不折腾了。所以汉高祖刘邦啊吕后啊，包括汉文帝景帝，窦太后，不折腾，一心一意积累财富，到汉武帝亲政六年，窦太后死了，帝国也有钱了，钱多了就开始造了。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

萧先生把历史周期分成三个阶段，道家之治，儒家之治，法家之治。“其实儒家和法家没有太大区别，一个是光着膀子干，一个是峨冠博带地干。儒家就是峨冠博带，法家就是光膀子。”

“七十年开始，因为他钱多啊。折腾各种各样的东西，折腾到后来没钱了。汉武帝就是把帝国的钱都折腾光了，人心尽失，只好下个罪己诏来蒙混过关。这个时候，这个帝国已经不行了。运气好呢，赶上一个中兴之治，运气不好呢，一个败国之时。只好靠严刑峻法来解决问题。中国也没有离开他们的规律，用他们的话说吧，就是

内循环。历史内循环。”

“对政府来说，从古至今，让他们不做什么，比让他们做什么更重要。”

这是他现在的诉求吗？感觉萧先生又把石头向上拱了一拱。

我脑补了一下萧先生当年清瘦的面孔出现在人民广场上的情景。

胡先生也讲到三十年前，他在北京现场。“当时多激动啊，叮了咣当的，广场语言，革命口号，夸夸地喊。”胡先生进入声情并茂的演示环节：

“他们想阻挡我们的利益，我跟你们说，你能挡住长江吗，你能挡住黄河吗……”

“哗——”胡先生为鼓掌声配音。

“同学们，我为什么……”

胡先生说现场有人会拍照片，拍照在当时有可能会被视为“取证”。

“同学们，我看到有人举照相机，我不怕，我为什么不怕，因为我不想在我的女儿也像一样奴隶一般地活着。”

下面，“哗——”鼓掌声再起，广场语言就都是这样，我天天在广场上听演讲，全是一样的。天天的。特别激动，听得热泪盈眶。

“我们那个时代啊，上大学，读研究生、博士的人，是偏保守偏胆小的，有机会也不敢闯荡。遍地的机会是留给考不上学的，我们班考上大学的就三个人，另外 57 个都干吗去了？他们经商，做什么的事都有。生活没有把我们逼到，跳到河里去游泳的地步。”不管是萧先生还是胡先生，不管之后三十几年各自如何迥异地看待世界与中国，他们当初之所以没有下海除了天生“胆小”，还有他们相信“诗与远方”。他们共同的特点在于不认为自己是走投无路才守着改革开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清贫生活的。“海子写出诗与远方，是因为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有未来的，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萧先生的意思大约是未来所拥有的“无限可能性”。

如今无限可能性已经到来。

如今萧先生也做父亲，他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有点小，不在我们的解读分析年龄段之内。不过，萧先生现在面对女儿成长就已经很紧张了——与其说他紧张于女儿的成长，不如说他紧张于自己。自从女儿出生，他就一直要面对一个问题：她是不是在表达不满意？为此他时刻警惕，时刻要准备道歉。他把“不好的思维习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责任在他自己，比如性格又急，说话又不过脑子；另一部分在于从小受到的教育，题海式的、填鸭式的教育，家长制专制，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他们的思维定势。萧先生这一代人喜欢说自己是吃狼奶长大的，他简直抒起情来，“我一辈子排不干净我的毒啊。”

如今萧先生在思考更多的可能性。

“出国一趟，发现很多东西都没有国内方便，你对国外的向往度就会大大降低。我同学在德国，怨声载道，太不方便了。光一个电子支付就这样。挺好的酒店，暖气很差，冻得要死。柏林晚上八点就没有人了，去星巴克喝杯咖啡，八点就被赶出来，除了酒吧，酒吧还很远。”

“美国官僚主义很严重。民主制度啊，它就跟一幢房子一样，它是要经常修葺的。漆掉了上漆，水龙头坏了换个新的。你不三天两头修补的话，民主它是会烂掉的，民主烂掉了它就是民粹。这个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就是这样。古希腊，雅典，崩溃得那么快，你看人家斯巴达，专制的，双国王，它的寿命就比雅典长很多。所谓民主一定比专制要好，这是说不通的，这不一定。大量的情况下，有更多的细节具体的去比较，才会得出结论。你可以说民主更符合人性。但它是各种的零部件构成。这些零部件出了一个问题……”

“我已经不想走了。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这个世界都不怎么样，现在看还只有日本可以考虑，其他地方，印度之外的英联邦国家也可以，但去了之后你干嘛呢？哈金在《自由使命》里那句话，你获得了天空，你失去了大地。这句话说得准确。”

在天空和大地之间，萧先生特意赞美了一下日本的盥洗室。

“我去日本访学，在东大，我觉得日本这么小，时间久了我可能会呆不住，就选了最短的四个月。结果后来我就后悔了。日本东大的宿舍，只有 27 个平方，我们想这也住不下啊。不习惯。结果过去发现，也住得很舒服。什么都弄得很舒服。两个人

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浴室感觉超大的。还有厨房。什么都有。你肯定想不出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浴室跟盥洗室分开，虽然地方不大，但是你很舒适。”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Lan Lin](#) on Unsplash

非虚构

时代列车隆隆向前 | 邓小平的信徒④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这是秦先生的故事。

秦先生出道早，老成持重，有名门正派之风，即使与同龄人相处，也天然有前辈气派，又喜欢用大词，高举高打，思考问题高屋建瓴，总是保持着“大视野”。现在自己名字命名的公众号里，他个人的栏目就叫做“大视野”。

一个人风格的形成，跟他所经过的时代烙印有关。“大视野”这样的名字有八九十年代的气息，这也是秦先生上学、初入职场、建立世界观的时期，当时大趋势、大格局、大视野是知识分子思考天下问题的必备。秦先生的少年老成，得益于此。

“我们这一代，一直有两条线索，我们任何调整与两条线索分不开。第一条就是民富国强。”

秦先生老家在河南周口的沈丘县，他的叙述中，这个当时还被称为大邢庄公社小邢庄大队的地方，一个字来定位，就是“穷”，不通电，吃不到肉，一年到头总是靠红薯片红薯粥度日。他说，父亲这一代兄弟姐妹六个，都是农民，都穷，一位叔叔养不活自己家小孩，只好把孩子过继给别人，父亲后来考学到开封师范，算一只脚离开农村，但还是解决不了生活困顿的问题。只有父亲一个人吃商品粮，母亲还是农民，他们家也还是住在乡下。另一位叔叔，同样在县中学当老师，养活不了全家，逮住一个支边的机会，去了克拉玛依。1994年的时候，那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烧死288个小朋友，其中有他叔叔的女儿。

“我印象深的是小学三年级，有一次跟叔叔伯伯啊还有小朋友在大麦场碰上，那时问你理想是什么，他的问法就是将来你当什么。我就说我想当总理。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我说如果我当总理可以给你们每个人都封一个官，你们就不用这么苦了。”

秦先生家国情怀由来久远。

“我在九几年的时候，在《南风窗》上写篇文章，我就说无论如何希望国家民族各地都摆脱这个贫穷苦难。”秦先生学业优异，高考考入复旦大学，当年最难考的新闻系，

毕业恰逢1990年，数得上名字的国家媒体拒绝大学毕业生，上海本地媒体只解决本地毕业生，他去了广州，加盟一家叫《南风窗》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杂志，在那里工作几年之后成为总编辑，并把它做成了当时中国最有份量的时政杂志。

“最近我想写一篇家事国事，我姑姑的孩子，在昆山，要读大学，要报华东理工还是华南理工还是什么地方。去年另外一个小孩，他父亲就是我在克拉玛依的叔叔，问我到南京去哪里工作。我为什么对几十年深怀感情？我们这种非常普通家庭，当时那么穷，你看到下一代，基本上也离开农村，有的打工有的念书……不管怎么样，就是在广州卖楼，卖着卖着，成了卖楼的一个小负责人，几个孩子都在广州念书，虽然没有户口，但这也是命运的一个改变。”

秦先生说这是影响他的第一条线索。与他的“大视野”风格近似，他喜欢说“我们”，“这是影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

“第二条线索，当然是开放带来的先进的价值观啊文明啊，八十年代各种丛书啊、讲座啊、舆论界像《世界经济导报》等，它所形成的对人的影响。刘再复八十年代写文学就是人学，论文学的主体性，这类东西，对我们是刻骨铭心的嘛。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根本，我们当时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

秦先生的世界观形成在1980年代，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是寻找“普世价值的现实路径”。在1990年代他的《南风窗》时期，变得“更加坚决，更加彻底”。“普世价值基本上就是西方的，从《大宪章》到《美国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很受整个体系的影响，以这个为尺度来观照现实。”他说那时候很多媒体都是这样，写一个案例，然后反观中国，“这东西也不是天然就这样，整个八十年代就是这样思潮的影响，那时候差距太大了。你看《河殇》，它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我们的基本原则，普世价值，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权力和尊严，这个还是要大声疾呼，要进一步推动。过去几十年，是经济人权的进步，否则不可能有今天勤奋劳动和创造。未来应该有更普遍意义上的权益和进步。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这是基本的主张。”

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其中有一个缠绕将近三十年，就是到底怎么看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很多时候，它是衡量一个人政治光谱的重要元素。

秦先生在这里先是谈到“经济人权”，他可能也觉得这提法过于新颖，他很快把他对人权的解读与他的“两条线索”结合起来：

“所以，我认为这两条线在过去几十年还是在同步的。你从农村的角度，你看最基本的人权，就是迁徙，移动，如果没有迁徙移动的话，改革开放以前连讨饭都要批准的，那不行；如果说改革开放没有几亿农民工从产出到工业园区跑到服务业，你经济怎么发展？GDP怎么提升啊？对不对？当然这里有血汗工厂，有很多问题，作为他们个体的选择来讲，相比困在农村那里，现在就是人权的进步。什么在发生改变呢？就是说，对于我们一开始西方的普世价值来说，思想、现实路径，对于中国有了更多的历史性的理解，我们慢慢认为中国走过的道路里面，有大量的基于中国背景的合理性。”

这也是他现在“大视野”里文章经常表达的主题，当很多人质疑哪里问题不对的时候，他力劝大家向前看，当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经常被说到的“改革深水区”的时候，秦先生又会做出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所以他尽管激情澎湃，情绪饱满，但经常又呈现出面目模糊的特征，很多人不喜欢秦先生，有人说他是糊涂，有人说他是落伍，有人揣测他是既得利益，替资本说话，或者说替某些资本说话。这在2015年底的万科宝能之争的时候达到了高潮。

秦先生罕有地在文章里表达了他的“站队”，而且没有用模糊的转折来打圆场，而且反复写了多篇文章这样表达。当然，结果是两边不讨好。

一边可能会觉得这是替资本家说话，旗帜鲜明地替企业说话，在出现企业名字都会被视作营销的中文互联网世界中，在他们眼里，这就是“拿钱了”；另一边在自由派或者坚持商业文明的人看来，各种侵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利益的事，在2016年前后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平时对这些事置评不多，轮到一个草根宝能去和万科争股权的时候，就立刻批判起野蛮人来，感觉“双标”——破坏市场的，让你们这个商业世界里不能轻易在商言商的主力从来都不是宝能这样的企业啊！

很多广东的房地产企业在内地开发楼盘，不管是开发到哪一期，甚至刚刚盖好售楼处，它们似乎有一个诡异的共同爱好，喜欢在售楼处或者开发商办公室的边上开一家隆重的餐馆，取名什么轩什么庄之类，大都三个字，一般是粤菜风格，仿佛是

为了给异乡来的广东空降职业经理人们提供一解乡愁的机会。

我们那天下午与秦先生约在浦东花木的一家叫“品肴轩”的包房里，就是这种感觉。喝一下午茶，一位感觉是被剥夺了午睡机会的服务员不断敲门进来添水。那个小区很浦东风格，占地很大，有大门，从地铁出来要走上一阵，经过硕大的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太阳很大，花木那一带路宽树小，充满开发区或者“新城”感觉，像极了广东开发商那一类“大盘近于小镇”的风度，这一切烘托了秦先生出场的气氛，恍惚间更有一种广州知识分子在商言商的在野气。

后来查地图看大众点评，发现这盘既不是广东开发商，店也不粤菜，与浦东明晃晃的太阳给人眩晕感一起，让那个下午有点梦幻。

**

秦先生继续说他的八十年代。

“从全球看，讨伐新自由主义声浪也很大。我们成长经历看，市场经济大潮里面，比如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大的潮流。”

就像鸟类社会行为学所总结的，刚出生的鸟儿把第一眼看到的活物视为妈妈，中国改革开放甫一启动，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启了向外学习的历程，此时恰逢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声望日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巧合。1979年前后开始的世界变化，包含了里根在美国、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中美建交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入侵阿富汗启动了苏联崩溃进程、伊朗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凡尔赛 - 雅尔塔”格局从这一年开始瓦解进入新阶段，当然，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些变化在随后几十年发生，中国人光是打开国门看到的景色、听到不同的声音就足够目不暇接了。“就目前的危机而言，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尽管里根说的是美国政府的事儿，但这句话可以恰到好处地用在反思中的中国身上，而刚刚开始学着理解市场经济、理解商业和自由经济的中国人，对于什么是商业文明可能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但对于“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在深刻而且痛的领悟，尤其是这样的话出自美国的政府首脑之口，更是心悦诚服。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摸到的一个大石头就是这个里根主义，像素很低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概念，与像素更低到模糊的自由民主，这些成为后来的“普世价值”中核心概念的一些词，捆绑在里根主义的大潮流里，某种意义上，它甚至被理解成就是启蒙主义、理性主义这些更具历史感的宏大的概念本身。

《河殇》影响到的可能只是秦先生“大视野”的文风，而对他们这一代影响更为深远的是1980年代的里根主义，或者称“新自由主义”。

所以，万科宝能之争出现的时候，秦先生愤而出手是多么真挚的一种情绪表达。

万科招知识分子们喜欢的原因有很多。从它提供的服务上看，它的产品在1990年代更具现代审美，它管理正规，会讲以人为本以业主为本的话，人们在当年最担忧的粗制滥造问题也不大会出现在万科开发的楼盘上，它还有物业服务——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可能就是从万科开始的……在内地开发房地产还处于蛮荒状态的时候，它脱颖而出不足为奇；它还是一个很“现代”的企业，老牌的深圳上市公司，更接近于公众持股，没有那个时代国企上市通常必备的一个不能减持的“大股东”；它的控制者王石不但规定了这个持股局面，而且还公开声称万科“不行贿”，在被视为污浊的地产交易行业里，这种表态出淤泥而不染，用来证明“不染”的一条重要证据是，万科1993年就进入北京房地产市场，但将近十年的时间徒有口碑，因为根本就进不了北京五环；当然，王石本身健康硬朗的企业家形象，公共知识分子的谈吐，无疑也塑造了万科的形象……总之，它是一个明星企业，也许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是它的公共形象中还包括它的企业内部杂志《万科周刊》，它是万科形象的一个重要补充，它们的操刀者通常来自于北京大学，并且往往获得“管培生”一样的待遇，成为万科高管。

对于秦先生来说，他从广东开始职业生涯，八十年代就开始研究广州东莞的三来一补，开始研究珠三角的地产交易，他研究广东企业研究广东房地产，万科是广东房企的代表（至少2016年前后还是如此），王石是企业家翘楚，秦先生觉得有话要说，理所当然。更关键的是，秦先生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到今天，企业家很重要。

就像每个知识分子都要思考中国的人权定位，还有一个每个人都绕不过去的思考是开篇里提到的那个张五常的问题：“做对了什么”——没有人想到发展如此迅速，

以至于它必须为此得出一个原因。它一定是理性的结果，你不可能全是靠运气。

“我们力所能及应该说的话，就是我们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中国是怎么取得今天的成就的。你思考这么多，走到今天变成这样的局面，中国未来有什么隐忧。只有正确解读中国走到今天有什么样的成就，才能够更好地走向未来。”

持同样看法的人最有名气的是张维迎。他几乎用四十年的时间反复来讲这件事。在张维迎看来，企业家精神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强调冒险精神，这与主流经济改革思路中“敢为天下先”这个口号一样的评价接近；第二阶段，强调的是“解放了人的价值”，“能”超越了“勤”；第三个阶段与整个社会的人才配置相关，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要看最聪明的人在做什么——他把“最聪明的人”与“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的概念之间划了一个可以互相替换的等号：

一个社会的发展就要看最聪明的人、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在做什么。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过去30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企业家人才的重新配置。原来我们最优秀的人都去了政府，改革以后最优秀的人逐渐去做企业了，从“学而优则仕”转为“学而优则商”。（《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p11）

秦先生把企业家精神与早年间的个体和私营企业联系起来。“中国今天的整个经济的发展，还是跟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发展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有40万个经济主体，今天有二三亿个经济主体，它就是释放了更多人的精神。我过去自己写文章，1978年，所有企业成分里，76%国有，24%集体，只有十几万个体工商户，都是当年砍尾巴没砍净剩下的。中国这40年的发展，恰恰是国有加集体这种公有制，从一统江山，慢慢到民营经济崛起、占比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国的成就不是国有公有制的成功，而是国有公有制改革之后释放了另外的经济成分出来，这样获得的成功。”

秦先生觉得现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这些东西不讲了”，而且是“要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的原因，这是秦先生认为要特别警惕的：“这不是一个层面，国有企业改革不构成中国今天成功的元素，而是构成这些元素的自我超越和变迁最后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成功。我们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东西在一个长周期里，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在变量增减中，看到历史的真正轨迹是什么。不是因为它是中国的，所以就是好的。我们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走到了今天。”

他担心我们被绕糊涂了，特意强调：“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东西，中国的比国外的好啊……但是，你这个东西恰恰是改革开放的惯性形成的遗产，边际上可能会发生改变，只是边际上的改变不能很快显露出来。”“是不是第八个馒头吃饱了，就只看到第八个馒头是对的，而忘了前面七个馒头的价值？”我问。他未置可否。

“这样的你们的课题，在边界和许可的范围内，与我做的有相近的地方。”他没有忘记拉近与年轻人世界可能存在的鸿沟，但“边界”与“许可”还是让我有点晕，好在秦先生又翻译了一下：“我们都是在观察中国今天从何而来，当然，也是在探讨中国未来向何处所去。”

他觉得，如今没有形成共识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时间太短。

“现在中国牛逼，无非也就是40年嘛。你有多少家族企业呢？家族企业概念都不存在的。你看看同仁堂，冠生园，看看他们的境遇，所以，今天，不要把这么短暂的时间里获得的成功，当成多么巨大的真理一样。我觉得没有一百年没有几代人，根本就没有证明什么。”

他说他看一本书，写太古150年，董建华作序，董家与太古有过多年合作，他生出很多感慨，“如果没有长期的制度和文化保障，一个公司不可能有长久保障，太古不论是做航运、国泰航空，还是可口可乐，包括现在的太古汇，不搞乱七八糟的东西，整个环境不会让你去做坏事。”他说的这本书应该是《太古之道——太古在华一百五十年》，秦先生阅读量广泛，这样一本企业宣传的书他一样看得津津有味，然后从种种蛛丝马迹中挖掘积极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说，改革开放政策推动的力量比较大，但它没有在法治或者在文化层面形成传统。这起码是不够的。从某种意义上，立法上做了一些事，比如保护私营企业，但是，深层次来看，还是有些问题。比如说，今年（2020年），农村已经全面脱贫。脱贫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那首先一个，农村三种财产权中的宅基地，保护了吗？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宪法序言还里还是‘无产阶级

专政’，包括序言里的表述，都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之类的表述……这些表述天然地会让人觉得，你现在讲的还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你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是一种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关系。但这个初级阶段到底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告一段落？还是未来就又回过去了呢？从这个意义上，小粉红拿着这个根本大法跟你讨论问题，那他也有理有据啊，我们从逻辑上就应该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我们现在的资本，就是阶段性的。所以我认为……”

秦先生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模糊，虽然最后他说“我认为”之后就停顿下来陷入了沉思，或者可能是表达一种“尽在不言中”？

“张维迎认为国企产生不了企业家，”秦先生把话题拉回到中国发展主流上来，“但我早期就与它们有接触，像蛇口工业园区，白云山，看到很多国企改制，看到社会的制度引进，它们从表面上看都不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但我觉得它跟人类的普世价值并不违背。”

他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国有企业的改革家，“一定要回到历史，今天看中国这么了不起，当年就是以港为师、以西方为师才有今天的局面的。你就说‘三来一补’，你怎么知道‘不找市长找市场’？没有那么多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怎么建立供应链？没有这些你根本没有今天。”秦先生又提到一本我大约不会看的书，“上实董事长当年送我一本书，《回到现场》，那本书里讲了上海九十年代融资的整个过程，上海实业如果不去香港上市，上海也不会发展到今天。上海医药、上海家化、光明、海通证券，全是上海实业投资注资改变机制，在海内外上市，包括南北高架、延安高架经营提早变现，融资来做更多事，这都是别人手把手教的。这是一个大历史啊。”

“很多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更加自信。有的时候没有做得那么好，很多方面还有这样那样的纠结，这需要不断有新的观察和调试，”秦先生理解这是一个脉络，是他们这一代人思想的底层逻辑，“还是启蒙思想的影响。201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探讨中国主体性的融合，后来我没有脱离过这个想法。现代性落实在每个国家的选择里面，它表现为现代化路径和方式方法是不一样。这是无限的现代性，不是只有简单的一种模式。所以我是觉得没有主体性的现代性，很容易导致鹦鹉学舌；没有现代性的主体性呢，就很容易循规蹈矩，进入闭关锁国的困境。”

2004年，他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一张财经类大报。创刊的前一天晚上，我曾经去他办公室看望他，他穿着西装，很正式，那天并没有什么庆祝活动，创刊酒会也在第二天，可能他觉得这时刻更有象征意义吧。他在斟酌发刊词。

作为一张主流大报，我们推崇商业的力量，关注商业力量的伟大进军，记录资本与财富的运动过程；但我们深知，尽管时代的标志是商业，但商业的精神决不只是时尚和金钱。

我们把商业看成一种责任。

负责任的商业，就是一种文明。

没有文明的商业，就没有文明和谐的社会。

11年以后，秦先生离开这份报纸时，希望自己被视作为一个研究企业的学者。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Kuaileqie RE](#) on Unsplash

非虚构 昆明手记 刘雨萌 | 小鸟文学地图

“我们喜欢它，但是从来没有写过它。”

出学校南门，右转继续走，路过一家叫卡夫卡的咖啡馆，再经过幸福厨房和红豆园，接着在天雷宝殿的小巷口过马路，到达布拉格，这就是我认识植子的地方。

那时候，我还不是现在的我，植子已经成为现在的她了。一样的米色衬衫，一样的铅笔，坐在那张靠窗的桌子边，不是在读些什么，就是在写些什么，听不见其他人的说话声，偶尔望望窗外的银杏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在看《流动的盛宴》，上一次见到她，她带着固执的神情，颇为严肃地把铅笔屑削进小木碟里。我隐约感觉到，植子在写一部关于昆明的小说，只是没有写完，不然她早早就给我看的。

我们聊完一些毕业的事情，走到天雷宝殿的小巷子去吃披萨，植子突然问我，“你觉得只有北京上海的人才有表达生活的权利吗？我们在昆明的生活就不是生活？”

“当然不是，怎么会这样说。”

“可是百分之八十的小说都产自北京上海，其他地方的人也要跑到这里去。”

“但小说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中国这么大。”

“可我找不到比它更接近生活的叙述方式了。”

“电影呢？”

“电影也是由一部分小说构成的。”

我无话反驳，“就算是这样，你不是快要去上海了吗？”

“我其实更想在昆明呆着。”

“再好好想想吧，不过在我这儿，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植子笑了，突兀地朝前跑，惊起一群麻雀之类的小鸟。

第一次去大观楼也是这样，植子穿着白色的羽绒服，八分短的牛仔裤脚露出长长的毛绒袜子，脚上一双 MUJI 的白色帆布鞋，不管不顾，张开手臂像一架倾斜的飞机冲向滇池，整排的红嘴鸥惊慌地飞离堤岸，仿佛在半空落下长鸣的雪。植子站在柳树边得意地笑，“是鸟就该飞起来，怎么能一直停着。”

我忍不住想，要是早点认识植子多好，与其说她不想让鸟儿留在地面，不如说她是因为自己不能飞，才让这些小鸟替她飞走。

“你呢，你还想考研吗，还是找份工作。”植子缠着披萨上的芝士，没抬起头看我。

“我不想再考试了，我想去一个很远的小镇，在咖啡馆里做气泡水。”

“沙溪吗？”

“不知道，没去考察过。”

“那你学会做气泡水了吗？”

“还没。”我不好意思地笑，其实我没有下定决心，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不管你在哪儿，我都会寄很多书给你，我还会写信给你。”

我对上植子的眼睛，这是一双永远不会骗人的眼睛，虽然狡黠起来没有一句真话，但你总能知道什么时候是真话，什么时候是玩笑。

“我也挺想留在昆明的，这样你以后回来，就可以住我的家，冬天我们还可以去喂红嘴鸥。”

“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想，这是一座被耽误的城市，不是被开发商和旅游局耽误的，而是被我们这样的人耽误的。我们喜欢它，但是从来没有写过它。昆明之所以不是巴黎也不是纽约，不怪它本身不是巴黎或者纽约，而在于我们不是海明威或者 Patti，我们写不出《流动的盛宴》，也写不出 Patti 为纽约写的祷词。”

“汪曾祺不是写过昆明吗，他写得挺亲切的，虽然有好多地方已经不在了。”

“昆明没有那么好”，植子喝了一口百利甜，继续说，“他把昆明写得那么好，是因为他的青春在昆明。你没有发觉吗，汪曾祺追忆昆明的时候，已经从白发老人变成骑单车的大学生了，我当然欣赏他的个性，但我没见过他笔下的昆明。”

我点点头，咽下冒着热气的披萨。文林街好几家咖啡馆都摆有汪曾祺的书，下雨天偶遇那本《昆明的雨》，难免会有文字撞上现实的感觉，但这些文字无法撞进我的生活，就像西南联大的那些人在一二一大街留下再多的脚印，我也无法隔着翻新过的老地砖走他们走过的路，这是一座城市里的两种时空。

“今天的披萨没有迷迭香。”我说。

植子看了一眼窗口的迷迭香盆栽，露出我们之间独有的笑容。我和她亲眼见过短发的女老板来摘了几片叶子，过一会儿，它们出现在端来的披萨里。披萨店的小阁楼很老，从木板窗框望出去，能看见同样老旧的水泥楼顶和紫红色的三角梅，在昆明，三角梅几乎随处可见，文林街有，翠湖有，版竹翠园边的铁轨更有成片的。

“吃完饭，你下午有什么事吗？”植子问我。

“没，只有学校让填的一些表，什么时候填都无所谓。”

植子心领神会，从帆布袋里找出一枚小小的徽章递给我，“差点忘记了，给你的小礼物。”

我接过来，看见黑底徽章上的白色英文：I'm going to hell on a full scholarship! (我要去地狱获得全额奖学金！)

我笑了，“Yes, here we go。”

与其说她不想让鸟儿留在地面，不如说她是因为自己不能飞，才让这些小鸟替她飞走

我从北方来昆明上学，植子从南方来，而我们讨厌学校的共性远远大于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共性。事实上，讨厌同样的东西比喜欢同样的东西更能把人们连接起来，因为人们会出于不同的原因喜欢同一样东西，但讨厌总是指向它的全部。我和植子都讨厌政治课，讨厌油烟遍地的圆西路，讨厌人满为患的金色文林街（那时候地上全是银杏叶，很美，但拍照片的人太多了）……正是这些讨厌之物构成我们的默契，让我们去找些别的东西。

植子不停地看书，写东西，即便这样做好像没什么用。在咖啡馆碰头的时候，她坐下的第一件事，往往是从帆布包里取出一本书，问我看没看过，感觉如何。有些我看过的，我们就会聊一聊。最有意思的是《青春咖啡馆》里的那个大学生，每次聊起来，植子都笑得前俯后仰，“他就坐在那里，等着别人告诉他不要在那个矿业大学上学，然后他就退学，他一直那么希望，终于等到了。”

小说里的人总有事做，总能动起来，去完成他们愿意或者不愿意做的事，然后碰见不一样的人，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总之，一切都会改变。植子的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大意如此，说这些话时，她天真而热忱的脸，几乎要在暖黄色的灯光中

定格为书里的一页插图。

如果把每一次植子在咖啡馆拿出书的瞬间拍下来，剪辑在一起，那会记录到多少本书，多少不同的帆布包，多少不同的咖啡杯呢，这是我经常会有的念头。但如果要以图像的形式记录我自己，地图会比镜头更直观，我曾在昆明的地图上把自己去过的地方都标出来，喜欢的地方用绿色，不喜欢的地方用灰色，有特别经历的地方用黑色。

绿点有：文林街、翠湖、海埂大坝、“甜甜圈”天桥、同德的读书日市集、版筑翠园边的铁轨……

灰点有：园西路、青年路、医院、银行、学校北门、地铁站边的铁轨、华山西路……

黑点有：北门街、“绿山墙小道”、卡夫卡书屋、西山的云海……

标这些点的时候，我暗暗期望它们能连成某种形状，比如一只猫、一个数字，但最后它们什么也不是，它们真的只是一些不同颜色的点，无法勾勒出一个封闭的轮廓，顶多像一个潦草的小房子，连房顶都没完工。这些小点之间，我见过树上的松鼠，见过猫爪一样的云，还经常碰到一位牵着三只小狗散步的老人，但是我从没鼓起勇气和他交谈几句，也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和这些狗狗散步。我总是一会儿开心地往前走，一会儿为许多事情发愁，时间也过得忽慢忽快，像时来时歇的雨。

而现在，大学生活已经到了播放片尾工作人员的阶段，但除了学校塞给我的一堆电子表格和纸质表格外，我好像什么都没有。走到翠湖，我对植子说，“大学四年，除去疫情在家的一年，也没有很深刻的东西啊。”

“你想要什么深刻的东西呢？”

“不知道，在昆明好像避开了历史，但一个人是不可能避开历史的。春天刚来的那段时间，你还没返校，我经常失眠到凌晨五点，六点多宿管打开大门，我就一个人出去散步。对我来说，大学生活早就结束了，我每天都看见三五成群的学生，他们一边看手机一边笑，趿着一双拖鞋走向食堂，而我好像是因为无法露出笑容才被挤在外的。”

“我知道的”，植子拍了拍我，过了一小会儿，她才继续说话，“虽然你还能坐在咖啡馆里看书，但你没法避开那种感觉，我在家也是。你还记得学校北门那个嗓音很尖的老头吗？”

我点头。

“他每天都咄咄逼人地要看健康码，好像获得了什么生杀大权，那时候翠湖也安上了亮码进入的机器，你看，现在都拆掉了。”

顺着植子示意的方向，我看翠湖的保安正举着手机给外地游客拍合照。“现在是不是不需要夺回生活了？”我走过地面上“请在两米线外等候”的提示语，它还没被完全撕掉。

“可那些已经彻底失去生活的人呢，”植子反问我，“有些时候，人是不应该对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苦难心存感激的，但凡它还觉得自己是人类中的一员。”

她的脸上重新浮现出把铅笔屑倒进小木碟时的神情，刚被抛开的重负又回到我的背上，那些平常不会说出口的话，在湖边的树荫下像谈论别人的故事一样被讲出来，甚至可以当作一个过时玩笑被丢进水里，这是我真正松一口气的时刻，但植子又以更大的石头压住我，一块谁也搬不动的巨石。

现在是不是不需要夺回生活了？

我看向植子的浅绿色帆布包，她很久没背那个翻着白眼的包了。大一的第一个学期，植子总是背着白眼少女图案的斜挎包，脸上没有与人交谈的渴望，也不四处打量，那副冷淡的样子很像在排队，你会觉得她过一会儿就要走了。现在她只是困扰地站在这里，其实我能感到和她相同的困惑，我们如此年轻，如此无力，本应该一醒来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脑袋里却装满了解决不了的问题，连在夜晚好好睡觉的能力都丢掉了。

我是在凌晨两点的宿舍楼道发现植子失眠的。文学院的宿舍没有独卫，住宿生只能到楼道尽头的公厕去解决这个问题，刚入学的时候，大家十分愤然，但不到一个学期，女生们就习惯手拉手去厕所了。倒垃圾也是这样，二十来岁的大学生们，连晚上十点出宿舍倒垃圾都要签字，回来时也要签字，每个人都觉得无语，但也一一签过字再出门。面对这些荒唐的事情，唯独植子没有接受，我从没见过她和别人一起去厕所，我只见过她在凌晨两点多戴着耳机走向楼道尽头。至于倒垃圾的条例，

我撞见过她提着垃圾袋走到宿舍楼门口，发现要签字后又把垃圾提回去，自然是垮着脸的。

我悄悄给植子发消息，“我也没睡。”

这句话像暗号一样，终于让她看到我的存在，知道这栋楼里不止一个人在凌晨失眠。天亮后，植子约我去购物中心的一家书店，于是我们骑着单车，在耀眼的阳光下穿过青年路，坐四层电梯，走进宽敞明亮的书店。植子看上去是常客了，那张能坐下六个人的木桌则是她的老位置。

“你想喝什么，我给你点。”

“气泡水吧，谢谢。”

植子滑动着手机屏幕，其他顾客离我们有一小段距离，现在不说的话，就再没勇气告诉她了。我装作随意的样子，小声对植子说：“我在布拉格看到过你的，但你正在看书，我就没有叫你。”

“是吗？什么时候的事？”

“开学没多久吧，有一个什么动员会，我没去，然后在咖啡馆看到你了。”

“原来是这样啊，你应该叫我的，我们就早点认识了。”

我开心得不知道说什么，植子突然一本正经地看着我，问：“妹妹可曾读过什么书？”

光影荡漾的绿植边上，我努力忍住才没有笑出声。

那天后，我偶尔还会经过深夜的楼道。在灯泡的照射下，灰白的走廊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但是到了中午，阳光又会穿过墙上的镂空窗，给掉漆的楼梯把手涂上一层温暖的灰尘，我提醒自己，光有时候是会骗人的。

植子越来越多地向我展示真实的性格，她不再是落落寡合的少女，而是一个排队时喜欢原地转圈，思考时会无意识张开嘴巴的猫科动物，最让我欣喜的是，她从来没有因为我的主动靠近而自视甚高，我们各自独立，谁也不是谁的跟班。正因为这样，每次植子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做下什么决定时，我总觉得她要像辛巴达一样冒险去了，尽管她只是在说下午吃什么饭。去年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植子便是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我感觉全世界的人都在今天煮热红酒了，我们去吃椰子鸡。”

到了做椰子鸡的店，里面果然没有多少人，植子和我坐在角落的座位里，锅里的清甜椰汁被加热，冒出白色蒸汽，“永远听自己的话。”植子说。

“好。”我答应着，和植子碰杯。

“我们会输得很惨，”她补充道，脱掉厚厚的白色绒毛外套，“但管它呢。”

我知道植子的意思，大学里被默认要完成的事情，她一件也没做，没有考教师资格证，没有考四六级证书，没有早早准备任何一场考试。在所有人都踏上赛道的时刻，站在原地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挑衅，她被冷落，孤立，排挤，但我知道她没有做错什么，充其量只是和大家选的不一样，而且不擅于撒谎。

从金马碧鸡坊走到节孝巷，夜晚已经完全降临，我们路过老旧居民区里的宣传黑板，上面用白色粉笔字写着：昆明天天是春天。植子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团皱皱的纸，擦掉“昆”，又擦掉一个“天”。“快跑！”她说完就奋力跑向下一个路灯，我把剩下的字牢牢印在脑袋里，追上植子，“明天真的会是春天吗？”我问。

“我觉得会，前提是我们在。”

解决不完的问题，想不明白的未来，就这样散落在街巷中，我感觉不到空气里有多少希望的成分，只知道身边有植子在，比一切都要珍贵。那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格外软弱，一遭遇挫折就把整个世界挂在嘴边，后来我和植子很少用世界这个词语，现实的世界却一点点在眼中显形，即便再不想面对，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她不再是落落寡合的少女，而是一个排队时喜欢原地转圈，思考时会无意识张开嘴巴的猫科动物

“我晚上六点的飞机，下午就不和你吃饭啦。”植子轻快地说。

“这么匆忙。”

“还有些别的事，要在别的地方才能完成。”

“你知道我不相信‘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植子不明说的事，我从来不知，只是我很讨厌这种没有着落的感觉。

“你这回还是相信一下吧，植子苦笑，‘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它就更不会发生了。’

我耸耸肩，仰头看翠湖南路的树，没有一棵树能长到天际，也没有一个人不会死。

“我去机场送你。”

“不要，你一个人回去太孤单了。”

“我可以在地铁上看书啊。”

植子思考了两三秒，勉强让步。

我看着她的眼睛，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都知道自己和对方将开始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手里没有一张画好路线的地图，即便有，按照这条线也不一定能走到终点。

“再去喝杯咖啡？”

“我感觉要下雨了，先去地铁站吧。”

植子抬头看了看，乌云已经挪了过来，天正在变阴，“走吧。”

我留意着花坛边有没有老鼠的踪迹，不论白天夜晚，我都撞见过长尾巴的老鼠匆匆从花坛里跑出来，它毫不慌张，一副忙着出门办事的模样。我从没在别的城市看到这种景象，震惊的程度远远超过恐惧，以至于连老鼠都成为这座城市特有的信号之一，但城市的信号到底意味什么，我还没完全明白这个问题。

“你写的昆明是什么样的？”我问植子。

植子稍有诧异地看了我一眼，笑着说，“街道老旧，但树长得很好，所有不良少年变成不良老年后都来到这座城市，继续赖床，继续在下午泡咖啡馆，继续吞云吐雾。

看到新鲜的游客面孔，他们露出不感兴趣又若有所思的神情，然后，一切颠倒过来。”

我脑海中浮现出形形色色的昆明人，有染红头发的老阿姨，有穿着棒球服和人字拖的墨镜大叔，紧接着，一个穿海魂衫的老爷爷路过了我们，他简直像被召唤出来的，但我立马意识到，这里本来就是昆明。

“有点像，但这个设定是不是太梦幻了。”

植子偏着头思考，“那如果是你写呢？”

“我现在写不了东西。”我尽量平淡地说。

“还没好吗？”

“可以看两小时的书了，但写字还是不行。”

“好很多了！”植子抱住我，我牢牢盯着树干。

地铁轰轰地驶向长水机场，大一开始修建的新线路，毕业刚好投入运行，足以把植子和其他人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只是那些老旧街道的排水管，从我到昆明的第一天足足修到了现在，仍有继续修下去的势头，一个城市要多少排水管道才能疏通所有的雨水？眼望着高楼顶部的云，骑车时经过路面上的大小补丁，我在很多时候都感到不知所措。

“后半年你还会在昆明吗？”植子没什么行李，站在安检入口前，同我告别。

“不知道，有可能会吧。”我握了握她的手，又松开。

“你要是还在昆明，我就回来找你。”

“不在昆明呢？”我抬头问她。

“那我们就来昆明碰头。”

我又一次看向植子的眼睛，和她一起无奈地扬扬嘴角，这是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刻，我只能尽力把这声再见说得轻松一点。

“你看，我除了两颗补过的牙齿和一堆没写完的小说，什么也没有，”植子用食指点点唇边，露出天真的笑容，“等你恢复好了，有一天你也要离开这里，让世界瞧瞧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把左手手腕上的一条蓝色手链取下来，戴在她手上，“永远听自己的话。”

植子转身走进安检区，单薄的浅色身影不断往前移动，向我挥挥手后，不再回头了。

这就是在昆明发生的所有的事，只是这么一件事，但它就是所有的事了。我知道，植子会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她会在不同的地方削木头铅笔，写下越来越多的字，而这座西南城市，会在无尽的雨水和修补中，送走一些年轻人，并迎回一些不再年轻的人，我唯一不知道的是，我会何时回来。



刘雨萌

生于 2001 年，喜欢铅笔，讨厌昆虫。最喜欢的画家是安野光雅，但脸上的表情总是奈良美智。

小鸟文学地图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文内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非虚构

想知道美食家眼中的世界， 且看清代文学

史景迁 | 新书试读

一部献给所有读者的中华饮食史。

《中国文化中的饮食》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著作，由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主编，初版于1977年，是从考古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先驱著作，既不乏学术深度，又有兼具可读性。

全书以朝代顺序为划分，各章由海外汉学重镇负责撰写，考察了中国从古至今的饮食文化大观。从中国各历史时期的饮食习惯与风格、饮食结构、进餐礼仪与观念象征，到不同地区偏爱的食材、烹饪技法、厨具……全景展示中国饮食的诞生、沿革、流变，传统与创新并存，博采众长与对外传播交织，讲述一段关于“饮食”的精彩历史。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第六章清代中作家是如何描绘饮食文化的部分，分享给读者。



清代农村土地贫瘠，赖之谋生的人口却在飙升，再加上西方势力的扩张引发了严重的混乱，农村原本的穷困和饥荒因此更加严重。显而易见，这就是清代诸多叛乱

的根本原因。同时，贵族阶层之间又有一种文化自豪感——他们所传承的历史悠久非常久而变化多端，积淀丰富。他们把烹饪艺术当作正经事，当作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饮食有饮食之道，恰如行为有行为之道，文学创作有文学创作之道。饮食变换着各种面目，成了清代作家笔下的主题。他们往往只是重温或者简论过去的各种食谱集。不过，诸如李渔、张英、余怀、吴敬梓、沈复、袁枚之类的作家一皆为清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对食物的观点让人信服，而且有效地表达了出来。

要想进入美食家感受到的世界，可以参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本小说写于乾隆年间，不仅仅从食欲和食物观的角度来勾画各种人物，还表达了“吃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的观点。以周进和王惠为例，原文用了简洁明了的一段话，就完美体现了他们的性格：

彼此说着闲话。掌上灯烛，管家捧上酒饭，鸡、鱼、鸭翅膀、肉，堆满春台。王举人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落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周进也吃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次早，天色已晴，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

这么简简单单地对比正直与贪婪，要是深入下去，可以变成纯粹的嘲弄。文中论及盐商——往往是文人嘲弄的对象——想找某种“雪虾蟆”，从而结束本已完美的一顿饭之时，作者称他们言语严肃。这种论述就是在嘲弄盐商。装模作样的鲁家举行婚宴的场面，就是这种嘲弄的另一种表现。在这个非比寻常的场面里，起先出现了一只老鼠，从梁上掉进了燕窝汤里。之后，厨师朝一只狗踢了一脚，而自己的鞋子同时飞了一只出去，端端正正地落到了一盘猪肉馅烧麦和一盘鹅油白糖馅蒸饺上。这顿饭算是完完全全搞砸了。这显然表达了作者对于社会的某种观点。

这种文学描写展现了知识分子文化的一个方面，而美食家的生活正与这种文化密不可分。清代有众多学者对食物感兴趣，也对烹制食物的原则感兴趣。袁枚就是那样的学者，而且很可能是最为活跃的，说出来的话也最能服人。他为自己的食谱《随园食单》写了十多页的序言，全是对同时代人的告诫和警告，他称之为烹饪须知，是每个欲烹饪成功之人不可忽视的，其中的信息似乎既面向厨师，也面向那些对食物很敏感的读者。第一要义是要懂得特定食物的自然特性：猪肉宜皮薄，不可腥臊；鸡宜骟嫩，不可老稚；鲫鱼以白肚而扁身为佳。寻觅理想食材的结果是，“大抵一席佳肴，司厨之功居其六，买办之功居其四”。作料的选择也同等重要，酱、油、酒、醋，都各有特点与缺陷。写到此处，袁枚并没有转而说些笼统的话，而是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大概是针对南京地区的物产而提的，因为18世纪中期，他正住在南京地区）。用油的话，要选上等的苏州秋油；用醋的话，要谨防那些颜色甚佳，味道却不够浓的，因为它们失去了醋的“本旨”。镇江醋就为这种缺点所苦，江苏板浦醋必定是最好的，浙江浦口醋次之。食物的清洗和处理也很重要：燕窝显然要去毛，海参去泥，鱼翅去沙，肉要剔筋瓣，鹿筋去臊，鱼胆要小心处理，以防胆破而全盘皆苦。

说完这些之后，袁枚开始思考一些基本问题，也就是具体到一顿饭来说，如何让各种要素保持均衡。添加调料之时，要严格按照食物的本性，区别对待，不可含含糊糊。重点是独用和兼用，涉及酒与水、盐与酱；另一个重点是，凡一物烹成，必需辅佐，要使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举例来说，置蟹粉于燕窝之中，放百合于鸡肉、猪肉之中，皆是愚蠢之行。味道过于浓重的食物，如鳗、鳌、蟹、鲥、牛肉、羊肉之类，皆宜独食。

开头的这几个部分展现了美食家的总体饮食观念。在“戒单”里，袁枚写了好几页，举出了两件个人亲历的趣事，说明他认为什么是极差的食物：

极名厨之心力，一日之中，所作好菜不过四五味耳，尚难拿准，况拉杂横陈乎？就使帮助多人，亦各有意见，全无纪律，愈多愈坏。余尝过一商家，上菜三撤席，点心十六道，共算食品将至四十余种。主人自觉欣欣得意，而我散席还家，仍煮粥充饥。可想见其席之丰而不洁矣。

余尝谓鸡、猪、鱼、鸭，豪杰之士也，各有本味，自成一家。海参、燕窝，庸陋之人也，全无性情，寄人篱下。尝见某太守宴客，大碗如缸，白煮燕窝四两，丝毫无味，人争夸之。余笑曰：“我辈来吃燕窝，非来贩燕窝也。”可贩不可吃，虽多奚为？若徒夸体面，不如碗中竟放明珠百粒，则价值万金矣。其如吃不得何？

在“须知单”里，有一类明显是面向厨师的，如火候须知、器具须知、洁净须知。他把火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煎炒用的武火、煨煮用的文火。蛤蜊、鸡蛋、鸡肉、鲜鱼，各有适宜的火候。厨师须掌握好火候。不许屡开锅盖以验食物之嫩与不嫩，屡开锅盖，则食物多沫而少香，而且会失去味道。“明新鲜鱼，而使之不鲜，可恨已极。”另外，味太浓重者，宜分罐而烹之。有些人以一罐而共烹鸡、鸭、猪、鹅，结果便是各自之味合为一体，彼此不分，“味同嚼蜡。吾恐鸡、猪、鹅、鸭有灵，必到枉死城中告状矣”。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厨具：切葱之刀，不可以切笋；捣椒之臼，不可以捣粉。亦不可用不洁之抹布、不净之砧板，因其气味会残留于食物之上。良厨须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至于口吸之烟灰、灶上之蝇蚊、锅上之烟煤、头上之汗汁，皆须远离食物，以免玷入其中之险。

在这本食谱的某个地方，袁枚批评了李渔这位清初作家，说他有个烹饪方法“矫揉造作”。既然李渔高名在外，且相当有文学影响力，那么，这种批评所反映的就不仅仅是美食家为琐事而打嘴仗。袁枚反对李渔，似在反对把过分的粗俗与奇异古怪的做法相结合，因为有了这种结合，李渔实际是在乱用正经的食材，违背了袁枚的基本原则。李渔虽不是素食主义者，却在《闲情偶寄》里批评吃肉之人，说“肉食者鄙”而且浪费食物。他推荐肉食之时，以动物的特性为推荐原则（换作袁枚，他可能会按肉味与肉质来推荐）。李渔不想讨论食用牛、犬之事，因牛与犬是人类的朋友。他之所以尊重鸡，是因为鸡在清晨打鸣。至于鹅，吃就行，不用犹豫，因为鹅于人无用。鱼与虾也可以放心吃，因为鱼与虾产卵甚多。李渔也拒绝吃葱和蒜，因其让人口臭。他只吃韭菜初发之芽。他所要推荐的不是这三样里的任何一样，而是杜松子，因为杜松子更为稀罕和芳香。他之所以拒绝吃萝卜，是因为吃了萝卜就会打嗝，打嗝的暖气必属秽气。不过，他能接受芥辣汁，因为芥辣汁能让困倦之人活跃起来，吃了芥辣汁就像“遇正人”。为了做成最好的饭，李渔会授意小妇集蔷薇、香橼、桂花，酿成花露，待饭初熟则浇于其中。李渔认为玫瑰之露香气过浓，不在推荐之列。在自己的面条配方里，他专注于一些清淡而纯粹的味道。他这种时候的表现，比之某些过于讲究优雅的时候，似乎更加接近袁枚。但对于面条，他同样追求极度纯粹的味道。他的烹饪之法讲究面汤要清，只在水中加少许酱油或醋，然后浇于面条之上。面条本身事先加了少许芝麻和竹笋，还加了香蕈汁和虾汁来调味。

有位现代美食评论家认为，“李渔可能有几分装腔作势”。可以肯定的是，李渔在饮食上有道德偏见，有过分优雅的讲究，并任凭它们妨碍自己追求浓烈的风味。他也承认了自己喜欢的烹饪法则（“五香腊己，八珍饷客”），而这种法则恰好惹怒了袁枚。袁枚认为，如此苛刻的用餐模式只宜用于罕见的场合，犹如五韵八律试贴诗只适用于科举考试一样。除此之外，满、汉宴席上的菜品都是有规定的，如“十六碟”“八簋”“四点心”之类。这些规定都太死了。

上菜之法也是袁枚心中十分重要的事情，同时代的富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凡人请客，相约于三日之前，自有工夫平章百味。若作客在外，必须预备一种急就章之菜，以防客陡然而至，急需便餐，如炒鸡片、豆腐、炒虾米，及糟鱼、茶腿之类。上菜之时，不宜用过于贵重的明代瓷器，而应只用更为雅丽的清代陶器，使之大小各异，参错其间。物贱者器宜小，煎炒之物宜盘，煨煮宜砂罐而非铁锅。用贵物宜多，用贱物宜少。煎炒之物多，则火力不透。故用肉不得过半斤，用鸡、鱼不得过六两。其他食材当然要量大才行，不然无任何味道可言：白煮肉，至少要二十斤才行；粥亦然，非斗米则汁浆不厚。菜品做好之后，总是必须一样一样地吃，而不是大量堆叠于桌上一起吃。鱼或者其他动物有多少部位可以利用，厨师就应该尽量利用——就这一点来说，袁枚跟李化楠一样提倡节俭。如此上菜而成就优雅，也是袁枚的同时代人沈复所描绘的情况。沈复谈到了他妻子刘芸想出的节约之道：

贫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俭而雅洁，省俭之法曰“就事论事”。

余爱小饮，不喜多菜。芸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只，中置一只，外置五只，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盖均起凹楞，盖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头，如一朵墨梅覆桌；启盖视之，如菜装于瓣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随意取食，食完再添。

另做矮边圆盘一只，以便放杯、箸、酒壶之类，随处可摆，移掇亦便。即食物省俭之一端也。

沈复强调道，顶级美家用餐之时，必小酌而行酒令。他家中虽然相当贫穷，却往往得以与妻子坐而享受美食，即瓜、蔬、鱼、虾四物。清代中期的中国非常崇尚

雅致与简洁。沈复追求的节俭与典雅，正是这种时尚的一部分。因而我们发现，沈复这个人沉醉于感官享受，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置办醉蟹，作岭南之游；食广州荔枝鲜果之时，有历平生快事之感。我们也会发现，就算是《红楼梦》这样的小说，也有好几处都提到了别具特色的珍稀美食（或者简朴食物的绝佳标本），人们因此体会到了异常的快乐：鹅掌、酸笋鸡皮汤、琼酥金脸、糖蒸酥酪、灵柏香薰的暹猪。有一群江浙商人，既是袁枚的同时代人，又是他的同乡，曾于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暂居长崎。当时的地方长官中川忠英对其饮食习惯感兴趣，于是在他们之间展开了调查。他注意到，那些商人日常饮食必备的是饭、茶、醋、酱油、腌菜、香瓜、豆豉。日常吃饭，平均每顿只有三道菜或四道菜：早饭吃些粥、干菜，再配上酱瓜和干萝卜；午餐和晚餐吃得简单，不是肉菜就是鱼。请客吃饭却不一样。他们遵循明确的礼制，须摆出十六道菜，包括熊掌、鹿尾、鱼翅汤、燕窝汤、海参汤，也包括烂煮羊羔、东坡肉（李渔发现这道菜已经传开了）、野鸡和炒鸡、全鸭、鹅、蒸鮰鱼、蟹羹、蛏干、鱼肚。如果用大菜类的中等十碗菜来待客，就会减去熊掌、鹿尾、野鸡、鹅、蟹羹和蛏干。如果用大菜类的中等八碗菜来待客，就会进一步减去鱼翅汤和羊肉。

我们设法评价清代美食家的一般饮食习惯之时，还会发现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中川忠英着重指出，在长崎的中国人也大量饮酒。因此，我们再次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沈复对大量饮酒一事坦诚得很，打消了我们的疑虑。他承认，乾隆庚子年新婚之夜，大醉，未入洞房已不省人事。袁枚深知，纵酒则不知食物之味。但是他也深爱佳酿，坦言曾饮溧阳乌饭酒十六杯，复饮至眩晕方休。其酒色黑，且令人无法抗拒。他平常并不饮酒，而在另一场合遇到了苏州陈三白酒，因其甘甜而粘唇，饮至十四杯。袁枚又写了颇为欢乐的一段文字。他把烧酒比作人中之光棍，或者县中之酷吏：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汾酒之下，山东高粱烧次之，能藏至十年，则酒色变绿，上口转甜，亦犹光棍做久，便无火气，殊可交也。如吃猪头、羊尾，非烧酒不可。苏州之女贞，不入流品。世人对绍兴酒有过誉之嫌。至不堪者，扬州之木瓜酒也，上口便俗。

豪饮兼具交际功能与个人功能，各功能之间的区别却难以理清。不过，豪饮并非清代中期的独有现象。康熙年间，礼部尚书韩菼之死显系饮酒过量所致。同在康熙年间，坊局同僚雅集而饮，如汤斌、沈铨、张英之类令人尊敬的学者也在其中。聚饮之人各有一杯，杯中镌刻各自姓字，独一无二。按余怀在康熙初年的描述，来客聚饮于金陵，皆至大吐而卧地方休。此事发生于妓馆之中，豪饮实属自然之事。若是妓女为人圆滑，善周旋，广筵长席，人劝一觞，皆膝席欢受，又工于酒纠、觥录事，无毫发谬误，能为酒客解纷释怨，人皆重之。不过，在上流社会里，此类行酒令之事也很普遍。沈复之妻刘芸曾为其物色一妾，并与之畅饮。蒲松龄讲过一个行酒令的故事，非比寻常：行酒令的结果取决于参与人的运气，看参与人是否能检索到《周礼》里带食旁、水旁之字。酒与食物紧密相连，牢不可分，文人的美好生活缺之不可。此说证据充分。

食物与酒密不可分，而酒本身又跟感官享受的种种时刻融为一体。在清代美食家的圈子里，有权有品位的男人是有钱人，身边的女人也多。因此，食物词汇与色欲词汇有所重叠，并且融合成感官享受的专门术语，也就不是什么奇闻了。沈复初见憨园之时，憨园年方十六，犹为处子，走入了沈复和刘芸的生活，成了他们的心头好，但好景不长——沈复视之为“瓜期未破”。这种明喻常见于男性诗歌（不过他们觉得，把女性比作含苞待放之花、盛开之花、树叶更合适）。而且，至少从8世纪以来，这种明喻在女性诗歌里举足轻重。妓女赵莺莺之诗引人遐想，其中就有这种明喻——“削春葱”“樱桃颗”“瓠犀”和“紫葡萄”。清代诗歌里也有这种明喻，我们却没必要一一列举。

不过，《红楼梦》里有几个简洁的例子，研究清代食物的人理应关注。这几个例子和本文此处讨论的问题相关，因为《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读者大概也包括我们讨论的这些美食家——文人精英、受过教育的商人家庭，以及他们家里的女子。这些人在阅读经典或者工作之余，也过着优雅的日子，心满意足。在利用传统意象方面，曹雪芹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这些读者肯定也是见而乐之，诸如帘卷虾须；有个姑娘“腮凝新荔，鼻腻鹅脂”（即便曹雪芹在此处近乎自嘲）；贾宝玉这人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年轻姑娘们跟他联系在一起，靠的是红色和水果这两种意象，外加她们的“杏子红绫被”“桃红绸被”以及“水红绫子袄儿”。

但是，《红楼梦》形成于清代，故事结构复杂，情节之中又有食物词语，小说的语言因此更加丰富。就这部小说而言，作者借助食物词语这种形式实现了两件事情：

以新的方式探索如何利用暗喻，过程之中还能意定神闲；使用呼应的手法来呼应前文，而不是呼应过去的同类作品。曹雪芹展开陪衬情节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联系食物或饮料。因此，小说里先写酥酪是贾宝玉为袭人留的，李嬷嬷却因赌气而把它喝掉了。之后才写出了动人的一幕：贾宝玉头一回意识到，贾家也不是事事都能掌控，他心爱的丫鬟兼情人袭人，实际有可能被赎身而去。从情节顺序上来讲，喝酥酪的情节也有铺垫。贾宝玉在袭人家时悄声说，“你就家去才好呢，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指留了酥酪，实际带有性暗示），袭人也悄声说道，“悄悄的，叫他们听着什么意思”。她边说这话，边伸手将贾宝玉项上的通灵玉摘了下来。大卫·霍克斯是《红楼梦》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译者。他已经指出，通灵玉代表贾宝玉在生活里的性别角色。酥酪本是皇妃贾元春所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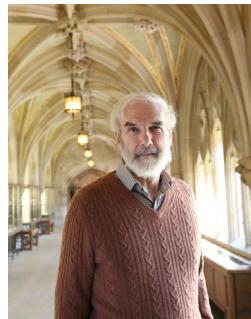
为了让秦钟之死更令人哀痛，曹雪芹用上了类似的呼应手法。小说里有一幕讲的是爱情与年轻人纵欲之事。秦钟与小尼姑智能开上了玩笑，智能机敏地答道：“我难道手里有蜜！”秦钟离世之际，贾宝玉及其仆从“蜂拥”至其床边，盯着秦钟“如白蜡”一般的脸。曹雪芹围绕这两位少年，编织了嘴和谷道这种意象。这种意象类型涉及多种复杂的元素，蜂与蜜这两种形象只是其中一个片段。他们吃饭之时才开始了解彼此。家中老仆焦大喊出了贾家的丑事之后，就有人往他嘴里塞马粪，以示惩罚，场面非比寻常，之后就是秦钟进入贾家家塾之事。同窗金荣嚷道“好烧饼”，意在讥讽秦钟和香怜，且有言外之意。秦钟与小尼姑初试云雨，又与贾宝玉云雨一场，两次都发生于馒头庵中，“因他庙里做的馒头好，就起了这个诨号”。这些事情之后，秦钟筋疲力尽，文中以“懒进饮食”来体现这种状态。秦钟短暂还魂之后，一声长叹便去世了。

《红楼梦》里出现的田园诗为数不多，在诗的背后，往往有一系列模棱两可的地方。下面这首诗就是最典型的：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但是，曹雪芹并没有让清代读者止步于这种田园幻象。因为皇妃贾元春选定此诗为行宫某处的装饰之前，贾宝玉已经引用了下列诗句，“柴门临水稻花香”，似乎在回应父亲贾政的所思所想，因为贾政见到分畦列亩、佳蔬菜花之景，激动地喊道：“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此处的讽刺意味就很强烈了，因为贾宝玉引这句诗是在呼应他先前的想法。他曾亲自参观农庄，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他与一个村姑对话，亲眼见到那个地方的生活状况，才明白“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古诗的含义。不过，贾宝玉仍然为自己的教养所困，他养成的爱好仍然是美食家式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唯一一次拜访穷人家庭时，拜访的是丫鬟袭人的家。袭人家为了招待少主人，齐齐整整摆了一桌子果品，也就是最拿得出手的，袭人仔细看过却忧伤地说：“总无可吃之物。”



史景迁

1936年出生于英国，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1965—2008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著作极丰，主要有《追寻现代中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太平天国》《改变中国》《曹寅与康熙》《康熙》《天安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王氏之死》《利玛窦的回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在上野公园玩耍的康康（左）和兰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散落在中国境外的大熊猫不足 20 只，熊猫外交最先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当时，一对熊猫作为外交礼物被送给了苏联。平平和安安成为全球最著名的（也许是最成功的）现代文化外交努力之一的共产主义急先锋。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热情友好关系的表达，平平于 1957 年来到莫斯科动物园，安安晚两年到。六年后的 1965 年，熊猫被当作礼物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 1965 年到 1980 年间，有五只熊猫被送给朝鲜政府。

熊猫外交的新阶段始于美国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1972 年出人意外的访华之行。在日渐回暖的冷战背景下，尼克松的访华之旅是一次明智的外交行为，回到华盛顿后他的外交资历得到了显著提升。他的妻子帕特带回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承诺，很快会有两只熊猫到达美国的首都。中美邦交正常化因而被中国发出的文化好意打上了括号。以“乒乓外交”为开端，以熊猫外交在共产主义半球之外的延伸为收尾。周恩来总理究竟是怎样作出送熊猫的决定的，这事始终没人弄清楚。在所有不足为信的可能性中，一些故事认为这个决定与翻译错误有关，据说美国第一夫人，一个只在私下场合吸烟的人，原本只是在看到周恩来总理的熊猫牌香烟盒后说了句“我可以来一个吗”，然而，最后据大家所说，她得偿所愿，总统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份礼物的象征价值。当玲玲和兴兴于 4 月 16 日到达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时候，第一夫人亲自到场迎接它们，其他在场的还有近两万人（尼克松本人没有参加）。在这对熊猫入住后，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年度访问量攀升到 110 万。熊猫的运输问题也得到日本媒体的密集报道。尼克松后来向中国赠送了一对麝牛作为回礼。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这种“黑白相间的熊”的外交运用极其显著，成为中国和其他更多西方国家恢复邦交关系的重要内容。这些熊猫被特意送到遍及北美、西欧和亚洲的动物园。它们的到来在像美国、日本和英国这类大众消费社会里引发了国际性的迷恋。而这又相应导致了 CITES 对该物种的再定级，该公约是规范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国际共识。1984 年的一次调整强调了围绕熊猫产生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意义和后续影响的扩散问题，熊猫被从限制相对不那么严格的目录 3 调整到了目录 1 的“濒危动物”之列，这是限制等级最高的动物分类。这次调整部分可以归结为由 WWF 资助的一系列调查，这些调查称熊猫所处的危险境地远超很多人的想象。这些调查也受到大熊猫抵达华盛顿特区和其他西方城市这一事实的激发，也正是因为这些调查，大熊猫如今被广泛地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濒临灭绝危险的熊科动物代表。

这种领导者个体之间的礼物收受行为也被认为能够引发彼此家人般的好美情谊。尼克松来北京不是为了讨要大熊猫，但那些追随他脚步而来的人是。1972 年的日本首相田中、1974 年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和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1979 年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1982 年的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所有人都迫于“带一只熊猫回家”的公众压力来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他们每一个人都如愿以偿，能够对外宣称成功达成各自国家争取到熊猫的协议。那些大熊猫置身于政治家身旁的图片展示，体现出我们可以称之为“外交幼态延续”(diplomatic neoteny) 的东西，和政治家怀抱婴儿的刻板形象类似。这些礼物通常被认为用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的交换，但是，每一个场合都是由外交部工作人员像处理国家事务一样处理交换细节。

在玲玲和兴兴给中美关系带来缓和的同时，中美之间熊猫外交的开启也使日本产生了巨大期望。因为自盟军占领结束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被框定在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轨道内，并受 1952 年最早签订的一系列安全条款（这些条款在 1960 年大规模抗议背景下得到了修订）的约束，而且日本还追随美国，拒绝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日本处境微妙，但不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的国务部都没有想到要提醒他们的亚洲盟友有关访问中国的决定（1971 年 7 月公布，1972 年 2 月成行）。回暖的中美关系会潜在孤立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日本——在野的社会党（JSP）和共产党（JCP）很长时间以来一致呼吁恢复与中国的正常邦交关系，作为宣示日本主权的手段——于是首相田中角荣（1918—1993）和他的自民党（LDP）同僚在尼克松声明发表后就开始了各种努力。外交部的官员最终安排田中在 9 月份访问北京，就在尼克松访华 6 个月后。

美国总统访问北京的决定是被称为“尼克松冲击”的两大事件之一，由白宫推出的新举措重新界定了短短几个月后日本在全球空间中的角色。第二个事件于 1971 年 8 月到来，尼克松宣布他的政府会对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附加税，与此同时放弃金本位，以应对渐趋恶化的收支平衡局面。这个举措从根本上终结了二战以来支撑全球资本主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导致了日元如火箭冲天般升值，先前稳定在差不多 1

非虚构

兰兰、康康： 上野动物园熊猫时代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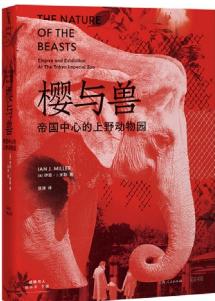
伊恩·J. 米勒 | 新书试读

日本为什么不惜代价地想拥有“自己的”熊猫？

“每个东京人一生中至少会来四次上野动物园。”上野动物园成立于 1882 年，来这里赏樱和看动物是游客的热门行程，更是日本民众家喻户晓的日常。然而，在它亲和的面纱下，却藏着身处帝国漩涡中心的沉重过往：明治初期为追求“文明开化”，大批异域动物被强行引进并分类；随着帝国陷入战争深渊，“战利品”动物和军用动物成为展览对象；在军国主义末日疯狂的刺激下，上演了动物屠杀与献祭仪式；战后重建的雄心，诱发了“熊猫热”和人工繁育计划……

《樱与兽》一书认为，这是第一座有别于西方世界的各种影响而独立建设成立的动物园，不仅是日本东京的著名观光景点，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一方面从独特的角度体现了日本自明治时期以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剧变，另一方面反思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熊猫前往日本的历史，分享给读者。



美元兑 360 日元的有利利率上，而现在是 1 美元兑 300 日元。日本以美国为主导的出口驱动型经济陷入短暂的混乱之中。康康和兰兰就正好是在这些事件与 1973 年全球“石油危机”——当时通往中东的石油通道出现问题——之间的时间段到来的。这对“乖萌”的“国家级 VIP 贵宾”，也是动物园喜见的一长串动物外交官名单中最新也最受欢迎的一对——作为急需的分散注意力的消遣和国家被孤立的担心烟消云散的信号，受到媒体和公众的热烈欢迎。



备受关注的康康和兰兰

日本的新闻媒体紧紧抓住熊猫故事不放，甚至在田中还未出发前往北京前就这样。对一些人来说，围绕熊猫产生的媒体狂热，比两国邦交正常化更值得注意，这部分是因为很多人在尼克松访华后视这种正常化为理所当然。熊猫也助长了日本萦绕不去的否认帝国往昔的文化。当外交问题涉及需要考虑这些从一开始就导致两个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不和——有关战争责任的禁忌话题时，这种笨拙的、毛绒绒的、看上去无害的熊的交付看似把人们的注意力彻底引开。各种猜测大行其道，“日本会得到它自己的熊猫吗？”《读卖新闻》的一篇文章在田中出发前夕发问道，这只是思考这个问题的诸多文章之一。活生生的熊猫，而非冷冰冰的文件，更容易被视为重归于好的真诚意愿和外交胜利的信号。美国和苏联，冷战世界的两大超级巨头，都得到了熊猫，那么，后帝国时代的日本，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新兴经济体但又具有日渐褪色的殖民野心，难道还不值得拥有一件这样的礼物吗？

政治家们和行政官僚们认识到这个礼物的重要象征意义——与美国对等的国际声望的标志和后帝国时期与中国和睦友好的信号。中川和他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去挤压这个新的夸富宴的水泵，一如古贺在战后努力推广上野动物园一样。动物园团队在与政府官员商量之后，采取了古贺忠道主事期间和盐湖城霍格尔动物园往来的最公开的策略：他们使用公众礼物的旗语来表达对这些熊的热望。在田中访华前夕，上野送出两对动物——一对大猩猩和一对黑天鹅——给北京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则回赠以一种鹤——历史上这种鹤在两国都有发现但如今在日本已经灭绝，还有一对黑颈鹤。

中川和动物园园长浅野三义释放的信号对北京来说心知肚明，但是熊猫来到东京可不是那么顺利的事。作为奇货可居、价值高昂的生物和广受欢迎的大众符号，康康和兰兰得到日本国内多家赞助商的争抢，每一家都希望从这些熊的象征魅力库里分到一杯羹。

从一开始，这个礼物就是个大众传媒奇观。北京的外交声明成为一次罕见的“电视直播”事件——“中继”，来自一个首先是“禁区”然而历史上大众又非常熟悉的国家的实况转播，吸引了大量电视观众。在 70 年代早期，国际电视直播的同步性依然有其自身的景观价值。当内阁秘书二阶堂进（1909—2000）通过现场直播宣布中国赠送熊猫的决定，紧接而来的是备受期待的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信息发布，这引发日本举国上下的狂喜。“作为对日中两国之间外交正常化的承认，已决定一雄一雌一对熊猫，将被当作中国人民给日本人民的礼物送出。”电话如潮水般涌进上野动物园，追问这些熊会被安置在东京还是其他地方。而如大阪、京都和其他地方的大型区域性动物园，也都在竞相投标想要得到这些动物，声称应该得到政府的公正对待。小城市的动物园则寄希望于“熊猫秀”的巡回展，这种巡回展类似尼赫鲁赠送的大象英迪拉在日本乡村到处展出的流动动物园的一个现代晚期的新版本。冲绳县，先前还是美国的保护地，也就在 6 月份才回到日本的控制下，送来了甘蔗并邀请这些熊去访问魅力的冲绳”。

10 月 6 日，随着官方正式宣布熊猫将落户上野动物园，种种猜测才平息下来。“因为熊猫是中国人民送给日本人民的礼物，”动物园园长浅野在接受《朝日新闻》的采

访时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将熊猫安置在一个最有可能被最多人看到的地方。”他宣称上野动物园作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就收藏动物规模而言）也是访问量最多的动物园，无疑是这种考虑的最佳选择。这对上野动物园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胜利，因为当时的上野动物园因为城市中心地带的位置和相对较逼仄的动物笼舍空间，正越来越多地承受着来自日本动物爱护协会（JSPCA）这类组织通过媒体发出的批评与指责。古贺忠道和东京动物园协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包括盟军最高统帅的妻子琼妮·麦克阿瑟在内的一些占领期外国名人，在 1948 年发起成立了 JSPCA。该组织建立在日本人道会，也称日本人道主义协会奠定的基础之上，该协会由作家新渡户稻造与妻子玛丽以及其他人在 1915 年发起成立，是一个致力于应对虐待儿童和动物问题的伞形组织。在 1972 年，浅野和中川都是 JSPCA 的重要成员。中川则担任理事会主席直至 2010 年。

JSPCA 理事会对熊猫的安置问题也意见不一。该组织的成员包括著名的儿童作家，也是《每日新闻》编辑的户川幸夫（1912—2004），他主持理事会工作，也主张尽管上野动物园比较适合应对熊猫到来之后的参观热潮，但是相对而言建在这个城市人口更少、森林覆盖更好的西北部郊区地带，1958 年才开放的设施更新一些的多摩动物园，才能够为长时段的展览提供更优越的环境。“便利也就不过如此。”户川在 10 月 11 日发表于《朝日新闻》的文章《“观看或保护，哪个更该优先考虑？”》写道。“如果熊猫死掉将会是个悲剧。多摩更大，空气也更好，它会是最适合熊猫的地方。”南村理香，一个来自横滨的 10 岁女孩，在《朝日新闻》受众广泛的头版“公众意见”栏目刊载的一篇有关熊猫的短文里赞成这种意见：“我反对将这些在空气很好的中国被照顾得很好的熊猫，置于一个空气如此糟糕的地方（如上野），熊猫会生病的。”理香的声音没有被采纳为孩子们整体意见的代表。然而，延续既往的模式，童年的观念和孩子们的兴趣成为对成年人政治和社会竞争的调停，将熊猫留在上野的决定被简化表达为对青年一代需求的回应。“无论我们说什么，”JSPCA 理事会的一名成员，也是鹤见大学教授的内山典久表示，“上野是上佳之选，因为它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更容易到达。孩子们已经选择了上野。”



转运笼中的康康和兰兰

熊猫的到来时间是 10 月 28 日，也就在北京正式发表礼物声明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东京羽田国际机场，熊猫受到动物园员工和 200 多名记者的欢迎。当熊猫还在绿色运输箱里时，这些记者就一个个迫不及待按下快门。运输箱被放在拥有特许授权的日本航空（JAL）DC-8 飞机前，正是这架飞机将它们从中国带到日本。如同上野动物园一样，日本航空也为运输熊猫的权利而战。全日空航空公司，日本第二大航空公司，发起一场对外交部的公开游说行动；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也就在几周前，他们才刚刚完成将大猩猩和其他礼物运往北京动物园的任务，他们更有经验准备也更充分。正如报纸所称，这场备受公众关注的“空战”纯属商业考虑。日本的对外旅游和空中货运往来随着 GDP 的增长而增长，两家航空公司都视中日外交正常化为将其网络拓展到一个有利可图的潜力新区的机会。出于象征意义的考虑，作为日本的国家航空公司，JAL 最后被选中。但是，此前立场中偏右的《读卖新闻》还提出过一个激进方案，由空中自卫队——日本帝国军事力量的战后继承者，来负责运送。

11 月 4 日，上野动物园为熊猫准备了一场正式的欢迎仪式，日本政治精英代表尽数到场，包括内阁秘书小薰，还有自民党的秘书长和几家重要政治党派的主要代表人。在这些国家级别的政治要人之外是东京市长和市议会负责人。浅野园长发表演讲之后，中国代表带着微笑走上前来，表达了他的希望：“希望这对代表着中日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熊猫，能够茁壮成长，一如同两国之间的情谊一样。”一只红毛猩猩 Miyo 拽了一下系在彩色礼品包上的绳子，应声抖出一个条幅，上面有“欢迎大熊猫康康和兰

兰”的字样。然后，遮在熊猫临时安置所上的幕布被拉开，这个临时安置所由老虎笼舍紧急改造而成。在直接负责熊猫照顾的饲养员本间胜男看来，熊猫“显得很紧张”。众所周知，他是个敏感的动物情绪解读者。与此同时，人们已经在动物园新建的“熊猫门”外排成长队，渴望着来到熊猫跟前看上一眼（其中包括媒体名人黑柳彻子，她号称是“熊猫的头号粉丝”）。

首相田中和其他政治家也很快将熊猫用于他们的连任竞选努力。熊猫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政治海报和其他竞选材料中，就好像每个党派或政治家个人都在竭力主张自己对熊猫魅力的所有权。当自民党将康康和兰兰的图片做成竞选徽章，在一个 2.5 万人的聚会上发放时，索要徽章的要求从全国各地如潮水般涌来——“熊猫政治”既是国家事务也是国际关系问题。公明党和社会党人很快就将其装束与徽章、海报和熊猫竞选口号统一起来。尽管社会党人对“中国问题”主张强烈，但是自民党仍然主导着熊猫话语的主线。它明确地鼓吹居于熊猫政治核心的这种模棱两可，也就是上野动物园熊猫和中国熊猫之间的联系的复杂本质。

这种象征的杂糅混淆了时政记者对田中首相出访一事所作的分类。“这不是一起普通意义上的动物园交换事件，”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位编辑写道，“它是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既然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人们就无法将其框定在单一角度或是使用那些政治报道的常用技巧。“无论我们的记者造访上野动物园多少次，他们总是得到‘大熊猫属于食肉目和浣熊科动物……’抑或‘大熊猫的食谱是……’等一成不变的回答，但是‘它们什么时候到来’或‘哪种动物会被选中’这类重要问题，都掌握在（日本）政府或中国那里秘而不宣。我们不得不动用稻田，他是我们在北京的特派记者，也是我们跟踪此事的时政报道者。”其结果就是“熊猫记者的诞生”，或说“熊猫报道者”。这类“不走运人士（？）”——问号的专属者——被要求兼具社会部记者的敏感性和更为“严肃”的时政部记者的极富价值的技巧，以适应这种新节奏。换句话说，他们被要求适应这种生态现代性错综复杂的杂糅局面。

“熊猫报道”的竞争充满火药味。好的图片和独家报道能够直接拉动报刊的销量。《日本经济新闻》的编辑发现，“超过 120 家报纸、电视台和电台、杂志以及国际连线服务机构向东京政府官员提出申请”，要求参加熊猫抵达当天在羽田机场和动物园的现场报道活动。最终，官方根据每家单位在首都各种记者俱乐部内的机构地位，以及发行量确定了参加人数。作为报业中坚，也是影响力相当大的报纸，《日本经济新闻》被允许派出最强报道阵容：两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分别到机场和动物园。“类似的报道阵容一如田中首相在中国达成协议以及回国时。”这位编辑评论道，看上去深深惊讶于这种动物的受欢迎程度。他继续说，报纸当然愿意派出更多记者，但是按照活动事先的约定条款，人数受到严格限制。摄影记者“不允许进入熊猫周边 7 米内的距离，而且我们也被告知抵达仪式随时可能出于健康原因而被取消，这简直就像报道一场正式的国务访问”。

处在抵达仪式聚光灯热度下的熊猫，扭曲了新闻记者应有的职业规范和性别假设。因为在羽田机场的仪式举办之前就没有给他们留出太多的心理准备时间。《日本经济新闻》主编在他的社评文章里记录下这些“熊猫记者的诞生”。摄影师们被留下来抢镜头。晚上 8 时许，当遮挡物从康康和兰兰所在的板条箱上拉开时，“在场所有的媒体都情不自禁喊出了‘waaait！’，就像任性孩子一样。”向来文风偏辣的记者“嘟囔出‘它们不过就是动物而已啦’之类的话”，但是“每个人都只想争取更好的视角”——男人的表现也不逊于女人。“来自《妇女周刊》的女性记者不住地喊道‘可爱啊’，被期望更能自持一些的男性记者也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噢，可爱’这类感叹。”即使是来自《日本经济新闻》的老牌记者，在这种场合也难以自抑地留下眼泪。这份报纸有时被称为“日本的华尔街日报”，向来以报道严肃新闻自居。对很多男人而言，这是种“奇怪的感觉”，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提出的问题就如同那些为《妇女周刊》工作的记者一样琐碎无比：‘它们什么时候交配？’‘兰兰生殖力强吗？’‘熊猫怀孕期多长？’”。



伊恩·J. 米勒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科学史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合聘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史，尤其是科学、技术和环境变化的文化史，合编有《处于自然边缘的日本》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托拉查人的传统建筑，图片来自 [Wikimedia](#)

非虚构

上一次他天真了， 这一次他倒霉了

奈吉尔·巴利 | 新书试读

一段与独特民族个体的真诚接触

《天真的人类学家》之后，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博士前往陌生的苏拉威西岛，在潮湿闷热、危机四伏的高山密林中艰难穿梭，寻找当地的托拉查人。这个民族的文化独特神秘，因壮观的建筑和神秘的祖先崇拜而闻名。《倒霉的人类学家》就是巴利此行的田野笔记。不同于高深莫测、正襟危坐的人类学调查报告，他凭借幽默乐观的性格，通过诙谐轻松的文字，将田野工作中遭遇的痛苦与折磨、危险与敌意，与异域文化的种种冲撞，通通化为妙趣横生、令人捧腹的欢乐笔记。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第八章《山里的巡回演员》，分享给读者。



人类学家也许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客人。我不会邀请这样的人到家里去。他总是用愚蠢的问题困扰主人，使他们分心。起初，他不知道在寻找什么。毕竟，你一开始并不知道如何去捕捉陌生的生活方式的本质，人类学家甚至连他们正在寻找

什么样的猎物都没有达成一致——是在人们的头脑中，还是在外部现实的具体事实中，两者兼而有之，还是两者都不存在？另一些人会认为，大部分人类学“知识”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杜撰，依赖于两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因此，一开始总是下意识地继续做下去，之后再去准确分析自己做过的是什么。

就个人而言，我很容易决定从哪里开始。约翰尼斯宣布我们将在早上出发去参加一个玛聂聂庆典。他的祖父会陪着我们，步行前往五六公里外的地方。厨房里坐着一位面色凝重的老先生，他的手里拿着一根长矛，口中嚼着一块煮熟的木薯。他一看到我就和蔼地笑了起来，咬了一口木薯，然后将木薯滑进口袋里，预备待会儿再吃完它。

整个村子都被调动起来。孩子们从房子里探出身子盯着看。他们发不准“Belanda”（荷兰人），所以喊着“Bandala”（盒子）。屋子里涌出一连串访客，其中大部分人都穿着黑衣，这是死亡的颜色。托拉查的两大节日在这里被区分开来。西方的节日和“降烟”——死亡的节日，以及东方的节日和“升烟”——生命的节日。托拉查的仪式看起来完全不平衡，更多地强调死亡而不是生命。然而，这很可能是由于传教士的影响。他们抑制了相对放纵的生育仪式，让死亡仪式看起来像搁浅的鲸鱼一样不协调。不同派别的基督教对古旧的习俗达成了不一样的妥协。一些教会坚持认为他们的信徒必须远离死亡节日的某些部分，并且不吃献祭的水牛。另一些则要求信徒向教堂供奉水牛。有些教会强调基督徒不能有坟墓的画像，就是这样。其他教会则允许有一个画像，只要它被用于纯粹的纪念。

大家互相问候，笑声不绝于耳。约翰尼斯的祖父总是让人敬而远之，脸上有一种宴会上男管家的庄严。“我不太会讲印尼语，”他解释说，“但我想让你知道，在这个村子里，我是古老宗教的代表。这些人现在是基督徒，但他们仍然要听从我的话。我已经宣布玛聂聂仪式正式开始。现在，在仪式结束之前，大家不许耕种田地，不许盖房。即使是基督徒也要遵守这一点。”

我转向约翰尼斯问道：“你也是基督徒？”

“是的，我和你一样，都是新教徒，但对我们年轻人来说，这并不重要。我们……”他摸索着寻找词语，“比内克那一代人思想更开明。”

内克哼了一声：“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当我想开始学习宗教，学习那些古老的诗歌，大家都恳求我不要，说我会永远是穷人。他们是对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约翰尼斯也会学习。他不是一个愚蠢的男孩了。”

山顶上矗立着一座教堂，按照蒂罗尔的风格粉饰了尖顶。教堂后是一排排没有人烟的紫色的阴森山丘。透过云层的缝隙，阳光倾洒在屋顶上。它看起来像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教堂。我们走在路上时，老人的一连串观察和解读如体育评论员般轻松自如——历史、神话、个人回忆。许多文化都有特许的权威人士——他们本土的人类学家。这些人偶尔会出现在该主题的文献中，名字为一代又一代学生所熟知。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些人，但内克显然是其中之一。我有了一个助手。我的专家兼报告人现在出现了。尽管我在这里只待很短的时间，但也不可能不开始工作。我掏出一个笔记本，开始把这一切都记下来。

一大群人聚集在陡峭的悬崖底部，悬崖上则布满了方形的洞穴。这些都是埋葬死者遗骨的坟墓。与托拉查的其他地方不同，这里没有代表死者的木制人偶，每个坟墓都用刻有水牛头的木板简单地封住。约翰尼斯坚称，过去曾有过这样的形象，但现在都消失了。在如今的节日里，人们会把逝者的遗体用新鲜的布包起来，再放回坟墓里。有人专门到城里去买布料。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布的颜色是最为艳丽的那种，上面还有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印花图案。

我曾希望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溜进去，悄悄地躲到一个角落里，摆出民族志学者刺探他人隐私的姿势，但未能如愿。内克是一名表演者。这是他的大事件，他要把它发挥到极致。我们穿过茂密的灌木丛，走近人群，他们看不到我们。我们溜到参与者圈子外的一块岩石后面，内克发出一连串的沙沙声和咕噜声，试探性地呼唤约翰尼斯来帮助他。几分钟后，他换了身衣服冒了出来：红色条纹短裤和短袖上衣。我想起了在印尼语入门课上的一个练习：“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内克喜笑颜开，全力对付着项链的扣子，项链看起来很沉重，像一串镀金卫生纸。约翰尼斯在上面挂了一串精心打造的野猪獠牙，试图戳到内克的耳朵。老人调整着手臂上的蛇形金手镯，心不在焉地四处寻找着他的长矛。

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当成另一个道具，跳到目瞪口呆的村民围成的圈子里，开始他的长篇大论，不时地用长矛戳我，以说明问题。约翰尼斯把一只手放在我的

肩膀上，以示安慰，似乎不确定是该为他年迈的亲戚感到自豪还是羞耻。

托拉查的仪式看起来完全不平衡，更多地强调死亡而不是生命。

“他在解释你是谁，你是一位著名的荷兰游客，你来这里是为了向我们和古老的习俗表示敬意。”内内克的声音会时不时地提高，然后稳定下来，这种节奏，即使局外人也能看出来，是诗歌的标志。“那是对大祭司说的，”约翰尼斯低声说，“古老的语言。我无法翻译它，但是——哇，听起来很美！”

终于结束了，内内克在空地中央的一块岩石上安顿下来，指指点点，用压倒众人的气势训斥着，脾气暴躁地把长矛抱在怀里。

进入坟墓需要一边攀爬带缺口的竹竿，一边将尸体用人力推入狭窄的墓穴中，竹竿距地面约六七十英尺。巴士上的几个水手负责这件事，他们像老朋友一样欢迎我。我想爬上去吗？不？那么也许我想吃那里的水牛。水手们，作为基督徒，本不应该吃在坟墓里献祭的水牛，但是……

我们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用餐。“没有米饭，”他们解释说，“因为有人死了。我们只吃木薯和水牛。”水牛身体结实，肌肉发达，有厚厚的脂肪和皮。每块水牛肉看起来都像煮熟的蛞蝓。太阳高高升起，热得让人不舒服。宜人的木柴烟味、水牛脂肪的气味和温暖的人性笼罩着坟墓，苍蝇享用着血液大餐，发出令人昏昏欲睡的嗡嗡声。约翰尼斯被派去拖一具准备放进坟墓的尸体，他站在阳光下，咧嘴笑着，不时拂去他浓密黑发上的热汗。

内内克又开始大喊大叫，一个人在墓室口探着头，放下一根绳索准备绑在尸体上。整个场面看起来甚至有一些享受。布包裹着尸体，绳子挂上面。整个过程充满闹剧，非常有喜剧效果。当尸体被拖到空中时，约翰尼斯像驯马牛仔一样跨上去，发出一连串的呐喊声，其他年轻人也跟着这么喊，直到内内克因愤怒和奋力抗议而浑身颤抖。

一群人在下面围成一个圈子，开始缓慢地吟唱起死亡颂歌，人们毫无表情地将双手牵在一起，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孩子们被召唤加入进来，父亲和兄弟轻轻地引导他们的脚步，让他们融入这一古老的节奏。内内克给了一个信号，之后女人们也加入圈子里，男人和女人用歌声相互呼唤——这是一首死亡之歌，但在歌声中，女士们不失时机地展示了她们优美的轮廓和闪亮的牙齿。内内克赞许地点点头，他的手随着节拍而挥动。这里看起来实在不像一个因宗教变革而分裂的社会。

其中一名水手建议我与节日的组织者见面，这样显得比较有礼貌。我被带到一群环锅而立的人中间，大锅正冒着热气。

“这是头儿。”他边说边拍了一个男人的肩膀。男人转过身。原来是希特勒。

“啊，”希特勒说，“我已经认识这位先生了。”

我迅速开始想各种借口和解释，但似乎没有必要。事实上，他开始向我道歉。

“关于那个物件，有些困难，”他低声说，“已经不在我手里了。它被警察没收了。但我希望很快能再得到一个，然后我再联系你。”

我向他保证我会屏息以待，然后回到座位上，紧张得大汗淋漓。

一位相当粗壮的女士似乎值得特别注意，尽管酷热难当，她还是穿着厚厚的毛皮大衣，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和我招手。

“那是谁？”我问水手们。他们咯咯地笑。

“那是‘荷兰阿姨’。她住在莱顿，为了这个庆典特地回来。她穿起狗毛外套，以表明她已变得多么富有。”

她注意到我们在谈论她，便停下来，走过来加入我们，用荷兰语问候我。

“对不起，”我用印尼语回答，“我不是荷兰人，而是英国人。”

“没关系！”她回答道，“你和我一样是西方人。你知道，我现在生活在那里。看我变得多么苍白。我在托拉查很受折磨——炎热、尘土。在荷兰，我们乘出租车到处走。”

约翰尼斯出现在她身后，不愿意听她装腔作势。“啊。我记得你。你曾经在集市附近经营一个面摊。”他清了清嗓子，吐了口唾沫。

如果眼神能杀人，约翰尼斯早就当场倒下了。“荷兰阿姨”把她的皮大衣裹在汗湿的肩膀上，扬长而去。她穿着不适合松散石头路面的高跟鞋，越过肩膀挥手，勉强带着病态的微笑掩盖她的离开，真是难堪。前一刻，她还在那里，成为一个可怜的做作的焦点，不知何故让我感到羞愧。接着，她走了——从悬崖边缘跳到下面的舞

者身上。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后来有人看到她坐在树下，一个孩子用香蕉叶给她扇风，她一直穿着皮大衣，还问孩子各种东西的名字，因为正如她不断解释的那样，她说了很多的荷兰语，几乎忘记了托拉查语。

这一天，有相当多的遗体被包裹起来，重新安置在各自的坟墓里。第二天，内内克会杀死一只鸡，并宣布节日结束，人们就可以回到继续种植庄稼和建造房屋的生活中去了。现在天快黑了，是时候回村子了。

“荷兰阿姨”召集了她的家人，朝着一个方向走去。我、内内克、约翰尼斯和一群邻居朝另一个方向出发。一个年轻人牵着他儿子的手，用说得极文雅的印尼语邀请我去附近不远的他家做客。这是一座精美而古老的建筑，雕刻得富丽堂皇，装饰有当地的风格。

“看，”他带着明显的自豪感说道，“这就是我的房子。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些是我的土地。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祖父就在开垦这些土地。现在我把它们分成几块，轮流耕种。”

内内克很烦躁。他想赶在天黑之前回到他在村子里的家，但那个自称安达鲁斯的人态度温和，坚持希望他留下。

这所传统的房子，跟我参观过的所有其他房子一样，与现代世界达成了妥协。一个骇人的巨大手提式收录机放在一个角落里，旁边是一个丑陋的餐具柜，上面刻着传统的托拉查图案，但涂上了光泽漆。但这仍然是一座古老的房子，保留着古老的慷慨大方。安达鲁斯指了指窗外：“我妈妈一直要求我安装一个现代化的浴室，用水泥填充房子的底部，但我告诉她她在溪流中洗澡更好，我们必须尊重一所老房子。否则它就会像一个穿着酒吧女郎衣服的老妇人。”

看我变得多么苍白。我在托拉查很受折磨——炎热、尘土。

我们喝了咖啡，吃了特制的棕榈糖蛋糕——这是象征托拉查人热情好客的食物。父子俩都穿着黑色的纱笼，而不是现在常见的短裤。我很高兴能认识这样一个人，他拒绝了现代世界的大部分最恶劣的事物。这是一个聪明而有魅力的人，他满足于留在这个偏远的村庄，耕种他的花园。这是我对他看法，不一定是他自己以为的。

“你在哪里学的这么棒的印尼语？”我问他，“你是老师吗？”

他咧嘴一笑，随意地换成了地道的美国口音。他谈道：“当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卫星通信硕士学位时，我想我学到的东西最多。在我学会英语之前，我不得不用自己的母语学习大量强化课程。”他露齿而笑，慈爱地戳戳他的儿子，说道：“这个孩子的母语是英语和印尼语，但我们来到这里后，他无法和他的祖母说话。他感觉很无聊。在加里曼丹，我工作的地方，有游泳池和录像机。他现在很想念那些东西。我们只是为了节日而回来——重新包裹我已逝父亲的尸体。他认为这给尸体带来了很多打扰。”

我的失望一定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人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即利用世界其他地方来思考自己的问题。安达鲁斯并不是指出西方世界的不足之处的“高尚的野蛮人”。他比我更像一个现代人——精通计算机和电子学术语，价值观可能和我差不多，对传统世界的依恋和我这个局外人是一样的。他在加里曼丹舒适的空调平房里看到的，可能只是一种浪漫主义。他以一种无情的自我意识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你看，出国后我才学会珍惜传统——如果我一直待在我的村子里，我会认为美国是天国。所以现在我回来参加节日。多年来，我们一直走出山区讨生活，但我们总是在节日里回老家花钱。这个人，”他指了指儿子，“不一样。他对传统生活方式知之甚少。他在国外长大。他不是托拉查人，而是现代印尼人。”

这个现代印尼人平静地注视着我们，抓挠着被蚊子咬过的地方。

天色越来越暗，我们向村庄走去。脚下细小的尘土踩起来像热带海滩的沙子一样柔软。内内克大步走着，约翰尼斯和我很难跟上。在一个可以俯瞰峡谷的拐角处，站着一个裹着蓝色毯子的男人，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但留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茂密胡须。他高兴地笑了笑，握着我的手。我不太清楚如何表达友好，表示很欣赏他看管的这头水牛。我基于的原则是，如果你和一个人的狗成为朋友，你就是在和主人交朋友。

“这，”他宣称，“就是我花时间照顾我的水牛的方式。”

“你有很多水牛吗？”

“只有一头。”

“怎么可能花一整天的时间只为照顾一头水牛？”

内内克开心地大笑起来，并以一种我很快就熟悉的手势——握着的手指着我（一种礼貌的指别人的方式），无法抑制地笑了起来。

“这与数量无关。就像一个头发很多的年轻人，他哪怕只是用手揉搓一下，头型看起来就不错。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头发越来越少，所以他打理头发的时间越来越长。照顾水牛也是一样的道理。”

水牛男也笑了。事实上，当然，像大多数托拉查人一样，他和内内克都有着浓密得夸张的头发。

“如果我有更多的水牛，”男人说，“我就会成为王猫。”

“什么是王猫？”

“这是一种特殊的猫，它待在家里，从不离开家。它从不接触地面。它会害怕。”

“它长什么样子？”

“它看起来和其他猫一样，只是它从不离开房子——除非主人把它带到谷仓去捕杀老鼠。”

在到达桥之前，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生物。像许多托拉查桥一样，这座桥也有顶棚和许多座位。下雨天，桥是闲聊的理想场所。我从水牛男那里了解到，王猫是用来保护传家宝的，这些传家宝被存放在贵族房屋的椽子上和房屋对面的谷仓中。王猫应该只与被主人带到家里的其他王猫交配。托拉查人再一次通过动物谈论他们的阶级制度。拥有传家宝和受限制交配权的猫，成为贵族家庭的典范。

我们分别回到各自的房子里，但这相对较短的一段路，还是被雨水淋透了。我们浑身湿透，瑟瑟发抖。我的行李中藏着一瓶亚当王威士忌，是时候打开它了。“威士忌”是一个错用的礼貌表达或是一个极端讽刺的名字，瓶内是焦糖色的米酒。内内克疑惑地看着它。

“喝了对防感冒有好处，”我解释说，“就像吃药一样。”

“药？”他专注于这个词。很快他就感激地啜了一口，不过是用从厨房端来的茶匙。约翰尼斯的父亲走进来，咳嗽着，向瓶子投去充满期待的眼神，正要尝一些。这时他的妻子出现，在门口愤愤地看着他。他垂头丧气地把杯子放回桌子。

“我不喝烈酒。”他犹豫地说。

“这酒，”内内克说，“正让我变得强壮。明天来我家聊聊吧。约翰尼斯会带你来的。”

“什么时间？”

他可怜兮兮地看着我。“我没有钟表。直接来吧。”

他收起他的道具，俯身在阳台上，用恰到好处的压力推动鼻孔里的黏液。他穿着塑料凉鞋，拖着脚步，停在门口，转过身来，坏坏地咧嘴一笑。

“那药，”他彬彬有礼地说，“我能把剩下的带走吗？”他拖着脚走进了黄昏。

现在是提出微妙问题最适当的时机了。

“‘浇水’的地方在哪里？”我问道。约翰尼斯含糊地做了个手势。

“我们在下面的香蕉树那边小便。至于洗漱，在这里有点困难。你必须出去站在其中一条溪流中。”

“你在哪里洗？”

“桥附近有一个地方。太冷了，现在没法去。”

“你能告诉我是在哪里吗？”

他善意地嘟囔着，但最后还是叹了口气。“我跟你一起去，你需要穿纱笼。我从酒店偷了小包装肥皂。”

安达鲁斯并不是指出西方世界的不足之处的“高尚的野蛮人”。他比我更像一个现代人。

托拉查的浴室绝妙无比。这是简单的岩石围墙，新鲜的山泉水通过竹管涌入其中。一根棍子固定在围墙入口处，棍子上披上纱笼以保护隐私。该淋浴系统适用于大约五英尺高的人。对于任何超过这个高度的人来说，一切都将一览无余。但现在正好天黑了，根本不是问题。约翰尼斯把一块肥皂按在我手里。我们轮流站在雷鸣般的瀑布下。他说的是对的。太冷了，但很清爽。然而，我们俩的肥皂似乎有同样的问题。它顽固地拒绝起泡，水质一定很硬。等我们回到屋里，煤油灯亮了，才明白原因。他偷的不是肥皂，而是小块巧克力。我们已经把它涂满了全身。

早晨带着强烈的戏剧性降临这个村庄，过程近乎可笑。从公鸡开始，它们傲慢地

昂首阔步，向世界发出乏味的挑战，用爪子在波状铁皮屋顶上乱抓。狗也加入进来，然后是驴、马、猫、鸽子和孩子，大鸣大叫，发出一阵激烈的、包罗万象的喧闹声，把你从床上掀起来。然后是春米——杵在石臼上不间断地敲击，让整个房子都在颤抖，直到你感到恶心。最后加入的是卡带播放器，它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相同的六首流行歌曲，而不春米的人则会带着浓痰漱口，慢悠悠地擤鼻涕。

然后是一个漫长的阶段，人们在不同程度的身体痛苦中蹒跚而行，摸索着、渴望着第一支香烟，伴随着快要溺水的喘息和巨大的咳痰声，往自己身上泼冷水；或者满脸困惑地在屋子里游荡，到冷得抱作一团浑身颤抖时，就不断调整纱笼，从牙缝中吸气。

整个村子里的人们都痛苦地蜷缩在角落里讨论着寒冷。他们挤在火炉旁，火炉的余烬已经被点燃，惹恼了总是睡在那里的猫。寒冷之苦无止境，直到太阳终于穿透寒意，让村庄恢复生机。早晨的寒冷总是让这里每个人感到惊愕，而且从来没有人准备应对它。我在马萨买的毯子备受推崇，村里没有人费心为自己买一条，也没有人再织布了。早晨，人们常常讲到村子里曾有一座荷兰式的房子，并夸耀房里的炉子。天特别冷的时候，人们都会去那里躲着。但是，唉，一场山体滑坡已经把它摧毁了。

吃了一顿热腾腾的剩菜，喝过甜咖啡后，我们出发了。太阳已经升起，约翰尼斯确信，我们会发现内内克正在耕种他的水稻田，大腿上都是泥浆。我们闲逛了一会儿，爬上通往森林和高山的鹅卵石路。约翰尼斯指着一块从谷底垂直升起的岩石。

“那是，”他解释说，“提库先生的堡垒。”我知道他是托拉查领导人，1906年荷兰人进入该地区时，他曾经反抗过。经过长时间的围攻，他被击败了。

“他后来怎样了？”

“荷兰人把他带到兰特包并开枪打死了他。”他的脸上浮现出愤怒的表情，“如今他成了英雄，但巴鲁普人曾与他作战。他烧毁了村庄，每个人都逃到马基去寻求希望。正当我们准备返回并打败他时，荷兰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没有真正的老房子。”

我们继续前行，穿过一片雅致的竹林，竹子勾勒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美景。山丘间穿插着许多溪流，许多地方只能通过滑溜溜的绿色竹竿搭成的桥才能走过去。约翰尼斯很高兴能像帮助一个老人一样搀扶我过去。

我们来到了另一个小村庄，站在一个山顶上。我一直被托拉查村庄的整洁和秩序所震撼，他们甚至种了花，并和大多数英国人有相同的喜好——草坪。但这里打破了我的印象。这个村子不一样，一团糟。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猪可以自由走动，并随心所欲地觅食。它们把房子之间的空地搅成了一片泥潭。村民们衣衫褴褛，看起来黏糊糊的。孩子们跑来跑去，呜呜叫着，拿着一把糯米糊糊放到嘴边。每个人的鼻子下都有鼻涕的痕迹。看起来好像有人一直在收集证据，以反驳“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一观点。突然，从一间房子里走出来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他是建筑师班邦，但其实只是一个长相相似的人。他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衬衫、长裤和一双锃亮的皮鞋，戴着一只大金表，梳着优雅的发型，头发像用一把尺子分开一样。他用优雅的句法邀请我们进去。一具尸体躺在角落里，被包裹起来以备日后安葬。偶尔会有人站起来敲锣。

这个衣冠楚楚的人强烈地谴责了村民。他向我保证，他已经写信告诉总统这里村民们的落后，但奇怪的是没有收到回复。不过，总统是个大忙人。他曾向上帝祈祷，希望他们都被打倒，但上帝显然也很忙。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两个人遭受了打击。他带着同样的激情继续摇头，然后突然站起来，用高亢的尖叫声即兴布道。很难知道他援引的是什么宗教，因为托拉查基督徒也将上帝称为真主，可他口中的分明是一位剑神。他的口齿非常伶俐，令人印象深刻。

其他村民围坐一起，笑着窃窃私语。约翰尼斯得意地看着我。然后，我终于明白了。

“或许，这个人是一名教师？”我小声说。他们都笑着点点头。“他被自己的学识逼疯了？”他们咧嘴笑着又点了点头。那疯子继续说教着。他现在说的是闪电。

“他并不危险，”约翰尼斯解释说，“他的家人照顾他。但他这个人很无聊。”

“是的，我能看出来。”

“自从他们给他买了自行车后，生活变得轻松多了。”

“自行车？”

“是的，现在他不用向他们布道了，可以骑车到集市上向所有人布道。”

他们甚至种了花，并和大多数英国人有相同的喜好——草坪。

我们继续前行，向森林爬升。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里面有非常漂亮的传统房屋，是我见过的最高的。它们看起来很新，表现出一些不寻常的特征。其中一栋房子的窗户，按传统安装在墙上很高的位置，又按照现代风格被两幅裸体美人海报遮住。屋子上的雕刻更深，图案比我在山谷中看到的更大。远处有一个破旧的建筑，可以很容易被改造成一个温暖的家庭住所，但显然长期处于修缮状态。原本计划修建的游廊还处于初级阶段，木板没有固定，只是简单地铺在横梁上，会被粗心的访客踩翻。通往楼梯的木制扶手已经损坏并用绳子绑住。屋顶由木板条和波纹铁皮组成，搭建得并不协调，只是权宜之计。房梁上挂满了袋子和木工工具。这是一个建筑商的房子，一个忙于建设别人房子的人，以至于从来没有时间去打理自己的房子。内内克坐在那里，雕刻着一根大梁。他不仅是旧宗教的祭司，还是一名木雕师。

我示意约翰尼斯停下来一起观看。内内克全神贯注于他的工作。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和这所房子一样摇摇欲坠的眼镜。当刀在他手中划出光滑细腻的曲线时，他原本像木棍一样脆弱干燥的手变得结实了。一件有关内内克双手的奇事：多年来雕刻刀所带来的压力，使得他的大拇指展现出很长的圆弧。他的手以滑冰运动员般的优雅从黑色木桩表面上滑过，卷曲的木屑从他的手指间蜿蜒而出，精美的螺旋和环形组成的几何图案从背景中跃出。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治愈的时刻之一，一种平静的感觉笼罩着小村庄，一种平稳的宁静感。内内克倾身向前吐了口唾沫，我惊恐地发现，他的唾液是鲜红色的。他是不是得了重病，在这潮湿的山里有个垂死的结核病艺术家？然后我看到他的下巴在咬合，木桩旁边放着槟榔。他像许多老托拉查人一样，把苦味的槟榔和酸橙一起咀嚼，因此牙齿被红汁染成了红褐色。

这是在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发生的真实场景，令人遗憾。因为我有一种冲动，想与人分享这一刻，以铭记这种快乐。约翰尼斯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为什么其他人不应该看到这个？这将是一场精彩的展览。我可以带内内克去伦敦，这样他可以建造一座木雕房子或一个稻谷仓。展览不仅包括成品，而且包含整个建造过程。想法完成的那一刻，就被我否定了。想象一下签证、木材、资金方面的问题。也许内内克会生病。也许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一种将人变成表演动物的冲动。无论如何，这是永远做不到的。内内克抬起头，看到我们，咯咯地笑了起来。

这天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看他工作。他谈到了与在建房屋有关的图案，包括它们的名称和含义。那天他起得很早，早点结束玛聂聂庆典，以便恢复创作活动。他的手又能拿刀了，真好。但是，唉，明天他又得停下来了，因为那个疯老师所在村的遗体要处理了。死者信奉古老的宗教，所以内内克将全权负责。

我们正要离开小村庄时，一个男人招呼约翰尼斯过去，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低声交谈。最后，他转向我，咧嘴笑了。“Makan angin？”他问道——“吃风？”这个俗语的意思是没有任何固定目的去散步。“是的，”我接受这位田野工作者的空洞幽默，“Makan angin。”

约翰尼斯笑了。“不，”他说，“不是‘angin’——‘风’，是‘anjing’——‘狗’。我们运气好。村里有一只狗感染了狂犬病，被杀了，所以我们就吃它。今晚你不会觉得冷。吃了狗肉会很暖和！”

第二天的仪式和我在山谷中看到的相比，有点质朴和粗糙。尽管内内克掌管着全局，依然显得很有尊严，但大部分实际工作都是由一个戴着水手帽的人完成的。这一次，路上有了多余的肉——死猪和水牛。一场拍卖开始了，拍卖品以看起来相当高的价格出售。这里没有游客。我很高兴没有被归入这种讨人喜欢的类别。我是作为客人来到这里的，不是因为他们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东西。

“再次感谢你给我的药。”内内克说。药？啊，是的，那瓶威士忌。

“但不吃肉只喝药是不好的。也许你愿意为我买下那块他们正在卖的猪肉。”

我决定说一点讽刺的话。

“我听说有狗肉出售。也许你更喜欢吃那个呢。”

“不。吃狗肉让你在女人面前显得很‘强悍’。我老了，不合适吧。”我决定试着换个话题。

“你高寿啊，内内克？”

“过百了。”

“他七十多。”约翰尼斯说。他们互相瞪了对方一眼。

“我出生那会儿，我们不计算岁数。”内内克继续说道，“我出生在老鼠泛滥的那一年。一个老人是需要吃猪肉的。”

我叹了口气，给他买了猪肉。

让内内克去做展览的想法没有消失。但是我怎么才能让一个山里人理解这样一个陌生的概念呢？必须小心处理此事。我不想突然提出这个想法而惊吓到他。

“内内克，假设我想在伦敦建造一个有雕刻的稻谷仓，你可以做到吗？”

“当然。如果你喜欢，我愿意去建造它。我们今天就出发吗？如果你想要一个竹屋顶，我需要三个帮手，约尼斯、坦杜克，还有一个特别的人。我可以给你一份清单，列出所有需要的木材。我们不会讨价还价。一头真正的顶级水牛是我的收费标准。不过，你必须给其他三人一些东西。我们在英格兰也需要一些‘苦力’。”

“苦力？”

“是的，帮我们搬东西。”

“去一个陌生的国家，你一点都不担心吗？”

“为什么要担心？当有工作要做时，雕刻师们习惯于离开他们的村庄去工作。不管怎样，”他握紧我的手，“我知道，如果遇见敌人，你会照顾并保护我们。”

“做计划需要很多时间，内内克。我不能先答应你。我必须先说服英国人，然后再说服印尼人让我们这样做。这将非常困难。”

“英国有木头吗？”

“那里的木头不合适。我们将不得不把木头从印尼带过去。”

“那没问题。我们可以选择木材。在英国有槟榔吃吗？”

“没有槟榔。”

“那可能是个问题。没关系。你和我一起工作。以前他们想要在雅加达展览一座托拉查房屋时，就从克苏带走了一个人。这个人从未停止吹嘘这件事。这会让他闭嘴的。”他凝视着远方，眼中闪烁着幻想的光芒。不知为何，我想到的是给会计办公室寄一份顶级水牛的账单。



奈吉尔·巴利

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前大英博物馆民族志学组附属人类博物馆馆长。1947年生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金斯敦。著有《天真的人类学家》等书。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1937)剧照

非虚构

看得见的家务， 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

杰玛·哈特莉 | 新书试读

一部当代关系启示录，
从零开始的情绪劳动学习手册。

家里牙膏、卫生纸快用完了，阳台的衣服早就干了，只有你注意到；开会时负责倒水，洽谈时微笑迎合，是你的责任；当你终于忍无可忍，发火时还要纠结会不会惹人不快……

这些天生就是女性的事吗？为什么女性做这些就是“应该”，男性做却是“帮忙”？为什么女性要一遍又一遍提醒，家里冰箱冷冻室的霜还是厚厚一层，职场上仍旧得轻声细语保持耐心，还有人嫌我们唠叨？这些劳心费神的情绪劳动不但无处不在、没完没了，而且不被看见、无法转移。

《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揭示了传统社会规训下失衡的情绪劳动真相，这些情绪劳动限制了女性的机会，偷走了女性的时间，降低了女性的生活质量，也阻碍了男性对家庭生活的深度参与，和试图理解女性的心意。我们每个人，都是传统性别分工下的受害者。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第三章《谁在乎》，分享给读者。



“我来吧。”罗伯接手洗衣任务后不久，我就看到他连叠女儿的床罩都花了老半天，还是弄不好。他听我说“我来吧”已经无数次，连我没有明说出来时，也常用“你做错了”的眼神暗示他让我来。我家的情绪劳动分工之所以有那么深的分歧，我无法假装我不是帮凶。我希望事情以某种方式完成，只要完成的方式稍微偏离我的想法，我就很容易干脆自己揽过来做。如果碗盘放进洗碗机的方式不对，我不是示范给对方看，而是把这件事情抓回来自己做。如果叠衣服的方式不对，我会干脆自己来。偶尔我会跟朋友抱怨，说我们的伴侣似乎刻意以错误的方式做事，这样就不必承担更多的家务了。

虽然我觉得罗伯不是那种人，但是对一些女性来说，现实状况的确如此。2011年，英国有一项调查发现，30% 的男性会故意把家务搞砸，以免将来又被要求做同样的家务。他们认为，伴侣在失望之余，会觉得自己做比收拾伴侣马虎完成的残局来得简单。他们料想得没错，多达 25% 的受访男性表示，他们不再被要求帮忙做家务，64% 表示他们只偶尔被要求帮忙（亦即逼不得已的时候）。

即使男人不是刻意马虎以摆脱家务，他们的草率“帮忙”还是令人失望。英国森斯伯利连锁超市（Sainsbury's）做过类似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平均每周要花整整三个小时，重做她们交派给伴侣的家务。而男性做不好的事项几乎涵盖了所有家务，包括洗碗、铺床、洗衣、吸尘、整理沙发垫、擦洗料理台，等等。2/3 的受访女性认为伴侣已经尽力了，这也难怪有半数以上的女性不会费心去“唠叨”伴侣，要求他们改进，她们只会跟在伴侣后面收拾残局。

社会学家把女性执着于严格的标准，称为“固守母职”（maternal gatekeeping），我们一般称之为“完美主义”。我们积极阻止男人成为充分投入家务的伴侣，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更快、更有效率。由于家人（尤其是孩子）以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我们来把控，我们因此相信我们的做法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不太愿意调整个人的预期，尤其是因为我们在维护家庭系统方面已经投入了太多的心力。我们仔细思考过怎样做最能让每个人感到舒适和快乐，所以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这套最深思熟虑的方案，亦即我们的方案。

而且文化也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努力追求完美的女人，就是不称职的女人。这些文化规训又加深了上述观念。我们未能以最好的方式完成情绪劳动时，往往会觉得自己的确让家人失望了，愧对所有的女性，心里充满内疚。但这种完美主义可能令人筋疲力尽，甚至阻止那些愿意帮忙的男性尝试家务。我们担心自己出远门时，男人搞不定家里，还会特地留下一本家务指南，巨细靡遗地列出他们该如何照顾孩子。杜芙在书中写道，她曾为丈夫列了一份名叫“与科菲（Kofi）同游的十个秘诀”清单，其中包括提醒他喂饱孩子。我曾为罗伯留下冷冻餐点及详细的加热方式，以便我出差时他可以不挨饿，而且不用去超市随便乱逛，花两百美元买只够吃两天的食物。但我从未想过和他一起烹饪，让他以后可以自己烹煮。不仅社会促成了我的精神负担，我的“固守母职”特质也加重了那个精神重担。我不容许错误发生，所以也没有进步的余地；但是话又说回来，放任错误发生，我自己又会失望。

牙医曾经提醒过，拔除智齿可能会让我几天无法工作，但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提前做好准备，而是觉得罗伯会接手处理我无法做的事情。自从三个月前我在《时尚芭莎》发表那篇文章以来，他慢慢地接手了一些情绪劳动，他似乎已经准备好承接他被裁员以前由我负责的全天家务了。手术结束当天，我很快就感觉好多了。我吃了止痛药以后已经可以到处走动，肿胀也很轻微，整晚我都在和罗伯讨论翌日的计划。我陪儿子做了功课，但还有一页需要在明天早上完成，我们让他带 Game Boy 游戏机去参加班上的“电玩日”。女儿需要在早上八点半抵达托儿所，但她的需求很简单，只要帮她穿好衣服，梳好头发，装满水壶就好了。万一早上乱成一团的话，儿子还有温热的午餐可以吃。我鼓励罗伯为他带午餐，但也提醒他要记得帮儿子打包一份零食。自从罗伯丢掉工作以来，他已经帮忙处理早上的例行公事好几周了，我以为这次他一个人就能搞定一切，虽然我们都觉得他可能不需要孤军奋战，毕竟我的状况很好。

我本来确实很好，但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我哭着醒来，疯狂地寻找止痛药。我的左脸肿得跟棒球一样大，并在极度痛苦中醒了好几个小时。等天终于亮了，情况更糟，我整个人几乎动弹不得。早上八点半，罗伯叫醒我，说他要带女儿和最小的那个一起去学校，六岁的儿子则必须在半小时内步行上学。我在手机上设定闹钟，

以免昏睡过去。儿子进房来跟我聊天，我问他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包括午餐、衣服、作业。他说对，于是我放心地躺了下来。我几乎无法下床送他去上学，想到罗伯没有像我以前那样一次带三个孩子一起出过门，我就恼火。我穿上鞋子和外套时，脸持续抽搐，接着我也要求儿子穿上鞋子和外套。出门时，我才意识到儿子撒了谎：他的作业还没做完，也没有检查；午餐没带，零食和水壶也没装；要带去学校的游戏机也不见踪影。

我们未能以最好的方式完成情绪劳动时，往往会觉得自己的让家人失望了，愧对所有的女性，心里充满内疚。

现在我不仅为他还没准备好而感到内疚，他还得承担没人帮他的后果。下课时间，他必须留在教室里写作业，他也无法跟同学一起享受玩三十分钟电玩的乐趣。我随手抓了一颗橘子放进他的背包当零食，但其他东西已经来不及弥补了。尽管那天是罗伯负责早上的例行公事，到最后却是我措手不及的早晨而内疚。我觉得我应该事先为罗伯做更好的准备，应该把整套系统设计得更好。如果让罗伯接手家务意味着孩子的需求无法顾及，让他接手就失去了意义。我需要设计更好的选项，而那个更好的选项似乎是照着我的方式做。

当天稍晚我向罗伯提起早上发生的状况时，他也很内疚，但和我不一样，他坦承确实有问题，也道了歉，但之后就翻篇了，没放在心上。他不像我那样为自己没尽力而自责不已。对我来说，育儿上的失职是一种道德失败，但他不会那样想。父亲在育儿上搞砸时，大家会安慰他们“至少你尝试了”，但若是换成母亲，她只会受到白眼及批判。那天早上发生的一切依然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达到我该为自己设定的母职标准：完美。

即使我失去了做事的能力，大家依然期待我掌控全局，因为那不正是母亲该做的事吗？没有人要求罗伯把早上的例行公事固定化，他是父亲，不受批判。尽管他现在是全职奶爸（至少暂时如此），那依然不是他的主要任务或责任，而是我的，一如既往。我试着把丈夫当成平等的伴侣，试图放开掌控，或调整我的预期，或妥协我的标准，但我们一再失败，始终达不到那个难以捉摸的平衡。更令人沮丧的是，我是唯一为此感到难过的人，这件事只有我在乎。

我那篇有关情绪劳动的文章在《时尚芭莎》刊出当天，我跟朋友一起出去小酌一番。我们一见面就聊得起劲，她没有要求我解释任何概念或澄清任何观点。这个问题她早就很熟悉了，只是之前没有一个确切的名称。后续几周，跟我聊起同样话题的女人也是如此。花了一天的时间战战兢兢地跟罗伯厘清“情绪劳动”的问题后，现在可以跟了解情绪劳动的人，一个跟我一样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放松地闲聊，那感觉真好。

朋友告诉我，她把一些需要拿到楼上的床上用品和其他东西放在楼梯最下层。那些床上用品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蓝色储物箱，她很难自己把它们收进橱柜，但是对丈夫来说很容易。而且，那些床上用品堆在楼梯的最下层也难以被忽视，你需要直接跨到第二阶或是把它们推到最旁边，才有可能走上楼梯。但她的丈夫就是那样，对眼前明显的任务视而不见。他对床上用品的无视不是刻意摆烂，而是纯粹觉得事不关己，认为那根本不是问题。他心想，如果那是问题的话，老婆会直接开口叫他拿上去，不是吗？注意到那堆东西又不是他的责任，注意到家里该做什么事情是老婆的责任。于是，我的朋友决定闷不吭声地自己把东西拿上楼，然后当着他的面把东西收好（显然我们是同一类型的）。她的丈夫为了这个他无法完全理解的问题跟她道了歉，她则出来跟我喝酒，好讲给一个了解问题所在的人听。

我跟一些朋友聊“情绪劳动”的次数已经多到数不清，而且早在我写那篇文章之前，那就是我们经常聊的话题。女人之间常聊起我们做的情绪劳动，因为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东西，都以类似的方式关心这件事，都知道情绪劳动有多辛苦。情绪劳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似乎已经根深蒂固，即使我们已经达到临界点，还是无法摆脱那些劳动的束缚。一位女性在受不了情绪劳动后告诉她的伴侣，他们若要继续在一起，唯一的方式是请他去看心理医生。结果，他还叫她帮忙找心理医生及预约。她说：“我们简直是鸡同鸭讲，他永远无法理解我的意思。”

这也难怪女人会找女人诉说，而不是对伴侣说个明白。我们谈到我们做的一切事情，如情绪劳动、亲属任务、家务劳动、各种杂事等，因为我们知道，其他女性不仅心领神会，也感同身受，而男性和整个文化则是仿如鸭子听雷。我们日复一日做着太

多幕后工作，我们深知吃力不讨好，也没有人看见。女性互相分享故事，只跟女性朋友说，不跟伴侣说，因为只有同道中人才能够理解。女性之间的交流让我们觉得自己的付出终于有人看见，不再隐于无形。虽然那种交流无法改变我们和伴侣之间的关系，但至少回到家时，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然而，尽管背后的辛酸获得女性共情时令人欣慰，当我们的情绪劳动在家里没人注意也没人感激时，那种失落感依然得不到疏解。精神负荷仍有待我们承担，劳务仍必须由我们来分派，而且我们在言行上还必须小心翼翼，以免显露出失望，所以何不干脆跟伴侣讲清楚，而不是在背后说呢？其实，说比做容易。多数女性都曾在感情或婚姻关系的某个节点谈过情绪劳动，但聊到最后总是变成争执。我们说的话仿佛是对牛弹琴，或是令对方感到刺耳。谈论情绪劳动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劳动。

我试图向丈夫解释情绪劳动时，他觉得我好像在说：“你根本不在乎。”他认为我没有肯定他的付出，但他的反应忽略了我为生活广泛投入的情绪劳动。女人通常不会直指问题核心，这也是为什么我谈起情绪劳动时总像鬼打墙，一再地反复循环。我试着跟罗伯聊，但我们的看法不一。说到最后，关于情绪劳动的谈话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太沉重，我干脆去找能够理解的女人倾诉。女人可以一起发泄，彼此交流，互相支持，直到下次又达到极限时，我们再聚一次。多数时候，那种无人理解的挣扎发生在内心，表面上我看起来没什么异样，也许有点压力，但一切还好，这也是为什么女性负荷不了而终于爆炸时，会看上去那么突然。

其他女性不仅心领神会，也感同身受，而男性和整个文化则是仿如鸭子听雷。

《交往规则》(Rules of Engagement: Making Connections Last) 的作者弗洛斯娃·布克-德鲁博士(Dr. Froswa Booker-Drew)第一次受访时告诉我：“男人不知道我们女人之间的对话，所以他们觉得我们似乎没事。”我们谈到女性的智慧，以及女性彼此分享故事时如何减轻情绪劳动的负担。但如今我开始感到好奇，只跟女性谈是否也对我们有害。有一个空间可以倾诉故事，让人看见我们的无形劳动确实很重要，但是如果男人看不见、听不到、无法相互讲述这些故事，那什么也不会改变。

我们谈论她的个人生活时，她告诉我他们夫妻之间的看法是如何产生分歧的：她丈夫认为她可以自然而然地轻松完成所有的事情；但她经常觉得自己需要协助。他认为她总是可以想出各种办法，让事情顺利运作。在他看来，如果她需要协助，她会直说，他们会花钱找人来做，事情就解决了。然而，他眼中那种“搞定一切”的天赋，其实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他不明白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兼顾一切”的文化压力，他也不明白，改变这种体系非常耗费心神，更遑论我们自己产生的内疚感了。

“他的视角跟我不一样。”她说，“他出发点不坏，但就是不懂我是怎么想的。”

布克-德鲁博士谈到的，是她身为女性的亲身体验。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她的丈夫还有一些姊妹教他如何承担分内的工作，但他们夫妻面对家务的方式确实不同。他会做饭、打扫、帮忙，但是身为男性，会做这些事情使他变得与众不同。布克-德鲁博士无法经常做饭及打扫，这常让她觉得自己好像做得不够。我觉得这听起来很荒谬，因为她为了接受我的采访，特地腾出时间，在拉斯维加斯的旅馆房间展开这场对话。她原本要去参加一整天的社群研讨会，而且还感冒兼过敏。当她专注于重要的社群活动时，脑中应该不会想到那些家务，但是对家务的烦忧总是隐藏在表面之下。布克-德鲁博士的角色，和她身为妻子、母亲、女儿、黑人女性、南方女性、虔诚基督徒等密不可分。她说，她面对这个世界时，是上述身份一起出现，而且她承受着额外的文化压力，必须表现得完美无瑕。她回忆道，小时候大人告诉她，她必须比其他人优秀一百倍才行，因为她是黑人女性，她必须达到更高的标准。“你不只代表女性，还代表你的种族。”她说，“那太沉重了。”女性受制于文化的预期，必须兼顾好几个不同的角色，有色人种的女性更是如此。毕竟，那些角色是帮我们周遭的人过得舒服快乐的关键。

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我们无法只专注于其中一个身份。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或做什么事情，我们似乎都得兼顾每个角色。即便是现在，我坐在这里写作，我也在估算开车去餐厅和婆婆家一起庆祝生日的时间；想着哪些家务需要完成；为了我的写作工作不断地刷新电子邮箱，查看信件；试着说服自己只要再列出一份超长的待办清单，内心烦躁的声音就会安静下来，即使我明知道列清单是一项没完没了的工程，因为待办任务永远也列不完。

男性似乎没有这个问题，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确实没有这种烦恼。男性可能比较擅

长划分领域，因为他们的大脑先天构造不同。201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一项研究，科学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大脑连接模式有显著差异。平均而言，男性两个大脑半球内的连接能力比较强，女性则是两个大脑半球之间的连接能力比较强。女性大脑的广泛连接力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视情况而定。当我们凭记忆安排五口之家的行程表时，我们比较有优势。当我们需要抽离家务、专注于手边的工作时，心理和情绪负担的连接性可能会拖累我们。当我们试图向伴侣沟通心理负担和情绪劳动的重担时，那也可能构成很大的阻碍。社会对我们的制约以及我们的思考方式，导致男女有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因此看法很难一致。所以我们才会向女性朋友倾诉心声，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认识的女人了解我的想法，但跟我交往十三年的伴侣却无法明白。这也是为什么我向那些觉得自己已经达到平衡的女性请教时，我最常听到的回应是：你一定要放手。干净的房子、完美的母亲、换洗衣物、脑中清单、一切烦忧等都必须放手，别再执着。

《放手》的作者杜芙以整本书来描述她如何从一个控制狂（她说自己正从“家庭控制症”中康复）变成真正平等的伴侣。她在那本书的前言中写道，她意识到自己主动承接的负担与丈夫承接的并不对等时，开始心生怨恨。我还没读完前言，就马上理解了她的处境。

她自问：“我是他兼顾一切的解决方案，那我呢？我的方案又是什么？”

于是她开始改变，把一些责任和精神负担交给她的伴侣。她的故事吸引了我，但是当我得知“放手”对她意味着什么时，我又感到有些害怕。把控制权交给丈夫，似乎也意味着对一项做得极糟的任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提到她把邮件任务交给丈夫处理，结果邮件在桌上堆了三个月都没有人打开来看，于是停车费搁着没缴，生日邀请函没人回复，更别说那些邮件堆积如山有多碍眼了。杜芙获得一个工作机会后，她的丈夫主动提议接手做饭的工作，结果他整整一个月都煮同一道炖菜给全家吃。这不是她做饭的方式，但至少很有效率，也有效果。她说，她觉得自己可以放弃先前设定的高标准，因为她很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杜芙说：“打破标准很重要。女性的标准要么是最好的方法，要么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个观点我并不认同。”我不得不承认，我实在很难接受她的建议。她告诉我，他们后来在炖菜上达成一些妥协（如今他已经增添了一些花样，每周会更换菜品），但他们并没有为了精进他的做法来来回回讨价还价多次，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因为她们把那些斤斤计较细节的时间拿来做的事情，远比确定一切都照“她的”方式完成更加重要。

把控制权交给丈夫，似乎也意味着对一项做得极糟的任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显然，彻底放手对她来说很有效。她改变了事情的轻重缓急，放下不太重要的事情，以及随之产生的内疚感。她甚至告诉我，女儿最近错过了一场生日派对，因为她没有更新行程表（那项任务现在由丈夫负责）。由于多数家长不会把邀请函寄给父亲，这种错过生日派对的情况并不罕见，结果她的女儿为此哭得稀里哗啦，因为所有同学都去参加派对了，只有她缺席。对二年级的小学生来说，那是一大打击。杜芙知道她其实有能力避免这类事情发生及其他失约的状况，但她没有因此改变做法。她没有把之前放手的事情又捡回来，也没有为这件事情感到内疚。反之，她带女儿出去吃了粉红糖霜的甜甜圈，因为她知道下次仍有参加派对的机会。她知道错过一次派对，或是她为了实现最大的目标而决定放手的事情，都不会影响她身为母亲的价值。“我不做很多事情，我觉得不做那些事情也没关系。”我很羡慕她的自由，虽然我可能并不那么羡慕她获得自由的方法。

我向罗伯转述杜芙家的故事时，我说：“如果换作我，我会内疚死。”

罗伯纠正我的说法：“你应该会杀了我。”

但杜芙确实抓到了诀窍。我阅读她的著作、聆听她的说法时，可以感觉到她掌握了解决之道。令我讶异的是，事情没有照她的方式完成时，她听起来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能感觉到很高兴，很满足。放弃一些精神负担，让她因此获得比追求完美生活更宝贵的东西。她现在有更多的余力了，做起事来更加专注，她也可以用更好的方式陪伴家人。她认真检讨了自己的生活，重新评估了自己真正在乎什么。她把剩下的情绪劳动都交给丈夫承担，不仅放弃了掌控权，也不再坚持她交给丈夫的任务必须做得完美。她不是每晚都能吃到美味均衡的晚餐，但究竟哪种人生比较有价值，即使读者不是行家也能轻易看出来。

后来我采访《放胆休息》(Daring to Rest)的作者凯伦·布罗迪(Karen

Brody)，她也提到类似的故事。完全收手不管家务两年，她放弃了所有的情绪劳动。她不寄圣诞卡，连儿子长得太快、衣服太小时，她也不帮儿子买衣服。她只管自己的时间表，不操心别人的。她的儿子冬天去祖母家度假时，可能只带了短裤。他们每天晚上九点才吃晚餐，因为她丈夫九点才煮好。她专心写书，卸下身为家中“领航者”的主要压力。在她看来，这样做完全值得。她告诉我这些事情时，我可以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她的热情。然而我还是无法想象放弃情绪劳动之后，如何平静地看待一切分崩离析。杜芙和布罗迪把注意力和心力大胆地转移到她们向往的目标上，她们的故事确实鼓舞人心，但也令我不安。我不想拖欠账单不缴，不想看到烘衣机里堆满衣服。对我来说，身处那种状态下又是何必。如果伴侣随便完成他负责的工作，哪有什么平衡可言？我们大可说每个人的“方法不同”，但是难道没有一种方法是既可以用来维持合理的标准，同时也可以分工吗？

放手确实可行，但我忍不住想到，这些女性不是依然负着妥协的责任吗？她们不是还得忍受事情未完成的不适感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伴侣更关注某些事情，好让我们把一些注意力转移到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要求伴侣灵活应变，以满足我们的需求，让我们放心，使我们感到舒适快乐呢？

即使听了杜芙和布罗迪的睿智建议，我依然只有三种选择，而且没有一种是理想的：自己做；当个唠叨的老妈子；放手。最后一种选择理当是我从炼狱里解脱出来的门票，但感觉那不过是从一种炼狱转往同类型的怨恨炼狱罢了。在很多情况下，放手看起来完全不切实际。我有两岁、四岁、六岁的孩子需要照顾。某些事情，你确实可以抱持“人各为己”的心态，但是在某个节点，你手上抛接的一些球是由不得你任意放下的。

“有人说过你是控制狂吗？”这是《时尚芭莎》那篇文章发表后，我上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节目《时事》(The Current)受访时，主持人皮雅·恰托帕迪耶(Piya Chattopadhyay)上来就问我的问题。

“一定有。”我皮笑肉不笑地回应，不安地在座位上挪动身子。那个问题简直是了我的死穴，马上就暴露了我的真实身份：我不是对“情绪劳动失衡”的根源感兴趣的记者，而是一个难伺候的女人，不公平地要求一切都是按照我的方式来做。

她接着说了一句我已经听腻的老生常谈：女人就是要求太高了。已经足够好的事情，我们觉得还不够好，凡事都要紧紧攥在手心。这种形容有很多种说法，但归结成一句就是：我们是自作自受，只能怪自己。我们变成吹毛求疵的老妈子，因为我们的标准太高，要求男人符合我们不合理的预期是不公平的。我们只要放宽标准，情绪劳动就不会对我们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了。难道我所有的情绪劳动都是因为我对另一半要求太多吗？难道我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创造出一个只有我自己能达到的标准吗？

舒尔特在著作《过劳人生》中提到她与社会学家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共进午餐时，对方傲慢地说，如果女性觉得自己受到家务的束缚，像是觉得必须以某种方式做饭、打扫、打理家务，她们只能怪自己。他责备那些厨房地板干净到足以当心脏手术室的女人后，嚣张地对她说：“女人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舒尔特在书中坦言：“他没见过我家黏答答的厨房地板。他似乎也不明白，当其他一切感觉快要崩塌的时候，至少维持家里的整洁多多少少可以帮你喘口气。”

我依然只有三种选择，而且没有一种是理想的：自己做；当个唠叨的老妈子；放手。

那些认为情绪劳动是因为你想要或需要掌控一切的人，完全抓错了重点。他们的说法充满了性别歧视，我们试图批评那种源自父权结构的痛苦，但他们永远觉得那是女性在咎由自取。那种相互指责、推卸责任的把戏，分散了我们寻找问题根源的注意力。问题的根源不是我们想要控制一切，问题出在我们如何看待情绪劳动上。女性之所以受够了，不是因为我们要求太多，而是因为大家叫我们不该要求任何事情，说我们应该放手，仿佛放手真的很容易，仿佛我们的任务可以轻易抛诸脑后。那个“控制狂”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棘手，唯一的原因在于完美主义确实往往会内化成一种性格。控制欲和追求完美的压力之间，往往很容易模糊界限，因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确实感受到一股文化压力，逼我们必须达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标准，于是维持掌控成了我们持续追求那种完美境界的唯一途径。但是当你剔除掉完美主义时，情绪劳动的失衡依然存在。那个“控制狂”的说法忽略了一个真正的问题：这个社会

根本不重视女性的劳务，大家觉得情绪劳动并不重要。

然而事实是，女性之所以维持一定程度的家中清洁，并不是因为一尘不染的地板是让女性获得救赎的方式（尽管文化压力依然存在，我们稍后会再回头讨论）。我们精心打造了一套适合我们的家庭系统，一套让每个人都健康快乐的系统，并确保它顺利运作。对有些女性来说，她们管理家庭的方式令她们自豪，对另一些女性来说，那套系统是为了生存而打造的极简工具，但无论如何，那都是一种关爱的表现，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身边的所有人。

那些认为我们应该干脆降低标准的人，不仅是在说我们不该那么在意，还在告诉我们他们觉得情绪劳动的重新平衡会对目前未承担这份工作的伴侣产生负面影响，换句话说，会导致他做更多的工作。为什么伴侣必须达到我们的标准？为什么他们应该在乎那些事情？乍一听这种质疑似乎有道理，但是当你把情绪因素也考虑进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应该在乎，是因为你爱的人在乎。身为伴侣，提出让每个人都满意的标准是你的义务，也是你乐意做的。当然，这其中还是有妥协的余地，但即使一个人觉得浴室发霉也无所谓，那不表示他就没有打扫浴室的责任。

我开始思考，要求罗伯达到我的清洁与整理标准，以及我不愿放弃我的标准，算不算一种控制狂。我越是深入思考，越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问题不在于我希望多久吸一次地板，而在于我投入生活的劳动是否有价值。情绪劳动跟掌控欲无关，它是一种关怀。其实那个问题真正要问的是，我是否愿意彻底改造我们夫妻认识以来我持续打造的那套系统，那套我精心设计，好让每个人都感到快乐舒适的系统，然后放弃那个念头，因为重新平衡家里的情绪劳动对罗伯实在要求太多了；我是否愿意再次为了夫妻和睦而放手或放弃什么？究竟什么比较重要：是他的舒适，还是我的舒适？问题到最后又变成了我的责任。

偶尔我会在洗衣服方面放手：我洗了一堆衣服，但其他任务使我忙得不可开交，于是我让那些衣服在烘衣机里堆了好几天。罗伯开心地从烘衣机里拿出他需要的几件，剩下的继续留在里面。但是当他没有干净的运动服可穿，或我儿子最爱的那条裤子没洗时，那就成了争论焦点。这是我的家庭系统通常不允许换洗衣服搁置不洗的原因，至少不能一天以上不洗。换洗的衣服洗好、折好、收好，对我和家人来说都比较轻松，因为那让大家可以放心地开始每一天，出门不必为了穿什么而担心。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每天洗一次衣服，或隔天洗一次深色和浅色的衣服似乎太频繁了，没有那个必要，感觉我那样做只是因为我想当一家之主而已。坚持那样做有那么重要吗？我为何不放松一下？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那样做，不仅会造成我的不便，也会造成家人的不便。那样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可以帮我以最少的摩擦来照顾家庭。我做的事情很少是为了掌控什么或追求整洁，很多是为了避免关系失和及家庭气氛紧绷。

认为“女性应该降低标准以避免冲突”的观点，掩盖了一个事实：我们做这些关怀型的劳务是有目的的。当然，我们确实可以做出妥协，但追根究底，我们其实已经认真思考过为什么要如此安排生活了。叫我们降低标准不是在帮我们的忙，而是在误解我们承担情绪劳动的初衷。

我们不想成为唠叨的老妈子，我们只是希望每件事情都能完成，那很难一人独自包办。正因为有些人觉得女人唠叨，那也是女性花很多心力思考要不要把任务交派出去（亦即所谓“求助”）的原因。多数女性其实一开始并不想开口求助，这是有些女性不想为交派任务伤神，干脆自己包揽一切家务的原因。我自己不止一次在这两种讨厌的选项之间摇摆不定。自己包揽一切就不必烦恼交派任务的事，但增加了自己的工作负担；把任务交派出去，还要付出情绪劳动去要求每个人做好分内工作。有些女人成功地选择了另类道路，例如完全摆脱情绪劳动，但是对我来说，那看起来从来不是一个持久之道。我不想放弃关心，我只是希望其他人也能关心。



杰玛·哈特莉

记者，作家。长期关注女性的情绪劳动话题，并在世界各地就情绪劳动的话题发表演讲。2017年因《女人不是唠叨——我们只是受够了》一文引爆网络，以惊人速度被疯狂转发百万余次。著有《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一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使不被看见的劳动得到身边伙伴和公共政策的重视和支持。目前与家人住在内华达州。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文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唐浩多海报

专栏

065 满宇 “我还是对人感兴趣”， 但，人是什么？

杨樱 | 接力访问

“一个人的社会”，
社会里的一个人。

唐浩多决定让满宇来接力。他有几个朋友表示这接力不太有意思——不管满宇还是个人的社会”，在艺术圈都被讨论好多次了，缺乏新鲜感。

确实，“一个人的社会”已经进行到第六年了。不过也正因如此，它展示了极为丰富的人个人经验。我知道“一个人的社会”时间很晚——2022年底，此时项目前两期（2017-2019年、2019-2021年）已经结束，第三期（2022-2024年）正在进行。且当时我只听了“精神分析”那个部分，并不知道这个项目涉足如此之广的议题，对个人的介入又如此之深。

要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一个人的社会”的出现，意味着满字工作方法的变革，也意味着他看待社会时视角的变化。就好像他自己说的，不再是通过个体经历去发掘某个社会议题，而是看到个体本身。这无论是在社会学界还是在当代艺术实践里，都是比较少见的做法。

另一方面，“一个人的社会”不仅仅停留在个人遭遇的陈述层面，而是以拉康派精神分析的工作方法切入，试图发现并理解个体遭遇和社会现实交织下每个人的症状。2019年，《艺术界 LEAP》在报道这个项目时给了一个清晰完整的描述：社会实践项目“一个人的社会”集中了十组艺术家围绕着特定对象展开的田野调查……在此期间，艺术家与各自的合作者进行长期的交流，构成了田野工作的第一现场；与此同时，面对交流中的症结，策展人和精神分析专家在“如何理解”以及“如何应对”两个层面为艺术家提供参考，帮助他们进入合作者的生命经验，并在此过程中疏解艺术家自身的疑惑，形成了项目的多重田野。



唐浩多展览

唐浩多作为第一期的参与者，把田野对象设定为自己的父亲。他把父亲从一个暴戾的角色扩展为一个具体的男人，从父亲扩展成一个小时候被过继收养、长大后错失读书机会的社会挣扎角色，从而进一步探讨他极为严重的家暴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施加影响。项目结束后，唐浩多尝试在他工作的中学开展针对家暴的“聊社”项目，也是这个探索的后续延伸实践。

满宇说，2017 年他和精神分析家一起开始做“一个人的社会”，谁都不知道具体会发生什么。为了确保项目会有结果，他第一批询问的艺术家要么是对精神分析有一些了解，要么就是和自己的田野对象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只不过还留存一些问题得不到回应。唐浩多是第一期里比较“冒险”的参与者，以至于中途数次 he 都接近崩溃。到了第二期及以后，经验积累，参与者越发多样，第三期艺术家只占据 1/3 比例，另外还增加了以“症状”为归类依据的小组。比如说，“非自愿单身”，是一群对自身的亲密关系十分困惑的人。

满宇出生于 1976 年，除了艺术家，他也是策展人、评论家、二楼出版机构发起与负责人之一。因为发起过很多当代艺术社会实践项目，艺术媒体和社会媒体都有诸多关注。他从 2013 年开始接触精神分析，最初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严重抑郁。他尝试自救，拜过佛教，试过禅宗，但只有精神分析“有用”。

“精神分析（对我自身）有非常具体的回应跟梳理。我现在想起来，不做这么长时间确实不行，前后七年的个人分析。后来我对精神分析越来越有兴趣了，它颠覆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就开始自己研究。上课、上讨论班、看书，和精神分析家的交流，也开始接待来访者。”

“一个人的社会”最早来自满宇和精神分析家徐雅珺、刘洋的讨论。在开始之前，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一系列讨论班、讲座分享。当时是 2015、2016 年，精神分析远不如现在流行。

而之所以把参与对象设定为艺术家，一方面来自满宇对这个人群的了解，“艺术家和精神分析家面对存在的问题几乎是一致的。艺术家尝试用各种方式去回应的问题，精神分析家也是，只不过是在分析室这样的一个实践场域。”另一方面，那些所谓的“个人精神现实”问题，并不是什么个人的，但也并非就是所谓社会的。

因此满宇提出了“自己为自己的无名者”这样的说法。当年北京唐家岭的“蚁族”是一个公共例子。“社会上有一些新的现象出现，但是我们对这些现象没有做调查，没有去看，没有去表达的时候，它就处在一个处在一个无名的状态。要到媒体介入、给予一种说法、



“精神分析与当代艺术实践”研讨班：
精神分析的左翼运动

这样的现象或者处境才会被人完整地认知。”

具体到个人，“自己不为自己所理解的感受、情绪或状态”。如果用更专业的说法，它就分为三种情况：在社会秩序中被遮蔽的人；没有言说经验，各种精神障碍的人，在个人与他者（秩序或他人）的遭遇中，被压抑而无法言说之症状；自己是自己的无名者，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个人的意识由于无法理解自身的欲望，在不断的对象（或日常情景的）迁移中，身不由己。

所有这些，都是对个体状况的注意。在此之前，“大家只专注于社会结构性问题。不是说这样不对，这是两回事，而是说，大家对于‘人的存在’这个问题的回应是非常边缘的”。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社会”牵涉到历史：个人的历史，家庭的历史，社会的历史。与此同时它折射出来更尖锐的当下，无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都可以感受到针尖在眼前晃动的胁迫感。

在满宇看来，这是因为在一个鼓励遗忘（“向前看”）的社会，许多人的创伤都缺乏出口。个人的创伤会折叠、压缩，社会的纹理因此变得复杂。

“1980年代末之后，我们所谓的价值观就一直在碎片化进程中，这个过程是非常剧烈的。之前还有想象——想象是非常具有社会共识性的——之后就变了，钱变成非常重要的锚点，但问题是，钱并不能许诺生命是有意义的，它是非常贫瘠的东西，钱更多能满足冲动但没法提供意义。”

“我们说的解体，就是秩序解体。家庭也是一样。大家都不在各自的位置，爸爸不在爸爸的位置，母亲不在母亲的位置，那么小孩会怎么样？就有非常多状况出来。现在有大量的、无法表达的、陷入到焦虑中的人。可能在某个方面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很糟糕。”

我摘录几份“一个人的社会”参与者自述如下：

梁广年 - 喻旭东

1976年毛泽东去世，梁伯因此住进了精神病院，那段记忆在他那里几乎全部消失了，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喻旭东从2012年起就开始跟他聊天、帮他写字、收拾那些字牌等等，并尝试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具有自我组织形态的微型社区。



李莉君 - 东启

这个项目非常特殊，李莉君是东启的母亲，但在他六岁的时候过世了。家里人担心东启，屏蔽了所有关于他母亲的信息，但恰恰因为这个回避，他母亲的死亡在东启那里成了一个没有被解释的事情。



韩振华 - 潘秋蓉

当我五岁时第一次听到外婆（姥姥）的故事，那是因为一个伟人发起的一场运动而家破人亡的故事。这么多年来，我会与外婆寒暄身体是否健康，是否按时吃饭，但从来不会谈论感受、欲望和痛苦无常。伴随项目中与外婆持续的对话，我终于开始理解外婆，也尝试理解自己。我看到了一个社会造成的一代人的精神创伤如何在代际间传承，外婆的症状如何幽灵般在我身上复现。我看到一个社会压抑了一代人，一个男人却仍然可以在家庭中欺压比他弱势的女人，而家族中的女人就像大地一样承受着一切，使家族绵延。我的私心是希望大地可以不仅仅是大地，大地也可以做回她们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保留记录的初衷：在景观社会中，个人的历史在哪里都没有记录，它因此是不可交流的，也是无法被理解的，它只能被遗忘。获益的只有那些关于不值得记忆之物的虚假景观记忆。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社会”也试图抵抗这样的现实。

到目前为止，“一个人的社会”参与者身份包括“村民、大学生、政府官员、警察、网红、流浪汉、大学老师、工人、白领、女权行动者、社会实践者等等”。这组混杂了不同标签的名单以脚注的形式在“一个人的社会”一份寻找赞助的PDF里出现。经济环境不佳，满宇还没有给第三期找到赞助。

项目开始之后，精神分析家参与艺术家隔周一次的会谈，而每期项目以“田野研究——内部田野分享会——基于田野调研的行动——展览——线上推文”的脉络进行。



你可以在“热带病艺术研究所”这个公众号过去的推文里（就文本本身而言，几乎可以当文学作品来看。现实确实高于艺术。）看到不同参与者的文本整理（字小可能是个问题，不过也许字小可以减少叙述本身带来的冲击）。有评论是这样说的：“艺术家忙于政治、美、社会行动主义……很少有人敢于谈论死亡，谈论人性的悲剧，以及这个我们称之为生活的灾难性现象”、“深入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之苦，存在之痛，最深最痛最诚恳的实践，敬佩不已。”……

满宇说，这个项目让他看到人的差异性之大——尤其在他们深入谈及自己具体感受的时候——以及丰富程度之广，都超出了他的想象。因为和个体贴得很近，“一个人的社会”给满宇一种此前没有的感受，大概可以被形容为“某种联接”。“之前的项目都很好，但它们都压缩了很多东西，也有很多内在的冲突，多数我都不会去处理，也不会回应，就非常难受。”

这些被满宇形容为“无法承担”的东西，我或许不太陌生。当一个艺术家的社会实践项目完成之后，受众和媒体从展览、文本或者分享里寻找自己可以接收的信息，但此前艺术家和调研对象、调研环境之间的互动，还有许多碎片化的感受和思考是很难完整传递出去的。这些都会变成需要自我消化的部分——其实和媒体采访非常相似。

“一个人的社会”的参与者之后会怎样呢？满宇说，“他们生活会顺当一点”。但他反对“疗愈”。“因为这里面隐含了非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有用、正常、适应社会之类的……如果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话，我们就处在意识形态的想象中。所以必须明确反对。”

“一个人的社会”可能到第三期就会停止。因为满宇感受到了某种问题和工作方式的

重复。另一方面，他希望进入新的议题。

“有些新的现实慢慢变得越来越清楚，比如说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不仅仅指工作代替的问题。现在的小孩的语言不是来自于母亲和父亲，来自于电脑，这就跟之前很不一样。”

“来自电脑的语言，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不像个体的人，人带有一种欲望的气息。刻板化地说，母亲有爱，父亲严厉，对不对？但电脑不是在这样的层面上与语言发生连接的。它是商品化的，模版化的。对精神分析来说，语言不是外在的东西，它相当于身体的器官，那么你看，现在构成器官的素材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普遍，国内外的临床开始开始接待这样的小孩了。精神病的世界是个大趋势，具体会怎么样不知道，都在观察。”

Q: 你最近遇到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A: 现在我的日常生活、精神分析、艺术实践能够连成一片。之前很分裂，日常生活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像荒漠一样难以忍受。比如说别人养花，对我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当然现在也是。但我有我的兴趣。

Q: 是什么？

A: 跟人聊天，可有兴趣了。聊啥都行，随便聊。对，我最喜欢的是大家觉得不爽了就来这儿（笑）……来我这里痛苦的人比较多，有的人什么话也不说，趴着哭一个小时离开的也有。

其实怎么说，我感觉现在自己也处于一个低潮状态，就是第三期做完，接下来会做什么，就有点懵。比如我刚刚说的一些新现象，我还没什么判断或者理解。我其实希望可以产生新的认识、新的实践，进入新的场域。我始终对支配现象的背后逻辑充满兴趣。我在实践上并不怀旧，但目前也没有新想法，所以你要说有啥有意思的，我一下子还想不到。

Q: 你最近要解决什么问题？

A: 如果是很直接的问题，就是项目没钱。早几年会容易很多，现在特别难。

Q: 你想要找谁来接力？

A: 精神分析家徐雅珺，她有自己的社会实践，唐浩多无墙幼儿园她也有在支持。她自己也在昆明的城中村给流浪儿童做心理支援。

还有葛磊。我形容他为我们二楼机构的压舱石，不然走不到现在。另外机构的几乎所有项目，很多核心概念还有执行都是他，没有他的想法和行动力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个从外部是看不到的，但我们自己知道。所以我一定要推荐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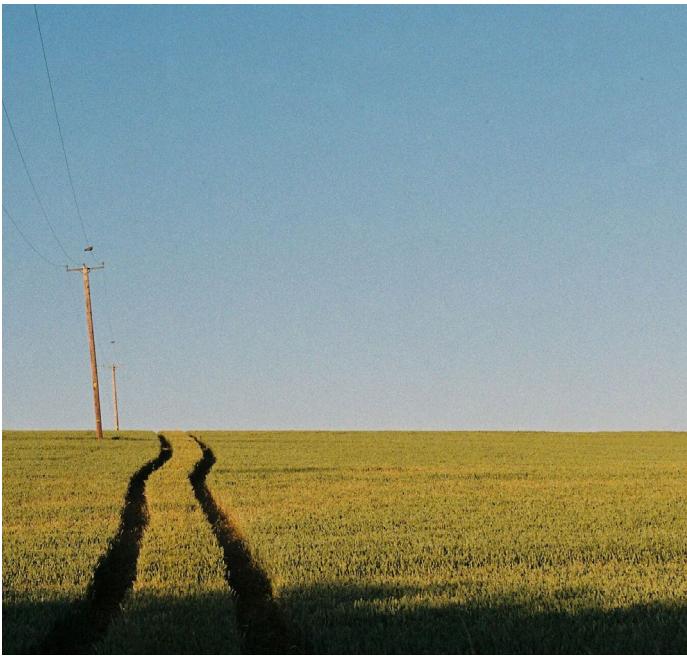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 [Nick Page](#) on Unsplash

专栏

066 张晓磊 一个为蚯蚓、江豚和看似不 相干的东西而工作的人

杨樱 | 接力访问

在许多“战友都倒下”的时候，
他为什么还在？

新冠三年之后，张晓磊的工作领域从大型工业污染转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方式没什么变化：在一线做调研，在传播媒介里做倡导，推动相关政策出台或者相关部门跟进。这曾经是一部分 NGO 工作者的常规工作，有点像一个大报警灯，发出引人瞩目的呼吁和警告，作为社会第三部门为各种问题查漏补缺。

张晓磊特殊，主要是因为如今这样工作的 NGO 从业者已经越来越少了，用张晓磊的话说，“现在我们的很多战友都倒下了”。另一个让他不一样的，是他大多数时候一个人工作。他跟进项目有重叠性，有的问题可能 2 个月内能解决，有的需要 5 年，有的甚至 10 年，而且总是有新问题出现。又因为不是最终的问题解决者，张晓磊只能施加外力，所以他的工作就始终处于“持续推动”的状态，在问题解决之前，谁也不知道进展的时间点会在何时出现。可堪比较的似乎只有关注领域的差异，“工业污染的时间线长，做完这个企业换下一家，这是一个行业问题；但生物多样性（议题持续时间）更久，它和人的行为逻辑有关系，有时候问题不明显，但又很重要。”

听张晓磊说这些，会感觉他在说期货，又像西西弗斯，还有点“摁下葫芦浮起瓢”。除了着眼于当下每件事的具体进展，没有别的路可走。尤其是张晓磊一个人工作，等于是直面问题本身，而不是作为一个团队组成部分，和问题之间还隔了一层叫做“团队分工”的冲击带。如何规划自己要做什么，如何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都得独自完成。

他转变工作领域的原因，一是疫情期间环境调查行动受限，更主要的是，“工业污染减少了”。张晓磊不同意我将之归因于经济衰退，“因为疫情前就已经开始好转了”，他提及从 2018 年开始政府基于“绿水青山”政策对非法排污和非法采矿进行严打，以及腾

格里沙漠排污事件的巨大影响力。



数个足球场大小的长方形的排污池并排居于沙漠之中，周边用水泥砌成，围有一人高绿色网状铁丝栏。其中两个排污池注满墨汁一样的液体，另两个排污池是黑色、黄色、暗红色的泥浆，里面稀释有细沙和石灰。陈杰 / 中外对话

腾格里沙漠排污两次受到大量舆论关注，分别是在 2012 和 2019 年。如果你搜索关键词，沙漠里触目惊心的巨型污水池照片就能很直接地出现在你眼前。这其中也有媒体尚在工作的因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和一些记者合作，他们做很好的报道，但是后来国内的调查记者自己的环境也不是很好，他们跟不了了；后来，特别是疫情之后，记者不愿意出门，就让你把材料给他们，他们发一下，调查是不会一起去的。”

回到环境本身。一件诡异（但又合理）的事情是，也正是因为这种超大体量的污染可以通过影像方式公之于众，它在环境保护者看来就会是“相对比较容易”的问题。如今这样的情况近乎消失，无论是污水处理方式还是排放量都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张晓磊纠正了我说工业污染议题“重要性下降”的说法，他说，“只是关注度变小了”。

关注度上升，或者说张晓磊希望关注度尽快上升的是疫情之后的野生动物食用现象。“疫情三年其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国家有政策，地方在严打，野生动物也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现在上网——我们经常做线上调查的会被大数据推送——短视频平台上很多野生动物捕猎和吃野味的视频就出现了。”

除了吃野味，还有盗猎工具比如捕兽夹的电商交易。捕兽夹一视同仁，既可能伤害濒危野生动物，也会让人在和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接触过程中发生感染。一个叫做“电商无野”的行动由多家公益组织联合发起，推动电商平台进行整改，督促他们下架工具，这似乎是为数不多可以遏制类似情况的方法，另一种“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在一个叫“回归荒野”的公众号里，可以看到志愿者在线上的调查和行动——最主要的方式是监测并举报：在 1300 多份举报内容里，有 400 份得到了反馈，平台下架违规商品、删除宣传信息，线索移交政府部门。

张晓磊参与了这个行动。不过他还有更细分的领域：电捕蚯蚓的生态问题。张晓磊在三年前着手，路径依然是互联网。

前些年国内掀起了一个“电蚯蚓”热潮，其实就是利用蚯蚓机——一种类似于电鱼机的设备——去电蚯蚓。把两个探针插在土壤里面，就可以把蚯蚓从土里电出来。

制作鱼饵是一个方面，还有特殊养殖，搞特殊养殖的人需要蚯蚓做饲料，比方说大壁虎的养殖者，在壁虎繁殖期它们需要一些特殊的营养，人工养殖蚯蚓缺乏某种野生蚯蚓的元素，所以饲养者会购买野生的，喂进去壁虎就会产卵、受精，然后可以去孵化。如果拿人工蚯蚓喂，蛋是不会被孵化的。野生蚯蚓市场价格就高了。

我们就找到一个途径，通过互联网。那些设备都在互联网平台售卖，而且售卖量达百万件，所以我们就发起了一个行动，去呼吁、去倡导。去年国家七部委联合发声明，禁止店铺出售蚯蚓，电商平台也把设备都下架了。类似的行动我们做了好几个，它真的是能改变一些问题的。所以我们确实有成就感，而且，你要是不乐观，你真的很容易放弃。

可以做“蚯蚓”这样的议题，张晓磊觉得这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的好处。他是 1990 年生人，2015 年开始做 NGO，一直以半志愿者的身份和大机构维持游离的状态，目的就是维持自己的行动自由。“比如说你进入企业，企业就会引导你按照它的部署去做一些事情，不会那么开放。”

“很多人在我们做蚯蚓的时候，都不理解这件事有什么可做的。但我们还是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如果你进入到一个社会组织或者企业里，你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发挥。国内的 NGO 有一些和企业没有区别，在里面工作的人，也就是拿一个工资而已。”

张晓磊是甘肃人，出身农民家庭。如今他如果不工作，所谓的休假就是回老家务农。父母并不在家，他们在其他地方打工，据说也是在帮别人务农。张晓磊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链家，“看起来不坐班，但是也没什么自由，而且完全不接触自然”，于是他换了份银行工作，当然更无助于解决问题。那时候他经常看一个大学同学的朋友圈，后者

在做鸟类保护，也关注工业污染难民，为他们争取权益。于是通过这个同学，张晓磊进入了NGO领域。

他很清楚做这些无助于提高一个人的社会生存资本：收入没有保障或者相当少，身份不被认可，因为潜在风险必须学会隐藏自己，就算如此，他的行踪也常常被“跨省追捕”——这是我的用词，也是这一行的诡异之处，要借助公权力实现自己的社会呼吁，又要规避甚至是防范另一部分公权力，因为不喜欢他们的人同样也可以借助这种方式来让他们停止做事。

张晓磊不诉苦。既不诉调查的辛苦，也不诉不可抗力的苦。聊天里我听得最多的就是他对自己工作模式的强调——总是一样的，只是根据他手上议题的不同，可以不停切换主语和细节。

我们今年关注亚洲象表演，在云南，亚洲象一直在被用针扎或者被虐待，实际上此前很多人都看到过，但是志愿者和机构去做调查的时候，经验不足，或者方式不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到今年。今年我们关注了之后，拍摄到表演者确实在用针形物所刺扎大象，就在表演过程中，为了大象乖、听话。我们拍到这样的一些素材之后，一下子就引起了云南高层的重视，后面整个云南就没有大型表演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通过具体行动，找出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然后去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一直的策略和方法。

这种“提醒”模式不仅有风险，也很可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和张晓磊聊过屡禁不止的环保问题、动保问题背后的经济、社会因素。就好像预防偷猎的方法并不仅仅是没收工具，而是解决当地人的就业收入问题。不过类似的探讨进展不深。他认为他只能做他能做的。



云南民族村内的大象表演

“正面硬刚我脑子里跳出来的词我们聊到接力访问里的曲栋，一个残障NGO从业者。曲栋意识到NGO日益缩水和变质情况之下的危机，因此他放弃了类似于依赖公共部门设定、修改政策才能解决问题的思路，想从商业视角为残障人士提供改善身心的机会。

张晓磊不认为自己可以复制这样的思路。我们不一样，他的总结很简单。“有些事情只能有关部门去做，一线调查我们可以做，但是比如说两只江豚死了，另外两只还活着，要放归保护区，要么就留在海昌。这个问题我不可能直接去介入，只能通过信息公开去推动有关部门的行动。”

张晓磊提及的是4月下旬，网传上海海昌海洋馆2头江豚被虐待死亡的事件。具体死亡原因经过农业农村部调查，在7月11日公布，新闻并未回应海昌饲养环境、动物保护相关措施实施等待核实细节，而是直接公布了专业分析的死因：“第1头死亡江豚死于重症肺炎及肺脓肿引起多脏器实质性病变及功能衰竭；第2头死亡江豚死于急性肾功能衰竭伴发急性心衰导致的严重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进而引发多脏器功能衰竭。”但是提及了“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于2021年5月被授牌为农业农村部长江江豚人工繁育和科普教育基地”。如张晓磊所说，剩余两头江豚已迁至安庆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

张晓磊觉得，曲栋提及的是一个手法问题，在他看来，最正统的那个NGO工作方法“并没有失效”。但他也觉得，如今利用自媒体来做倡导和呼吁愈发困难了，传播碎片化是一个原因，自己的精力也很难应付如此之多的事情。但这些问题你还得去做，你不做没人做，而且越来越没人做了。”

“那你为什么还能做？”

“我不做，剩下的两头江豚也可能会死，对吧？”

如开春遭遇倒春寒，苹果树开花受冻，苹果就减产；西双版纳的茶叶，因为极端干旱，茶叶也减产。以前大家不懂气候变化，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了解，还有一些项目和议题在推动，甚至投资、基金理财的那些分析师，做预期的时候也想研究气候变化，我就有一种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在觉醒的感觉。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有意思。

Q: 你最近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A: 大的问题都没必要说了，因为都是工作。我的问题是个人问题怎么平衡。我没有生活的，可能去一个地方连下馆子吃个饭都没有时间。我特别羡慕大家能去吃好吃的。

Q: 以前这不是一个问题吗？

A: 可能到了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父母、家庭还有整个社会环境，其实对我是有压力的。

Q: 希望找谁来接力？

A: 羊羊，她是一个公益律师——应该超过十年了——收入一般。我好奇她是如何坚持这么多年的。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Q: 你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我最近做气候变化相关的调查，发现气候已经对老百姓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比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电影《伯德小姐》(2017)剧照

专栏

067 Zebra

通过做口述历史了解家人， 却还是无法真正和解

杨樱 | 接力访问

“爱到底是什么？”

Zebra 是一个对情感和权力边界很敏感的人。[在小镇湖之后](#)，因为她所在的女性主义社群有种种争议，给她带来了相当的情感压力，我们的接力访问暂缓了很久。再联系上，她已经离开成都，并如之前计划的那样开始了心理学的长阶课程。

我们的对话并没有围绕她长期从事的 NGO 工作聊太多。最初我对 Zebra 的口音很感兴趣，她说自己是四川人，却有一口略带北方口音的普通话，而且她不是三线子弟。Zebra 的很多经验都来自她很早就开始接触的互联网——作为一个 1995 年生的人，这些经验既帮助她跨越了地域所在的局限，也让她在各种信息的综合作用下快速成长。正因如此，她开始在家里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与父母产生“断层”，持续至今。

“互联网一代”的成长故事其实并不少见，不过 Zebra 的例外之处在于，她一直在尝试解决这种隔阂。为了了解父母的经历，以及他们对她的权力关系，她用 PPT 解释自己的工作，给他们做口述历史，虽然这些依然没能带来彼此之间关系的长久改善。

如果说要有什么收益，就是她在给家人做口述之后，越来越觉得普通人的经历重要。她希望可以做一些事情，让每个人的故事可以有讲述的机会。

以下是 Zebra 的口述：

我老家是绵阳的。高三的时候，因为学播音主持，是艺考生，有一年在成都川师东校区那边的一个培训学校上课。我家境还算可以，父母都是医生，小学就开始上网。虽然我是县城长大的小孩，但接触网络还算比较早，家里面第一台是那种方正大电脑，小学六年级就帮我们全家人都注册了 QQ 号。那会儿 QQ 空间还有一个“腾讯文学圈”，在空间写东西，有一些会得到编辑推荐。

我很喜欢看小说、听摇滚乐，初中拿零花钱在我们县城文轩书店订了《我爱摇滚乐》《爱音乐》《看电影》这些杂志，可能这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定这种杂志的人。

而且我也很“愤青”，谁要来管教我，让我不得不必须做什么，我就会特别敏感。我十几岁的时候，家里人就突然发现这个小孩一下子变得特别强硬，一天到晚都很愤怒。

我到成都念书的时候，已经在网络上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给我推荐去哪看演出。那会儿我还看过李志在成都的演出，在小酒馆芳沁店，我不敢点酒，也不能自带饮品。第一次去看演唱会，百来人挤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我现在都还记得皮肤之间那种接触的感觉。像从一本书找到另一本书一样，我通过很多线索找到了很多活动，那会儿我都是凌晨 2 点多才会回到培训学校。

我有一点英雄主义，特别是在很小的时候。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大家都是我的 NPC，就会想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家里人对我的很多做事方式不是特别的认可，很想要纠正我。我就想象，是不是对于这个世界我是有责任、有使命的，他们都是我的 NPC。这是我的游戏，我要怎么来玩。所以很早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做什么。

当我开始从这种想象中脱离出来的时候，开始在网上去上一些公开课，我很想了解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周遭有什么变化，人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我就在网络上到处去找我能够学习的东西。

那会儿上在网易公开课和慕课 (MOOC)，学了台南大学的社会学课，还有哈佛人类学等等，其实就是看一些录像。最开始我想要去学社会科学，因为很喜欢独立音乐。小时候听台湾独立乐团，发现他们和内地的不一样——他们很喜欢议事、对话、讨论，我在身边没有遇到过那么多喜欢对话的人。台湾音乐人很喜欢讨论政治，会对很多事情发表自己的思考，让我觉得思考和对话不是羞耻的事情，表达自我也可以激发别人。

但我文化课很差，我从小到大不太喜欢学习……爸妈以为我考不上高中，就想让我去学那种“3+2”护理学校，因为他们是医生。但是没想到我运气很好，考上了高中，而且进了实验班。

我说话没有四川方言的感觉。以前网上有那种语音频道，我和网友会在上面读广播剧或者什么的。后面有老师说，也许我可以去考虑一下去学艺术，去读播音主持专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专业……当时我选学校，其实就是想去一个喜欢的城市。

我做事一般是先斩后奏。我知道父母不会同意，而且他们一定会说伤害我的话，我就会选择先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体验，体验完了之后再告诉他们，让他们生气，让他们来给我一些情绪什么的，但是我又还好好活着，他们也不会有太多可说的。我一般和我父母都是这种关系。我先做好自己的决定。

前段时间还和爸妈吵架，把他们拉黑了，群也退了，然后又把他们放回来。我今年 28 岁，我父母会越来越觉得这个小孩我管不了了，但是他们又很想要在我这里呈现家长的权力感……

前段时间拉黑我妈，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漂了一个金色的头发，又打了鼻钉，再加上我本身从大学开始，慢慢对于身体这种东西没有特别强烈的执念，也陆续文了身。但我妈就会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她受不了，而且她很有压力。

有一天我分享了一张我觉得很好看的自拍到群里，当时只有我姐夫回复了一下。后面我妈直接和我私聊，对我进行了长达两个微信屏幕的那种人身攻击，评价我的发型发色、鼻钉文身、交友方式，就把我进行了一整个大评价，完了之后再进行作为母亲的自我攻击，她的焦虑一直不停地传递给我，让我觉得特别难受。我在和我爸妈的关系上其实做过非常多的努力，希望他们知道我是爱他们、支持他们的，希望他们可以拥有自己。

中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插曲。就是我最近在学心理学的课，老师是台湾人。前段时间我妈在网上看视频，上面说美国在中国办心理学班，洗脑中国人。我爸就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已经和我妈一个月没联系了——再加上他们无条件相信间谍短视频，就开始对我进行侦查。

我爸问，你最近开始上课了吗？那个课程多少钱？是在哪里？是在成都吗？你们老师叫什么名字？他是哪里的？我就把老师的信息给到他。很好笑，因为我们老师是个台湾人，名字和蔡英文的秘书长还是什么人好像撞了，我爸使用百度百科来检索，就觉得他的想象落实了。我父母真的会跟我说，你要爱祖国爱人民。又在微信上面重新讲了一遍，希望我可以爱祖国爱人民，然后不要参加邪教。

然后我就说，我不需要邪教，有的时候家庭关系对我来说更像是邪教。然后我爸也火了。骂我孽子。

我父母（以前）会问我是不是在搞女权，其实他们只觉得我在对抗一些似乎不该去对抗的东西，会有危险。我以前还做过 PPT，解释我在做什么，包括我以前在公益机构

工作的时候，因为我父母也会担心我没有钱拿，担心这个是犯法的，我也会给他们做PPT，说目前这个项目是做什么议题的、会怎么做、钱从哪里来、每个月可以花多少、可以拿到多少钱……所以最近经历了这几件事情之后，我已经不想解决问题。我和我父母的关系就是过山车式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特别能够理解我，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确实还没有理解我。

我以前一直会想，我的父母真的爱我吗，爱到底是什么？我小学的时候，日记被我爸妈看了，发现我喜欢别人，就把我打一顿。那个时候我知道不能袒露情感，我不能让他们知晓我有类似的情感。

我读初中的时候成绩很差，又不喜欢和他们讲话，总读一些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读的书，所以我妈撕掉过我的书，当着我的面烧掉过我的书。

让我觉得特别不能够理解的是，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在新华书店看我妈过来给我买教辅资料，看到我在那看课外书，直接把我拎起来就往家走。我们老家有条河——那个场景实在是太清晰了——我妈拎着我往家走，我当时特别紧张，因为我知道回家之后又会被打。当时我的同学就从桥另外一边走了过来，我当时应该在反抗，我妈就打了一下我的脖子后面，然后就把我的书扔进了河里。我一下就崩溃了，就开始哭，我的同学从对面走过来，都不敢和我打招呼。

这个事情带给我的冲击力太强了。我现在都会给父母说，我觉得你们在羞辱我。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我姐比我大4岁，她比较听话。以前她在绵阳读书的时候，去参加周杰伦见面会，我爸妈直接让她退学回县城来读书了。我姐读初中的时候，有一年冬天衣服不够，我爸去给她送那种毛裤什么的，还把我带上了。去了之后，我爸让我姐当场换衣服，我姐不愿意——那个事情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姐姐因为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而痛哭。我意识到我们的处境是一致的，都是被管教的小孩，但是她和我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

我给妈妈做口述历史，因为我想知道她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我很想要理解这个女性。当时了解到一个项目，叫《生的故事》，北京草场地当年的纪录片项目。拍摄者可能是小孩，被拍摄者是母亲，一起讨论生育话题。我很受震撼。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女性主义启蒙的感觉，但我还不知道女权或什么，只是突然发现我妈是个人，是有自己名字的，有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我终于在那个时候找到了一个表达方式。我可以行动了。我就把片子发给了我妈，就说我也想做一个类似的，但是她不想录像，所以我们当时录了音，以及我做了一些小的记录，她也不想发表。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对我们俩很重要。我们是在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下面完成的，我会列一些提纲去问她，比如说她是怎么出生的，她的父母是怎么对待她的，然后她的家庭情况。

我妈和我爸自由恋爱，然后我爸爸这一边所有的兄弟都是生的男孩。我后面才知道我妈妈其实流产过。也是通过口述我才知道，我妈那个时候也安了环，因为安环身体受到了很多伤害。1995年的时候，我们家交了巨额的罚款。我爸后面经常会讲，说要是不生我，我们家早买大彩电，大冰箱了……我妈也会讲，她怀着我的时候就到处躲。

我前面其实还有一个哥哥，后面意外流产了，流产之后才知道是一个男孩。后面我妈怀我的时候就说，不管男孩女孩都要把我生下来，然后生我的时候还是在乡下，没有在医院里。也是因为在躲。

后来他们会讲，我出生的那天晚上很邪门。我爸梦见我们家堂屋——川西那种有点像四合院的大院子，有一个主进门的地方——有人在敲门，他从堂屋出来去开门的时候，有一个穿水绿色衣服的小男孩喊他爸爸。

因为我生在村子里，他们就去找那种旧衣服给我穿，在那些旧衣服里面，就有一件水绿色的小袄。我觉得太神了，我爸经常喝多了之后再讲这个故事，他们觉得我的性格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身上还携带了另一个人的命运。其实我小的时候一直很厌恶这种讲述。我就感觉他们并不准备面对我这个小孩，总想要找一些借口。

做口述的时候我们都哭得很厉害，讨论、去聊人的成长。我妈当时也跟我说，没有想到有人关心她的故事。很多事她其实从来没说过。这也带给我很大的震动，因为我觉得普通人的故事很重要。也是通过这个举动，我好像有一点点找到我人生的使命感。我希望人都觉得自己的故事重要。所以我后面做很多事情，都是人的学习和转化相关的一些工作。

虽然我和我妈都痛哭，我虽然理解了她，但是我不接受她对我的伤害。我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我依旧觉得她应该向我道歉。但父母是不会道歉的。

对话的时候，我以为我们是平等的。我以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谈，但其实我父母还是会觉得自己孩子的孩子，我们的权力关系是没有得到一个释放的。

我意识到这个之后，虽然后面还做了去访谈了我奶奶、我爸爸，但是我还是意识到可能我和他们真的太不一样了。我们就是他们的课题，就是他们的功课。他们不准备去做出新的行动，也不想要改变，也不知道怎么做。后面我和我妈妈的关系有缓解，但是很快也因为他们无法要求我去做一个他们期待的小孩这件事情而打破了。

我2018年毕业去了公益机构，做环境教育的研究。我其实是在慢慢做事情的时候，开始去了解到社会上工作的不同的一些结构模式，人的一些分类什么的。后来我一直在公益这个领域，只是有不同的方向。

我从来没有觉得在中国有公益机构行业这种存在。我越来越发现从大的环境框架以及政策上看，内地的公益组织其实也是很公司化的。现在几乎没有草根组织了，大公司或者说大资本开始介入到公益慈善这个领域，筹款的那种网络化以及官方背景化，小的机构和草根小组消失。官方在接管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内心是缺乏这种安全感，好像一直都知道这个东西它并没有那么真实可靠，或者我做这些事情，本身并不因为在公益领域里面就如何特别，我并不这样觉得。因为它始终还在一个大的系统里面，对，大的体系其实并没有改变。

Q: 你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A: 不久前我去看林生祥的演出。台湾的音乐人其实现在也很少来。当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的，现场发生特别神奇的一件事情。

我有一个广州的朋友，当天临时决定开车来深圳看演出，看见了我就走过来打招呼。我们以前一直是网友，她认识我，但之前见面她戴着口罩，我都没见过她生动的样子。之前我在朋友圈分享了一些很糟糕的感受，这个朋友平时和我也不怎么私聊，但给我转发了一个行动者和社群创伤相关的文章，希望对我有帮助。我觉得就很神奇，没有预料到会在这样一个情境下面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公共场景突然有人喊出我的名字，都有一种不安全感，我有种想要隐藏自己、无法开口说话的感觉。但那个情景对我来说还挺动人和深刻的。

Q: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解决的问题？

A: 肩颈疼痛。

Q: 你想找谁来接力？

A: 想要推荐阿顺，她是我很重要的朋友，也曾经共事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她的微信签名：一团温热的小火苗。顺顺是那种会温柔托举别人的行动者，也是一直很关照自己的人。顺顺是我喜欢的那种人，不是成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而是慢慢学会成为“更熟练的自己”的那种人。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文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专栏

068 叠贵

用苗语唱歌，只是我为这个民族讲故事的一种方式

杨樱 | 接力访问

以自我为路径，

他想让更多人打破对民族文化的刻板印象。

叠贵去学人类学是为了看一看自己作为一个苗族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怎么去看待“苗族”这个身份问题：叠贵去搞音乐，是为了让其他人知道一个苗族人可以是什么，或者说，怎么去看待“苗族”这个文化问题。人类学和音乐都是叠贵的路径，前者帮他看到了更多东西，后者让更多人看到了他。

叠贵 1985 年出生在贵州台江县的一个苗寨里。寨子差不多七八十户人家，他在寨子里读小学，在乡里读初中，在县城读高中，在贵阳读大学。同龄人里考大学的整个寨子就叠贵一个。他是艺考生，本科学平面设计。

在叠贵 15 岁那会儿，也就是 2000 年，政府开始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业也开始渐渐出现在他身边。一些节日和仪式就变出两套身份，一套作为文化品牌招商引资娱乐游客，一套和叠贵小时候一样，自家过的那种，反倒不会那么隆重。叠贵之所以要去学人类学，其实还有一个理由是他要去北京。他可以去中央民族大学。这个时候的叠贵是个激烈的民族青年，表现为去各种论坛争论和吵架，内心装着民族危机，所以当他看到央视“感动中国”栏目有个苗族入围者叫王安江的时候，就决定和朋友一起去拜访他。那是 2009 年。

王安江 70 多岁了，搜集苗族古歌 30 多年，疾病缠身，家徒四壁。叠贵是冲着王安江的自我牺牲和民族保全精神去的。他们聊古歌。苗族古歌不是音乐，叠贵说，是歌谣。然后他强调，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是民间文学，不是音乐。“它是一种叙事性文本，要讲故事，而且不是简单的从头叙事到尾，是在酒桌上由歌师对唱，你问我哪个巨人来得最早，我告诉你下一段故事。”几天几夜方能唱完整个故事，并且

整个古歌没有文本记录。

叠贵后来做音乐，成立一个乐队叫“崩摆大鬼师”，不过他从来都说自己不懂乐理不懂乐谱。2023 年他一个人开始全国巡演，苗语演唱，一张有汉译歌单发给听众，到了现场，他穿着蓝染的苗族服装，宽袖短裤，几乎接近于清唱，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歌词没有意义，曲调也谈不上有多少亲和力，但经常有人表示听得非常感动，给叠贵留下大段内心表述。还有观众问他，你唱歌的时候是不是很孤独，因为你们唱歌都是要对的。叠贵回，的确如此，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



叠贵的表演里有没有他了解的古歌打底，我们没有聊到这个。我一开始好奇他何以如此有毅力，可以持续 5 年访问古歌歌师，他如实相告，有一部分是在为人类学硕士论文做田野调查，课题是苗族古歌里的族群记忆。可能到这个时候，叠贵内心对于苗族文化的认知还是以一个宏观整体存在的，人类学教给了他和其他文化作比较的方法，也让他更抽离地看待自己的民族身份。

那时候他身边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这个在族群内部很常见，另一种是激进的世界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世界大同，好像我们不用管什么民族，反正大家都是人就行了。”叠贵也不太认同这一种，因为它把明明存在的民族特殊性一概抹去，而事实上，不管是语言、服装还是对待生死万物的态度，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不承认存在，又谈何尊重。叠贵说，他是一个站在两者之间的人。他要做一个转译者。

硕士毕业之后的叠贵回到凯里，在一个研究所工作。研究所在 30 多年前很活跃很有名，但现在没有了心气。不过叠贵认为自己还是在一年左右的工作时间里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为少数民族文化普查设计了一个表格，这样普查员去寨子的时候就可以把文化的方方面面了解得尽量全面，包括音乐、建筑、宗教信仰、舞蹈等等。

离开研究所之后叠贵就去了贵阳，他的朋友都在那里，他也想开始做自己的事情，包括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夜郎无闲草”，也包括乐队。关于工作室的描述，他在豆瓣小站上是这样写的：致力于民间文学重审和苗疆青年文化自觉与自省事务的工作室。

叠贵很早就明确自己要面对更年轻的苗人。这也是他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沟通媒介的主要原因之一。“年轻人可能接受速度更快，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老的一代你不能跟他们较劲了，你只能去汲取好的养分和知识，实际上你最后要面对的还是未来的人，甚至是还没有出生的那些人，你要让他们看到母语一样可以做好玩的音乐，可以有自己的电影美学，文学形式，不是只能唱唱酒歌情歌而已。”

音乐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即时获得受众反馈。叠贵在民大的时候和朋友安迪一起在北上广深做过现场表演，他现在称之为“玩票”，无论是音乐形式还是表演的目的都不甚清晰。2023 年这场为期三个月的巡演是真正的拉力赛：叠贵去了 20 多个地方，而且间隔常常很密集。特别是 8 月，他原本还打算出去演几场再回贵阳拿点行李，后来演得兴起，一出门就没有回去。

叠贵的巡演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也可以说是他所到之处的共性：朋友和空间。叠贵并不在寻常的 Livehouse 或者音乐场所表演，他去的地方是各种独立书店和艺术空间，



根据各地特色，有的时候在一座寺庙改成的酒吧里，有的时候在居民区里，有的时候在月租两万的市中心街铺里。这些都是朋友开设的、或者朋友推荐他去的空间。来的人有时多达百人，少则二十余人。演出票价一般由空间主人来定。

来到这些空间听叠贵唱歌的通常都不是冲着音乐来的。他们通常都和文化艺术工作沾点边儿，去参加这个“种歌 苗语民谣实验现场”是出于一种文化热情，一种好奇心。“音乐对他们来说是启发或者激发，我更希望是这种。我自己想要得到的是音乐之外的交流。”

这也是为什么叠贵的巡演不是那么像音乐演出的原因，把他认为合适的苗族文化表达交织在自己的表演里——从发出海报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海报的主视觉是一只衔着枝条的鸟，有胖胖的身子、巨大的翅膀和尾羽。标题第一行是注音苗文，DIOT HXAK，就是“种歌”。叠贵解释，苗人认为，歌有生命，像树木花草一样。苗人唱歌，不是唱歌，而是把歌种在虚无世界，让意义在空洞的生活中成长。叠贵的签名小小的，同样有苗文，Dieel Guik。其实这不是他的本名，直译的话，就是“贵哥”。

叠贵的父母都不会苗文。当我们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摆好架势，先从苗语的三大方言和苗人的地理分布开始讲，口吻接近于民族文化馆解说员。我忍不住打断他，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他说，大学开始，自学。然后嫌弃我打断他的解说，“就是说为什么要用这个字母字，就是 1950 年代，政府和语言学家、苗族学家，大家做了语言调查，创造出来了字母文字。当时贵州就分苗族，再下来是侗族，政府来做文字工作，就做了三大语言区的三套方案，它很复杂……”

我感觉如果我们聊的不是苗文，而是民族服饰的纹样（或许这个有点小众？），或者是苗族古歌里的某种尾韵问题，叠贵的解说热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跟叠贵聊天就是这样，仿佛你有两种打开方式——全看你开启的是否是苗族文化相关问题——是与不是，仿佛可以开启叠贵的两种人格。后来我们聊到了“关于苗族文化这样的存在你到底在推广什么”的话题，要先了解到是什么让叠贵设计了独特巡演模式。

2017 年认识了广州的朋友们，也参加了张涵露在时代美术馆做的一个艺术项目。我觉得认识他们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就会激发我不停地去行动，把自己变成一个行动者。因为

他们也是这种，你如果看不惯一个东西，你就不用管它了，你自己界定出一套规则去做，相互之间不要伤害就行了。

2019 年这些朋友们来西南，十几、二十个艺术家跑到贵阳来，我就给他们找空间，又在一起待了 5 天，交流了很多。可能也是因为我一直对民族文化如何在当下呈现感兴趣，就是，它如何走一条我认为有别于宏大叙事，比如主流民族群体的叙事或者是官方叙事的道路，从个人出发，以个体为路径，去做一些实践。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在集体主义叙事里，个体容易被忽略，而且我们确实也很少去关注个体对文化的呈现，是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旅游、电视电影或互联网视频，都是以集体主义叙事为底色的，个人的思考是什么？个人怎么去做事？我觉得都一直没人去管。

都是空空的，在我看来就是这样。苗族内部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社群，也有自媒体，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没有逃离（集体叙事），没有跳出来。

我的巡演就是在追求个人的东西。我想打破刻板印象。我永远记得前几年我看到一个国外女画家说的那句话——我不知道是谁了——那句话就说，“我们所希望的不是为人所知，而是被重新认识”。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于我现在这个身份或者苗族的处境来说，我不是要去大肆宣传苗族文化什么的，那已经过去了，或者说我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它从刻板叙事里跳出来，让大家重新认识这个族群的文化和人。重新认识而已。

因为实际上苗族也好别的少数民族也好，大家或多或少大概都知道是什么样，但是这种认知是很有限的、很表面的，我就想重新激发你们重新对我的族群或者我的文化的认知。

每个人还会生老病死，我们回到最初那个话题，我们首先是人，不管哪个民族，这个是不可能忽略掉的。但是每一个个体、每个民族、每个群体，他们去面对生和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穿的衣服也是为了御寒和美观，但其中还有各种各样的认知。同样的功能，不一样的表达。

除了音乐之外，叠贵是苗文翻译局的发起人。他在 2016 年与贵州人民出版社合作，计划出版四本苗族神话绘本，来自于他对苗族古歌多年的田野调查结果。据说这个漫长的合作在明年可能会有落地的消息。

叠贵是家里三兄弟里的老大，不过不管是兄弟们还是家乡人，都不太理解他现在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常来说，一个读到硕士的人应该做领导，这是他身边的人的价值观，或者怎么也得去县城谋个白领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做一些大家看不懂的事情，还没能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如果你没做现在这些事情，你可能在干什么？”我问叠贵。这自然是个傻问题，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假设事情从未发生而他还知道另一种人生答案。叠贵也是这么说的。

但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难。叠贵在离开研究所之后，隔了一段时间又入职了出版社，也在贵阳。他白天坐班，晚上回去和家人做饭说话，结束已至 10 点。只有深夜的一点时间属于自己。如果不是年底的奖金，每月几千元的工资看起来着实勉强。因为在外面有演出之类的活动，他被人检举，于是顺势辞了职。

在这个过程里，他遇到了贵阳封城，而他就住在那个著名的花果园小区。当时家里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妻子在封城状态里坐完了月子。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叠贵思考了“自由”的具体含义。于是国庆节之后，他就提交了辞职报告。下一家公司是做音乐的，规模大，和很多知名音乐节有合作，请他去运营一个演出空间——据说是贵州最大的 Livehouse。这一次叠贵做的是管理角色，但因为人少活多，也没太多话语权，他基本是在给各种事情做服务。

在巡演之前，他差不多就挣扎在这种状态里。如果不开始自己做事，他可以有多少选择、选择又意味着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稳定和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之间，尽管局势不景气，他也选了后者，好在巡演成功，竟然也让他的财务危机得以缓解一阵子。

他计划在贵阳开一个自己的空间——这是他全国游走的“私心”，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是怎么做的。“我任何领域都感兴趣，或者说我都想去连接。我就想做这一个南来北往的朋友来到贵阳后，或者贵阳年轻人、创作者、文化艺术爱好者，或者说公众能产生很深互动的地方。”

他说自己如果卖书，就卖跨文化这一类的书，全世界各种民族。另一个就是志怪类的。他还是对生死鬼神感兴趣，就和古歌里的那些一样。

Q: 最近遇到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

A: 我在珠海的空间主理人他们开的空间很小，但那天晚上我们来的人也不多，10 个人左右。一个社区的民房。其中一个合伙人，一个哥们叫阿春，对，他也是广东那边人，

他讲一个鬼故事，对这个鬼故事他们自己亲自经历的，他们到过贵州碰到了一个神奇的事情，对这个事情有一个鬼故事，回头我会写出来。

Q: 你不打算讲一讲吗？

A: 我要写出来，可能9月份回去我就写了。这一路我听了好一些鬼故事。我要把这些道听途说的事情写下来。我有这样记录的习惯。就在我自己的公众号里。

Q: 你最近要解决什么问题？

A: 最紧要的就是是空间的问题，当然空间会涉及到钱，但是我从3月份辞职过后，我一直在找空间的，一直想推进工作。后来我到5月份我决定出来巡演。9月就想赶紧把房子定下来，和我老婆还有一个做精酿的朋友一起来做或者怎么样。可能还得众筹什么的，因为没钱，我实际上一点积蓄没有了，所以还要找钱。

Q: 想推荐谁来接力？

A: 音乐人吗子。他当过大巴车售票员，做过厨师，现在是我最喜欢的贵州音乐人。我们认识多年，一直共勉。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文内图片来自“还原剧团”

专栏

069 汤包 在即兴戏剧表演里， 他发现了都市人的微妙特质

杨樱 | 接力访问

“我希望大家意识到，
其实你不只是来做观众的”

汤包是个演员。他刚刚在上海文化广场结束一个演出，《一个人的微笑》，一个比利时先锋话剧团推出的沉浸式话剧，汤包是其中一个角色。跟他聊天是因为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也是演员，不过表演是即兴的。他与朋友们创办了“还原剧团”，做“一人一故事”，由此认识了[推荐他来接力的甘道夫](#)。

聊天之前查了“一人一故事”，是一种表演模式，从美国发展到全球。这个我们稍晚再说。

汤包，上海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不是艺术生，没参加过戏剧社团，人生24岁之前与表演毫无关系，“你要知道一个学校如果有一个表演系的话，它就不太有可能有个业余的戏剧社这样的东西了。”

汤包走上演员之路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与同学看话剧，女一号台湾人，学新闻的。汤包想，噢，原来学新闻也可以演戏。回去借着一点酒劲，坐在地板上与室友聊天，抱着靠枕打了一个滚儿，说，我也可以当演员。

当时大家仿佛就一直等着他这句话，既没表现出不屑或者打击，也没有很激动，只是非常认真地看着他，说，那你去演吧！这个反应很是出乎汤包的意料，让他想了一下自己到底在大家眼里是怎样一个人设，不过也没多想，然后就决定去学表演。

学表演之前先辞职。他那时候在北京一个叫 enjoy 的 app 做运营，“一个高端一点的大众点评”，他入职的时候公司 10 个人，号称要用媒体的思维做生活方式推荐。很快赶上互联网的创业风口，a、b、c、d、d+ 地融起资来，公司膨胀到三四百人的时候，汤包从一个讲故事的人变成了一个文案。

他每天负责想一些推广语。活派下来，最多用半个小时想好，然后无所事事，为了避

免让老板觉得自己工作量不饱和，接下来一天的时间主要是再想一些没用的方案，然后打乱顺序，一起交上去。每次大家开会选中的都是他最先想到的那一条。听起来有点搞笑，但工作可不就是这样？

有了台湾女一号的刺激，他就回了上海，准备去演戏。上海的好处是不用租房，“坏处”是重回父母的势力范围，不过好在他要去学表演，父母不擅长这个领域。

汤包的妈妈是大学教授，材料科学家，为人又热情又长袖善舞，“一个像太阳一样的女人”以至于汤包考大学的时候只想找一个“没有妈妈认识的人的地方”，经过一番排查，中国传媒大学不在他妈妈的人脉覆盖之内，于是果断学了文科。

去北京还有一个原因。当年他读那个重点高中，同学有很强的精英意识。比如说，他们课外自己写程序做了一个 BBS，取了个名字就叫 elite。汤包觉得自己不太一样，也说清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反正想跳出这个追求 elite 的圈子。

回到上海，外行人汤包去看“今夜百乐门”，开始从综艺里学表演，知道了“飞来即兴”，了解到有一种叫“即兴戏剧”的东西。报名学习，认识了同学中的“铁头”。铁头是个女生，当时是幼儿园老师，学表演的同时还在学巴西柔术，最后专职做了柔术教练。他们一起学，ABCD 若干级别，一个级别 6 节课，每节课就两个半小时，级别虽然越来越高，但汤包和铁头觉得不满足，计划再去学更多的。

即兴戏剧大部分都短，所以偏喜剧，大多以笑为目的，要“炸”。“比如地上扔好多纸条，演员先撤走，然后跟观众要建议，观众说一些台词和一些动作。都是很无厘头的东西，这些建议写到纸条上，演员回来，开始建立角色演剧情，演到一半的时候，随机抄起几个纸条就念，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观众喜欢的效果。”

他后来尝试做中篇即兴、长篇即兴，这就不是随时随地都准备让你笑了，更强调感动的部分、幽默的部分，角色更有深度，可能要演到 20 分钟以上。

后来汤包和铁头又认识了 IT 公司的大黄，程序员，老板喜欢“一人一故事”，遂得以接触到这个模式。现在大黄在大理，做一个“玩儿的剧场”：一个院子，院子里面搭玻璃房子，跟另一个人在那里带小孩一起做木偶表演。大黄也做过幼儿教师。

他们一起成立了“还原剧团”，以“一人一故事”的方式进行表演——现在可以说这是什么了——是一种无剧本的即兴表演形式，“观众在剧场中分享个人经验及感受，演员在聆听后以形体、声音或话剧形式实时呈现，作为礼物回馈观众”。



汤包是个演员，所以说说话就会换一个人。说话、神态、腔调都切换一下，不用提醒，我们就知道这是表演的部分了。

没见汤包之前，我以为“一人一故事”是这样的场景：一群人，报名参加一个活动，到某个空间，团团围住，坐好，每个人讲自己不为人知的故事、感受或者情绪（通常都是内心深处的、隐秘的、需要“被看见的”），领航员（该模式的角色之一）总结并概括，讲给演员听，演员在现场把它表演出来。

汤包一说到“一人一故事”，刻板印象就被打破了。比如说到大黄的老板，一个 IT 外包公司的创业者、成功人士，提议在公司团队内部“一人一故事”，然后这事就真的发展了起来……

这听起来很像团建。我以为的“故事”，肯定是和私人情绪有关，看起来并非如此。在一个职场社群里，我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情绪内心想法暴露给发工资的那个人？表现那么积极，难道不是在迎合老板的爱好？或者做个合群的人？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过于倚重“一人一故事”的心理以及疗愈的功能了——毕竟它的创始人之一是心理学家。汤包澄清了这一点。“它可以在熟人之间，可以任意地方，还可以任意时候，比如……”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当时我们在娄山关地铁站口那个有两层楼的 Manner，就当天下午而言，可能是全上海最吵的一个 Manner，罕见地有好几拨

嗓门和心态都很放松的阿姨同时开心地聊天。汤包看起来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困难：“我现在可以吆喝一声，然后就开始即兴。”

某种意义上这才应该是即兴演出的形态。关于“一人一故事”的官方解释中也影射了这一点——“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演员’并以这种剧场形式去服务社区”。汤包说澳门有个剧团，就很典型，与社区走得最近。比如说澳门之前有一段时间来了台风，好多绿植倒了，社区要重建小花园，就做了一个计划——在小区里面做露天的演出，邀请居民们来讲他们和这些植物之间的关系。一部分记录下来做成社区杂志，另一部分就是即兴表演。

汤包觉得“还原剧团”不太社区，更像游牧部落。“首先我们只有自己的排练厅，没有长期合作的演出的地方，有点像以前那种大篷车，可以去各种地方。”

他提到会和各种机构空间合作。我问是不是像一种服务提供商，“甲方乙方”这种感觉？汤包不喜欢这个概念——可能跟他曾经从事的职业有点关系——他说他们更平等，有的时候是个展览，展览有一个演出的延伸安排，两方共同分担票房，更像是一种合作。

“我们最小的地方，在愚园路上有一个 9 平方米的空间，就是路边的一个玻璃房子，叫‘故事商店’，很久之前它们搞过一个‘一日店主’的活动，所有组织或者人都可以去认领，我们也领了一天，就在里面做演出。大家在外面排队，一个人进来，然后跟我们交流，我们演出来，演完了说再见，下一个人进来。我们当时就 4 个人，我和铁头，还有一个乐师，一个领航员。不要钱，做实验的感觉。”

他说：“我们平时也服务自己，比如聚会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到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有人说我觉得有个重点来了，然后就开始演一演，我们在旁边听，听完之后就演，这样子。”

居然可以这样。

汤包觉得“还原剧团”最大的目的是专业表演。汤包说：“我们是服务我自己，我是最大受益者，我听了你的故事，我来表演，这是为了我自己。是我想听一下这个故事。”

故事肯定是无法预计到的，所以汤包遇到了一点苦恼。



“我们的观众太都市了。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话题。第一个，我的恋爱成长史——这几个字一个字不能少——恋爱一定带着成长，恋爱的最终目的是成长；第二个，我的工作，尤其是我讨厌我的老板；第三个，我和我爸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第四个，我的小时候。没了，演来演去就这几种。”

汤包感觉到这些东西成就了大家的气质——他说的“大家”，可能是都市，也可能是上海，虽然听起来好像不是太高级，但它可能真的构成了上海这一代年轻人。

“还有一个，也挺多的，就是我的留学生涯之类，”汤包补充，“他们会突然讲很多美国的故事、欧洲的故事、日本的故事，很窘迫的又很好笑的留学生活之类。一开始我觉得挺好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反思。”

汤包说的反思是从他的专业性上，比如说恋爱成长史，一个人提到，另一个人也会想到类似的经历，就此蔓延开来，不受控制。遇到次数多了，就会怀疑其中的意义。为了多少消解一点这种情况，他们开始公开排练。“还原剧团”没有租固定的演出场地，而是租下一个排练厅，定期召集大家来，收取一些费用。这成了它的特征之一。

现在“还原剧团”有两个微信群，一个 500 人，满了，另一个 200 多人。每周 20 个公开名额，事先定一些大方向的选题，大家报名参加。“比如最近有一个选题是‘人都是少数派’，每个人都要讲一个自己的边缘体验；再比如铁头熟悉巴西柔术，她又组织了一次‘抵抗之力’，所有人过来，学几招巴西柔术，如何面对性骚扰。”

“还是（会有）很都市的话题，前一段有本书《毫无意义的工作》，这也是一个主题，但是大家来了之后，我并没有让大家吐槽，我让大家用一个动词来总结一下自己工作的技能到底是什么，然后让大家选择，再去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比如一个老师，他可能会写‘陪伴’，然后二十个人里有十二三个对这个技能有兴趣。最后答案揭晓的时候，老师可能通过别人的说法对自己的工作有新的认识。”

现在每周四的排练，汤包总结起来就是这样：第一要设置议程，不是上来就让参与者讲故事，第二要让大家彼此之间产生“连接”，第三，要玩一玩，然后再坐下来。这时候讲故事就不会过于引导了，“不是说不能谈工作，只是说当你说工作的时候，不会上来就是‘厌恶’、‘能不工作就不工作’……这些。”

做得多了，汤包发现人类的心灵不止是相通，一直都是同一个模式和路径下来，有很多共性。他说最有意思的一种是，我们的都市人在讲自己的那四个问题之外，往往都会跑出来一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男人举手，说的话都差不多，“前面大家讲了好几个悲伤的故事，我来讲一个快乐一点的吧……”我们一起哈哈大笑，都很能脑补那个场面。

“你知道男人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有必要让气氛活跃一点，大家开心一点，我得喜剧一点。表现得特别为我们着想，特别有责任感。然后他讲的那个故事吧，通常来说又不是很好笑……”汤包说：“anyway，这都是好的。”

“我觉得可能是形成了一种体面的感觉，”汤包说：“就是在观众这个群体当中形成一种体面的连接，不是为了修饰或者暗地里塑造自己的形象，他实际就是好心，他为了能够让整个场域显得好像更 peace and love 一点，我们要共同维系这个场域的美妙，有一瞬间他其实是有勇气的，但这个勇气有的时候到了一定的阶段，就让人感觉上海人的观众意识还是蛮强的。”

这些挺让人玩味的事还会继续下去，反正现在参与者越来越多，名额释出的时候，十分钟、二十分钟就报完了，要是当时汤包在吃饭，根本来不及一边吃一边看手机。为何如此受欢迎，汤包还没弄清楚原因。

“还原剧团”不是一个想着盈利的机构，看起来它更像是一个合作组织，大家一起在排练场玩，找到合作的公司和人，就一起做一场，如果有钱，大家一视同仁，演员、乐师、领航员，参与的摄影师或者其它什么人把钱分掉，只要能把排练场的成本负担下来就不用想其他事了。

不过，汤包考了一个经纪人的证，“万一以后你自己想做演出的话，就要有个公司，每个公司要有三张经纪人证，并且大家还要在这公司里交社保，这样才可以申报演出，我们的小目标是用两三年时间我们凑齐这个证。”挺未雨绸缪。



汤包觉得眼下演出的问题和样本还不够多。与更多的机构合作是个好办法，比如展览、比如公司的一些活动；更多的人，比如老年人，汤头发现原本二三十岁的观众，现在年龄在增加，他们不反感有更多年龄段的人参与进来，还比如亲子系列——想到他们这个剧团三个核心人物里有两个幼儿教师出身的人，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意外；当然，还有更多的城市，现在上海过于单一过于都市化还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让话题变得更丰富，但他们也开始想在更多的地方去做即兴演出，所以他们会出现在北京的一次“很亚”的青年聚会上，出现在无锡的一场户外婚礼上，还出现在大理。

未来，汤包还是想继续做个自由演员，不过他希望可以往编创那个方向走，虽然导演、编剧、演员在他看来实际上都是一体的。他还想尝试一下“镜框式舞台”，就是传统戏剧，但因为他的本职是不断接沉浸式戏剧，这就成了一件很难突破的事情。

汤包看起来是个很认真的人，咖啡厅里说说话，提到的每个场景都很投入地演起来。他喜欢在说起每件事的时候，把因果都交代得更清楚一些。

比如他说：

“有一次我突然在群里面发疯……我就是要编造一个谣言，这个谣言就是所有你们九〇后，你们给自己起的第一个网名就寓意了你们的人生走向。然后我问大家的第一个网名都是什么。”

“铁头说她的第一个网名是泪眼婆娑。初代火星文的（我转换了下，大概是泪眼婆娑）……结果那几天她正好失恋，每天动不动就大哭，就觉得很真。”

“我们的乐师，正职是大学里的心理分析师，成天听学校里心理出问题的孩子讲要自

杀之类的事，但特别乐观，成天微笑着听这些事，他说他第一个网名叫 Lucky。”汤包一边眯缝眼睛演着笑眯眯的乐师的样子。乐师也应验了汤包的“预测”。汤包大开心。

汤包可以把这样的话题一直讲下去，始终很雀跃，难怪同学聚会大家都觉得他的状态好得远高于在座平均水准。说不定哪天，碰巧在他的观众里就有了一个讲第一个网名的即兴表演。是不是真的预示了未来的什么可能性其实也并不重要。他说他的第一个网名叫“梦里花落知多少”，谁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就发现了与他生活或者生命的某种关联。

Q: 你最近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我们的生活因为太有意思，所以没有办法让我觉得额外有意思……下一个问题是什 么？和这个有关联吗？

Q: 你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 我希望大家意识到，其实你不只是来做观众的，你自己也可以去做“一人一故事”这件事，去听你想听的故事，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做回应就好了。它能带来一个很长远的效应，让大家意识到其他人的生活、戏剧和你是有关系的，也许大家会对戏剧更感兴趣。

Q: 你想找什么人来接力？

A: 我最近认识的台湾男生 Lucan，他一直都在做和老人有关的事情，给老人讲脱口秀、教老人做杂志书。



杨 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文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走一走看看那个地方长什么样子。

这份刊物的名字换个说法，其实也是“县城小志”，不过大爱很愿意把它当做一个人。福建广东彼此之间的称呼喜欢用“阿”打头——大爱在家就被叫阿琼——所以叫阿志听起来就很亲切。在呈现采访 QA 的时候，“阿志”就是那个提问者，真有其人的样子。



专栏

070 大爱 “我觉得神明在考验我 做这本杂志的诚意”

杨樱 | 接力访问

大爱创造了《城关阿志》，

用来了解熟悉又陌生的闽南县城文化。

大爱是出生于 1991 年的女生，我们的聊天从她的家乡云霄说起。云霄是漳州下面的一个县。隔壁县叫漳浦，[推荐大爱的陈逸飞](#)就是这里人。1990 年代起，云霄是假烟制作集中地，有些厉害的村靠做假烟盖起高级小洋楼——大约是 2008 年前后的事情。后来政府打击假烟，云霄没了快钱，经济一度萧条，那些小洋楼就停滞在了当年的华丽水准上，现在大爱回老家，隔着漳江还能看到一排排站在对岸。

大爱说自己是一个“特别基层的县城生活样板”，只不过中专毕业之后比较努力，得以去厦门工作，做一个插画师。2021 年底的时候，大爱开始找各种本地青年聊天，都不是陌生人：同事、同学、同学的朋友，有一个采访对象是城管，也是大爱的亲戚。亲戚一个月工资 1700 元，让大爱吃了一惊，她没想到体制内的活儿也那么有压力，每天加班，收入还低。不过大爱又说，亲戚是一定要回来的，她在福州读完大学之后，回家乡就找了这个工作。

2022 年，这些人的故事以对话、口述、撰稿的形式出现在一本叫做《城关阿志》的独立刊物上，从封面设计、内页插画、照片到文字基本由大爱一人完成。这不是大爱第一次做 zine，只不过这次长得比较像一本真正的杂志，之前长得像火柴盒和冰棒。做《城关阿志》的时候，大爱没有什么标的物，只是在做完之后被人说像杂志，才觉得自己真的完成了这样一件事。排版软件还是她惯用的 Photoshop，而不是业内通用的 InDesign，不过事情可以这样做，也就这样做了下来。

“城关”的意思其实是城墙围起来的县城中心，只不过城墙大多已经消失，称呼沿用下来。有一次大爱的微店收到一份订单，收件地址就写着“城关镇城关区”，让她很想去看

《城关阿志》已经做了两期，第一期的主题是“回县城的年轻人”，第二期在 2023 年 6 月发布，主题是《流动！离开县城的青年现状》。第三期现在正在做，主题跳跃到“烧金拜拜指南”。我初听没有听清，只捕捉到了“拜拜”，几次重复之后才明白，这是烧纸钱拜神仙，马上想起来之前在广州村里看到各种人家门口角落里的财神和香炉，然后就听到大爱说起了“灵异事件”。

大爱说话又快又脆，她说：“因为我自己不怎么会拜拜，我就做了指南这个事情。但你知道我已经发生了四次灵异事件，你要听吗？”

四次都跟交通有关。第一次是漳浦看土地公公庙的时候朋友的 iPad 放在车盖上破碎；第二次是在永春县路过一个野庙，大爱进去拜拜之后上路没多久，车的天窗莫名其妙关上；第三次是华安县和朋友、朋友的妈妈一起去香火很旺的平安寺，结果车拐弯时整个卡在庙门口的台阶上不能动弹，还惊动了救援队；第四次还是漳浦，朋友开车去动车站接大爱的路上被刮擦。虽然后来大爱还是跟着朋友的妈妈真正走了一遍漳浦拜拜的流程，但心里还是很难受，回到云霄和妈妈讲，被带去之前认干妈的一个佛祖观音那里求了一个符，带在身边，觉得踏实了一点。

大爱讲这些的时候听着很跳脚，但又十分好笑，因为听着多少有点像在吐槽。她做这期主题的初衷其实和之前的两期一样，都是想探讨县城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原话，听着十分庞大），只不过切口是传统习俗及其背后的精神世界。至于她本人，因为完全不会拜拜，又很想拜拜，所以务实的理由是想让她这样的年轻人有一本指南，捏在手里就可以实践拜拜之道。

前段时间我去庙里掷杯，就是跟神明讲，说我要做这个杂志，问问祂同不同意。两个庙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

茭杯有两个，一正一反，你有了解吗？它是用木头或竹子做的月牙形状的杯。你就跟神明说你的问题，然后掷杯。一正一反，就是圣杯，同意的意思。如果两面都朝上，它是一个笑杯，就代表神明还不确定，相当于黄灯，你还得再问一问。如果两面都朝下，就是阴杯，不同意的意思。

我一般掷三次，第一次神明说再问一遍，第二次的时候是不同意，第三次我很紧张，就跟她说了很多我为什么要写杂志的原因，对，然后他就同意了。我就开心。

后面回云霄，我去问观音佛祖的时候，观音佛祖一直给我笑杯，掷了四五次，我整个人都已经在冒汗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玄。因为我妈只要掷杯，一定是圣杯，就是神明一定会同意。这些心理拉扯之后，我觉得神明在考验我做这本杂志的诚意，包括我对他们的真情，我现在是这样的感觉。

大概是7月比较怪，就先缓一缓，等7月鬼门关了之后我可能就出来了。

我后来才发现，大爱跟我说这些，其实就是在给我演示闽南的烧金拜拜习俗，虽然她不是这个目的。

大爱有个做播客的朋友也做了一期类似的主题，不过他们更多在聊拜拜的形式，而大爱对拜拜的人更感兴趣：女性会怎么做、男性会怎么做，年轻人是怎样的态度，家里的长辈又是怎样的视角。大爱对闽南人的信仰很着迷，也对呈现信仰的仪式、符号和物质很着迷。比如说，贡品。她兴致勃勃地研究不同县城之间的贡品差异。



云霄县，下关帝庙里的博寿角

“有的地方要供的东西是双数，有的地方供单数。贡品里的水果，有的地方不能出现梨和香蕉，有的地方不能有芭乐和山竹，都不太一样。贡品里有零食，其中一些是漳州本地的食品。贡品真的很有趣，是我们日常和神明之间更有互动性的东西。”

这些县与县的差异，要实地去走一走才会发现。在走的过程中，大爱都会询问亲戚和朋友，然后请他们的长辈带着自己去拜拜。因为本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她的采访对象都很愿意支持她。不过大爱会跳出自己的视角去看这个过程，她发现女性长辈对烧金拜拜大多都有很强的信念，男性和年轻人的态度就比较模糊。她的一个朋友在被问到态度的时候，半天憋出来一句，“拜拜就是拜拜啊！”，大爱觉得这个回答很本色。

大多数时候大爱不会一下子得到什么深邃的回答，但是她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细节。早在做第一期杂志之前她就列了很多话题，只会觉得多，不会觉得没得做。她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几轮做下来，她对闽南男女的社会角色有了更细致的观察：

我进到朋友的家里面，男性一般比较沉默，就是那些叔叔，他们基本上很少跟我讲话，我也会跟他们搭腔，但是他们一般不会像女性一样亲切，不会展开更多话题。还有一点怎么说呢，我能感受到女性在整个闽南话语权是没那么高的，男性更愿意去听男性说话，这是整个社会的常态，不是我一时半会儿能改变的。

我走了几个家，大部分的男性长辈都是这样的状态，也有可能是我刚好没有需要去跟他们沟通。但其实这一期我还想去采访一个乩童，是一个朋友的爸爸。她爸爸除了当渔民之外，还是一个乩童，而且是那种天生通灵的，我想去采访他。还没有开始做正式的田野，所以我不太清楚我跟长辈男性在沟通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闽南的女性长辈，我发现她们的观念里面就会觉得大家是最重要，她们一般上会没有自我，所有的重心全都在家里，家庭、丈夫、小孩……因为我最近做第三期的时候采访了几个长辈女性，发现她们在拜拜的时候，拜的全部都是自己的小孩或者是丈夫，从来不会拜自己。其实我蛮心酸的。我真的很希望她们去寻找自我。

闽南大男人主义看起来很多，但其实说实话，闽南的每一个家庭都是更母系的构成，特别像我对象，老家是泉州惠安的，那里的男性地位好像很高，但其实最终的大boss都是一些女性长辈，就像我对象他奶奶就掌握了一个大家庭的话语权。

我们漳州也是。我妈很传统，但是我们家里我妈地位是最高的……所以我出去的时候我就会跟所有人讲，我妈管不了我的话，没有谁可以管我的。我的个人生活状态非常自由，也是因为我把我妈当成是一个限制我的标准。

大爱说妈妈又当代又传统，“她会觉得你整天搞那些不赚钱的干嘛，我妈会以赚钱与否作为成功判断标准，她就一直叫我去上班。但是我做烧金拜拜这个事情，我妈就跟我讲，说你如果要做这个事情，到别的县的时候，一定要先去庙里跟神明讲一下，不要都不讲，然后就随便拍照，这样是不对的。”大爱的意思是，虽然妈妈根本不明白女儿整这些干嘛，但一旦踏入她的信仰领域，就得遵守规则。比如大爱去成都分享第一期《城关阿志》，就带着妈妈嘱咐的红纸包，里面包着盐和米，据说可以辟邪。



云霄县，母亲在给神龛上的神明奉茶

大爱现在住在厦门，如果要去县城做访问，一般开车两个小时之内可以到。其实她之前给漳州当地小吃画过插画，还站在当地学校的脚手架上画过壁画，不过这些她都觉得对县城的感知力不够，后来做起独立刊物，越来越上瘾，虽然基本赚不到钱（只能保证不赔，如果有一些流动资金，就会去加印旧刊），但做完之后依然还想继续去做。

“因为做的过程中我会感觉自己和整个社会产生一种深刻的链接。”

“我进入到县里面，接触每一个个体，很真实地和他们做朋友，体验他们的想法，看他们的故事，我觉得这些东西让我好着迷。我会在这些里面和整个环境里的人互动，我很沉迷在这种互动里。”

她不是一个社交练达的人，做《城关阿志》对她来说一方面是社会观察，一方面也是艺术创作。她自豪于这本刊物的个人化——无论是照片还是排版，只要她觉得好，那就是好的。在满足功能性的前提下，她尊重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的直觉。



云霄县，隔着漳江的下坂村

不过还有一点很难得，就是大爱认为自己应该让这份关于县城的刊物尽可能做到真实，有时候大家会在接受访问之后希望修饰自己的形象和用词，大爱都会尽量坚持自己的版本。她不想要做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东西。“我会觉得这个社会本身就很缺少真实性，你已经在做独立杂志了，又没有甲乙方这种东西，只是一个单纯个体在做事，

为什么不坚持真实，为什么不批判反思？这对我来说是更应该做的事情。”

她最近想离开厦门，搬去漳州。她想租一个更开放的工作室，作为一个活动空间，也许也可以为外地来的朋友提供住宿。如果要做活动，她希望同样聚集在和地方相关的话题上。

“其实这里真的有很多历史文化，只不过做文化的年轻人特别少。刚好我也做了《城关阿志》，认识了很多外地的朋友，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回去自己做一个空间尝试一下。”陈逸飞之前在漳浦家里做了一些分享，大爱都有去看过，如今她希望自己也加入这样的分享者行列。

Q: 最近有什么事情比较有意思？

A: 可能是我心态上的转变，就是我从一个个人然后变成一个想要做更多有公共性事情的人，这算是有趣的事情吗？好像只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Q: 是做《城关阿志》之后的转变吗？

A: 会有一些，比如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可能摄取到的信息没有以前那么单一，我可能会辐射到一些其他的东西上。

另一个有趣的是我最近回漳州的打算。对我来说也比较需要勇气，因为漳州好像没有人做这种事情，可能我会面临很多问题，包括有没有志同道合的人，有没有消费这种东西的群体，这些都是未知的。自己去做一个实验性的事情，可能既有趣又可怕。

Q: 你最近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A: 我觉得我去庙里求福就是在试图解决问题。我不是四次都出了和车有关的问题，我想把这个奇怪的情况给解决掉。

Q: 你想找谁来接力？

A: 大鹏，他在集美的村子里有一个开放式空间，他也住在里面，但是那里又卖酒水，很多朋友会把那里当一个吃吃喝喝的、更放松的客厅。而他本人完全没有目的，我真的觉得他很有意思。“我有一套很完整的世界观，别人怎么样都介入不了”，他是这样一个人。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三十三，2023.09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